

历史的选择
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
刘启春 郑伟明 杨路 著
新华出版社

历史的选择

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

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共先后产生了八位主要或实际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和毛泽东。处于初创期的中共，尚未形成健全的领导人产生机制，中央领导集体不稳，领导人更替频繁。

纵观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履历和当选情况不一。从出身看，多数来自普通家庭，很少受家庭背景影响；从学历看，除向忠发以外，其他人都至少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都还有过留学经历；从产生过程看，有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型领袖，有共产国际推荐或扶持的领导人，有特殊时期的特殊领导人以及过渡时期的过渡型领导人。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频繁更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与不足，逐步走向完善的历程，展示了中共在自身建设方面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史。

欢迎扫描新华出版社微信二维码：



微信号：xinhuapub1979
新浪、腾讯微博：@新华出版社
欢迎登陆豆瓣小站发表评论

ISBN 978-7-5166-1572-0



定价：38.00元

历史的选择 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

刘启春 郑伟明 杨路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选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刘启春，郑伟明，杨路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66－1572－0
Ⅰ.①历… Ⅱ.①刘…②郑…③杨… Ⅲ.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员—生平事迹
Ⅳ.①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520 号

历史的选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
作　　者：刘启春　郑伟明　杨　路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校对：**刘保利
责任编辑：唐波勇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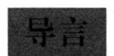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65mm×230mm
印　　张：19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572－0
定　　价：38.00 元


甲秀里

目 录



从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替看中共的发展

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是党的幼年时期。这一时期，是党的初创、中国革命初步展开的时期。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党的建设未能全面、深入的展开，其特点就是不成熟。体现在组织上，就是党内尚未形成健全的领导人产生机制，中央领导集体不稳定，领导人更替频繁，先后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以及毛泽东等八位领导人。毛泽东在名义上是延安时期产生的领袖，但他在党内实际起领袖作用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泽东实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也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他的产生过程也经历了党的幼年时期，因此，我们也把他算作党的早期所产生的领袖之一。

纵观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情况比较复杂。从家庭出身看，多数为普通家庭出身，很少受家庭出身影响。从学历来看，除向忠发外，其他人都至少接受了中等以上的教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均有一次或多次留学经历，或留学苏

联，或留学法国，张闻天还曾留学美国；从产生因素来看，有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型领袖，如陈独秀、毛泽东；有共产国际推荐或扶持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向忠发、王明；有特殊时期的特殊领导人，如李立三、博古；有过渡时期的过渡型领导人，如张闻天。从他们在任上当政的情况看，有的有名有实，如陈独秀、博古、毛泽东；有的开始有名有实、后期有名无实，如张闻天；有的有名无实，如向忠发；有的则有实无名，如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有时候是一人当政，如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有的则经历了两人或多人当政，如向忠发时期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张闻天与毛泽东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联合当政”。从任职时间来看，除毛泽东外，担任一把手时的平均年龄是33岁多一点，任职时间为一年至六年。从离职原因看，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因为其路线失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向忠发则是因为被捕叛变。这些领导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他们在党的发展史上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烙印，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中除了向忠发被捕变节外，其他各位都表现出信仰坚定、孜孜于革命理想。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社会更加黑暗，人民更加痛苦。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西方列强欺凌，丧权辱国。党的早期领导人均是怀揣“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一腔热血和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的雄心壮志而确立自己的信仰。他们在迷茫中鉴别，在鉴别中选择，在选择中确立信仰，而信仰一旦确立起来，就从无更改，无有懈怠，倾其毕生心血以求之。或漂洋过海，负笈求学，寻求救国救

民真理；或遭遇挫折打击、历经坎坷，却泰然处之；或被捕坐牢、受尽折磨，甚或牺牲生命。但始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不坠青云之志”，愈磨弥坚。在这一点上，不管他们的人生终局如何，其一以贯之坚守信仰的人生态度实为后人学习之榜样。

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替，深受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的干预是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前的显著特征之一。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 1935 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 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①] 这一时期，中共在组织上没有完全的自主性，主要领导人的产生与更替由共产国际或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指导、批准或决定。共产国际或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及其代表频繁地插手中共领导人的人选，为中国党确定组织路线，物色人选，安排职位，甚至强行指定，以不同方式选择自己“满意”的领导人，或撤换自己“不满意”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由于陈独秀的名望及其对党的创立所作出的贡献，他在一大上被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因而可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属于“自然形成”的。但从二大开始，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干预就无处不在，对领导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条件明确规定：“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批准，国际一切决议……都必须执行。”第二届中央领导人从当选开始，便明确共产国际与中共已是上下级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 1943 年 5

① 〔美〕高沃龙：《对手与联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 页。

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开始走上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的道路。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实际上，后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也有共产国际"发话"的因素。当然，季米特洛夫之所以这样"发话"，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日益为中共全党所赞同和接受，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正确路线；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实证明了是错误的，有害的，是无益于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打开，他的"失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的频繁更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自身错误、走向正确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的过程中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背后大多都伴随着错误的出现。陈独秀的离职是因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瞿秋白是因其"左"倾盲动主义而被替换；李立三是因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去职；王明、博古更是由于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持续了四年之久，致使当时的革命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红军损失了90%，白区党的力量损失了100%，而且丧失了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从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直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从此中国革命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又

一个胜利。

党在幼年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数度更替，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程。党在初创之时，自身建设相对薄弱，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都还没有形成一套规范而成熟的、常态化的建设办法和机制，包括党的领导人的产生还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西方学者埃里克·霍弗在论述政党领袖作用时这样说道：“领袖的作用，在于强化信条的确实性和权力的庄严性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把受委屈者心中的积愤清楚地表达出来，说明其应有这种积愤，并点燃对于未来的希望，即使目前有所牺牲，也是值得的。领袖要创造一幅理想的远景，那是促使自我牺牲与团结一致所不可缺少的。领袖更要掀起对于团结的热情，一种从渺小而无意义的个人生存获得解脱的感觉。”① 即是说，党的领袖是党的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活动的中枢和核心，其首要的职责就是组织和领导本党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努力扩大政治影响，为实现夺取或保持政权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党的领导人还是政党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提出者和制定者。由于党在幼年时期各方面准备不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得不够好，因而，领导人的频繁更替也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党的领导人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造就和涌现出来的最有理论修养、最有政治才干、最有群众基础与威信的优秀人物。历史发展的逻辑最终选择了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

① 转引自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0 页。

结合起来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均创造了巨大的建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新道路，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还领导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转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①] 这一"创造性的见解"，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因而，毛泽东就成为名至实归的中共领袖。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第一章

前清秀才的现代反叛

建党初期的领导人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 年），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笔名独秀。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党的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 1896 年考中秀才，1897 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因有反清言论被开除。自 1901 年始先后五次前往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等。1904 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和反对封建专制及国民陋俗的思想。1905 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1 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 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5 年 9 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1917 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 年 12 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此后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初到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创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络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 年 7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大革命后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致使大革命失败。1927 年 7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8 年中共六大后，因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观点而反对六大纲领，并在党内成立反对派组织。1929 年 11 月，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1932 年 10 月，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判刑八年。1937 年 8 月出狱，积极宣传抗战。1942 年 5 月于贫病交加中在四川江津逝世，终年 63 岁。

一、从清末秀才到革命者：确立革命信仰

1. 家学渊源：造就过人学识

1879年10月9日，秋阳艳丽，金风送爽，安徽省安庆怀宁县十里铺后营菜地洒满金晖。上午9时许，“哇！哇！”婴儿洪亮的哭声，传遍菜地四野。这个诞生在黑暗年代，肤色黝黑，脸蛋圆圆，名叫庆同的婴儿，便是日后声名显赫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陈独秀不到两岁，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1921年，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请，到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一次宴会上，陈炯明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地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意思是说他从小丧父，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陈昔凡）当嗣子。

陈独秀出生于一个十一世习儒业而功名不显、有“安庆世家”之称的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到陈独秀父辈的青少年时代，家风依然。陈氏家族秉承“勤俭持家久，诗书继世长”古训，对后代读书督促极严。值得一提的是其祖母和母亲均有“孟母”遗风，助教之功不可淹没。祖母劳氏不辞辛劳督学，并告诫：“吾家累叶以书为业，毋至若辈而坠读书种子也”。太平军攻占安庆期间，祖父陈章旭携长子陈衍藩投笔从戎，劳氏带年幼的次子陈衍中、三子陈衍庶避乱乡间。家徒四壁，无以为生。劳氏靠给人做女红

以度日食，而流离之际，犹不忍衍中、衍庶兄弟之废学，择良师以授读。夜间解绾，劳氏纺织灯下，命兄弟俩从旁诵读，无间寒暑。独秀母亲查氏因袭家训，秉承了婆婆心志，亦将崇重科举作为引导儿子的原则，将陈家书香寒门传统继续传递下去视为己任。她要让儿子考科举，最低也要中个举人，以慰已故丈夫的在天之灵。陈独秀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这是查氏对儿子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期望。“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但苦读与成功并不成正比。在封建社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路上，成功者寥寥，而失意者芸芸。陈氏家族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入仕做官并不如意。祖父和父亲都只能以教书或做幕僚为业，是终身不得志的穷秀才。到陈独秀一代，两兄弟均截止于秀才。陈独秀不仅憎恨科举，不屑于做官，更是离经叛道，走上了推翻封建体制的革命道路。

深厚的家学渊源无疑深深地影响了陈独秀，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陈独秀六岁由祖父启蒙，读“四书”、“五经”之外，更读“左传”。祖父对他要求甚严，每天背书不出即要打手严责。母亲对他的期望更殷，常流着眼泪勉励他说：“务必好好用心读书……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九岁起，陈独秀即由其年长九岁的大哥陈孟吉教授。迄十二三岁，按母亲的意愿温习经书，习作八股，以期应考。但独秀生性不喜欢八股文，阿弥陀佛的大哥即在独秀温习经书之余，教以《昭明文选》。陈独秀出生于这样有着丰厚家学渊源的士大夫家庭，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古文很有功底也就不奇怪了。他学识渊博，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还懂日、英、法三国文字，新学造诣尤深。

扎实的功底造就了丰厚的成就。陈独秀称得上是对中国文字音韵之学

有着很深造诣并有多种著述传世的国学大家和书法大家。陈独秀从 1910 年起，就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说文引申义考》，1925 年出版《字义类例》，1928 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1937 年又发表《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并于 1940 年完成《小学识字教本》。1917 年蔡元培延聘陈独秀做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任命刚一发布，守旧派反对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掌文科了"。蔡元培则反驳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能说没有真才实学?"对陈独秀的学问给以充分首肯。陈独秀青年时代还热衷诗学，一生诗作甚丰，诗学甚高。诗书不分家，他还是一代书法大家。陈独秀青少年时就对篆、隶、楷、行、草无一不习，无一不精。陈独秀曾两次批评沈尹默书法，评论沈尹默的字"其俗在骨"，被沈尹默奉为是药石之言，成为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从中也可窥见陈独秀对书法理解之深。沈尹默谨记陈独秀之警醒，潜下心来，从执笔改起，终悟笔法，终成一代书法大师。

2. 祖父、母亲和兄长：影响至深的三个人

在陈独秀的早期教育和人生中，有三个人对他影响很大。陈独秀自己说过："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祖父、母亲和兄长，他们在陈独秀的性格形成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细节决定成败，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在一个人的命运和事业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内因"。而一个人的成长和性格的养成却又是与生长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是环境的产物，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是也。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疾恶如仇，敢说敢干；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祖父的严厉养成了陈独秀的叛逆性格，母亲的柔情与兄长的宽怀则养成了陈独秀重情重义

的一面。这些无疑都与他幼年所经历的祖父、母亲和兄长的影响有关。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人称“白胡子爹爹”。脾气暴躁，严厉苛刻。陈独秀幼时习四书五经，尽管天资聪颖，但天性好玩，常常背书背得急急巴巴。白胡子爹爹就拿篾条抽他。陈独秀挨打并不哭，只是小嘴倔强地鼓起，两只眼睛狠狠地瞪着。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记述道：“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陈独秀说：“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陈独秀倔强不屈的性格就是在这样的祖父“熏陶”下形成的。

母亲查氏，贤惠能干，好善乐施，在邻里亲友中有“女丈夫”之名，一心要将陈家书香寒门的传统继承下去，极力培养陈独秀兄弟俩考中科举。对于陈独秀背书挨打，母亲暗地里流了不少眼泪。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有劲，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也许是祖父没有力气再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母亲的眼泪倒使儿子哭起来了。只有

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是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有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可见陈独秀一面刚烈一面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陈独秀自己回忆说：“可是母亲对我并不是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母亲查氏对幼年陈独秀的影响，比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影响都要大而深。正如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所写：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性情暴躁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当然深知，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

兄长陈庆元性情温和，宅心仁厚，是陈独秀的课业老师。“青灯课我读，文彩励先鞭。”这是陈独秀追忆兄长陈庆元对他的教诲。陈独秀 11 岁时祖父去世，庆元就承担起了辅导弟弟读书的职责。这时的陈庆元已经考取了秀才，但他性情敦厚，对弟弟的读书喜好无可奈何，却也因势利导。陈独秀讨厌四书五经，陈庆元就教他读《昭明文选》。在“昭明太子”的帮助下，陈独秀还是考取了秀才。在院试时，宗师出了个晦涩难懂的截答题——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对这狗屁不通的题目，也就用横竖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将《昭明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组合在一起，凑足了一篇皇皇大文预备交差了事。出乎意料，陈独秀县试夺魁，考取了秀才！但侥幸中榜的陈独秀却由此更加鄙

视科举制度。此后为着“以了母亲的心愿”又“着实准备了”一番乡试，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但却名落孙山。然而，陈独秀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这种态度，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开始从封建制度中分化出来。

3. 留学日本：寻求革命真理

1897年是陈独秀人生之旅的一次转折。这一年，他借着秀才及第的顺风，又赴南京参加乡试，想再下一“城”，却铩羽而归。陈独秀原本就十分憎恨科举考试，这次乡试期间，目睹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更增添了他的厌恶之情。他在《实庵自传》中记述了当时的一件事：考头场时，看见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使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促动他迈出了由“举人、进士、状元郎”道路转向“康党、乱党、共产党”道路的第一步。他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乡试期间，他结识了习读新学、崇尚维新的安徽绩溪秀才汪希颜，在汪希颜的介绍下，陈独秀回安徽后又接触了汪孟邹、李光炯等维新派人士。经过与维新人士的交往，陈独秀接触到了康梁的维新思想，开始涉猎西方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从一个被动读经的青少年变成了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百日维新的失败则再次激起了陈独秀人生道路的转向。八国联军的入侵，陷中国于瓜分之危，陈独秀受到极大刺激。“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

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于是，从 1901 年 10 月开始，陈独秀多次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振，犹如走出山洞，眼见广阔田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从而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向“乱党”。

陈独秀东渡日本分为三期，1901—1903 年为第一期，中间返回一次。1907—1908 年再次赴日深造，这是第二期，中间亦返国一次。第三期是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失败后的 1914 年与 1915 年之间。陈独秀本想“到各国，查看一番”，结果 5 次都去了同一国家——日本。综观他的一生，日本是他思想启蒙的起点，无论从反面还是正面来观察，都是如此：从反面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刺激和教育了他；从正面来说，他从日本找到的政治理论学说，就是他为中国找到的救亡之路，也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

1901 年 11 月，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在这里他读到很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著作，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的《论自由》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思想，使他彻底告别康梁维新党，进而转向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的“乱党”。

1902 年 9 月，陈独秀因安庆藏书楼的爱国演说而获罪，与潘赞化相伴，再次流亡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学习。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世，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这年冬天，他与张继等组织青年会，“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6 年夏，陈独秀第三次东渡日本。暑假过后回国，在皖江中学任

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安徽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予以迫害。陈独秀不能在芜湖存身，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在东京，他参加了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和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发起创立的亚洲和亲会。陈独秀常到东京《民报》馆，与章太炎、钱玄同等讨论汉学和西方文学。

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7月，好友章士钊由日本东京来信，请陈独秀速来，共同编辑《甲寅》杂志，于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到了东京，他在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之余，还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在《甲寅》杂志社，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甲寅》的其他撰稿人，如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陈独秀”的笔名就是在这时取的。

二、当选中央局书记缘由：显著名声与建党功绩

1. 辛亥革命：全程参加者

陈独秀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积极投身于当时的爱国革命运动，是早期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组织者、领导者。陈独秀在系统地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例如，参加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参加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等；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过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报刊和“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等团体，而以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

1901 年，陈独秀首次去日本参加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励志社”。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就与张继决定不再参加“励志社”的活动。1902 年 9 月，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加入了以“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为会旨的青年会，这是他从“康梁”转向革命的一个飞跃。陈独秀在东京还结识了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他反思维新改良，比照着西方思想家对民主自由权利的阐述，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开始了他的“乱党”生涯。1903 年 4 月，陈独秀被日本驱逐后刚回到上海，当时正是拒俄运动蓬勃兴起之际，即与潘赞化等迅速赶回安庆筹组安徽爱国会，呼应上海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通缉。1904 年 3 月，他筹办了《安徽俗话报》，“对青年界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11 月，他参加了激进的秘

密组织暗杀团，与杨笃生、蔡元培、章士钊、陶成章、吴樾诸人一起搞暗杀活动。1905 年暑期，他联合安徽革命力量，组建革命组织岳王会，投身于“科学的革命运动”，走上了发动和组织民众一起进行革命救国的道路。1905 年 9 月吴樾以“人体炸弹”刺杀清政府出洋五大臣的失败却引起了陈独秀的深刻反思，使他对暗杀这一方式很快产生怀疑，认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尽管陈独秀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但 1905 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时，陈独秀却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这一谜底直到 1932 年他在南京坐牢时才揭开。原来，这与陈独秀的思想认识和政治主张有关。陈独秀待人处事，历来有他的独立见解，孤傲自狂，从不说“人云亦云”的话。他对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驱除鞑虏”，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把满族称为“异族”不妥，这只不过是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罢了，为何要加以“驱除”？他说，我历来着眼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之间的矛盾，不敢苟同于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除鞑虏”。因此，陈独秀未参加与自己主张相悖的同盟会。虽然陈独秀对“十六字”纲领持有不同政见，但他与同盟会反对清廷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谓殊途同归。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枪。11 月 11 日，安徽宣布独立，陈独秀先后应安徽都督孙毓筠、柏文蔚之邀就任都督府秘书长，还与柏文蔚一起发动了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他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稿，在这里，陈独秀结识了后来与他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

2. 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主将

1915 年 6 月中旬，陈独秀自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办《青年杂

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陈独秀为什么要办一个杂志来做思想改观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探讨他为什么要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原因。这起因于他的一篇文章所引发的思考。1914 年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观点。在文章中，他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却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以，要爱国，就是要爱能“保障吾人权利谋求吾人幸福”的国家，国家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值得爱。“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有人写信给编辑部说：“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可见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何等的强烈！陈独秀的这篇文章表明，他已经把民主主义作为他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把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定取舍的唯一准绳，即使对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毫不例外地用这一准绳去衡量，并决定对它的态度。人民所以要建立国家，既然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那么当国家不仅不能保护民权，反而残害民权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这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导思想。

“独秀”便是发表这篇文章时所用笔名。“独秀”自此名扬四海，流传

百世。陈独秀一生用过许多名字，如众甫、重甫、程重甫、由已、三爱、熙州仲子居士、陈仲、仲、CC 生、只眼、实庵、程志孟、撒翁、顽石等。而以“独秀”之名传世的则是从这篇文章之后。关于陈独秀这个名字还有一番说法。1953 年 2 月，毛泽东沿江视察首次来到安庆。他站在船头，突然想到了陈独秀的故乡是安庆。于是毛泽东下令停船上岸，召见了当时的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问陈独秀的家在安庆什么地方？毫无思想准备的傅大章顺口回答：“怀宁独秀山下。”毛泽东进一步又问：是山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他回答说是后一种情况。距陈独秀的老家怀宁县（今安庆市）约 20 公里处有一座山名独秀山，此山“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陈独秀这个名字，即取名于独秀山。独秀这个名字出现于刊物以后，他的好友汪孟邹曾跟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有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实际上，安庆四周皆名山，独秀山不过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陈独秀对此山情有独钟，选中独秀山作为自己的笔名，这与他一身傲骨的个性和卓尔不群的心志大有关联。

时过半年，当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才从混沌中惊醒，认为卖国的中国现政府，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对陈独秀的文章，由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盲目愚忠的“爱国心”也就“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陈独秀正是采取这种正话反说的方式，以开启民智，树立民众的民主共和的国家观念。陈独秀由此深深认识到，从辛亥革命胜利到反袁“二次革命”失败，从中华民国的建立到袁世凯的卖国统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革命便缺乏群众基础。陈独秀由是而得出了“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结论。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在创办《新青年》之前，陈独秀曾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 10 年杂志，全

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由他一手创办的《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于 1915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不久，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周报）混名，遂从第 2 卷第 1 号（1916 年 9 月 1 日）起易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革命的思想革命。

《新青年》的创刊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新青年》的宗旨是：重塑中国青年的精神形象。陈独秀亲拟的创刊号上的“社告”云：“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因为“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他为青年设计了新的人生形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


新青年
LA JEUNESSE
要目
馬克思學說
馬克思學說批評
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下）
詩
我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
馬克思傳略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巴枯寧傳略
老子的政治哲學
原名青年雜誌
第六卷第五號
上海群益書社印行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封面（新华社稿）

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而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这是他所设计的“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启蒙运动的主旋律。

《新青年》一发行，当时便引起国人的关注。它使沉寂的五千年古国睡狮从昏睡中骇然惊起。一时之间，有识之士都投书《新青年》与陈独秀切磋讨论，更有许多被促使觉醒的进步青年尊陈独秀为走向新时代的引路导师，并将为《新青年》撰稿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他本人誉为当时的四支“大笔”。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 7 个年头。这 7 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青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梁、康二人我早已抛弃了。”[①]《新青年》几乎成了毛泽东醉心阅读的刊物。“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②]

---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5 页。

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18 页。

胡适曾评价说："只有三本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93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时，胡适题词云：《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运动，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藏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蔡元培也为之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新青年》的出现被史学家誉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它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梁启超《新民丛报》以及陈氏自己曾参与编辑的诸种报刊，其思想高度则远为其"先辈"们所无法比拟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①]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本人通过倡导并组织领导这一新文化运动，毫无愧色地成了当时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在《新青年》成功之后，陈独秀创办了另一份有影响的刊物——《每周评论》。

《新青年》的方针是：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时政。在办刊过程中，《新青年》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始终是意在不谈政治而以理论斗争为主的大型月刊。当时曾有人写信批评陈独秀，对筹安会变更国体、进行封建复辟问题未着文警告国人。陈回答以"本志的天职在'改造青年的思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想——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自创刊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1916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建立，1917年11月7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等等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就使得对时事极为关注的陈独秀不得不重新思考。他认为不能对政治问题装聋作哑，而应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国亡种灭。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积极主张国民对于“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急谋改革”的觉悟，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可见，此时陈独秀的思想从提倡科学与民主，进展到了直接干预时政的高度。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显然，《新青年》的形式和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12月22日创办了《每周评论》。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们发行这个《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这是个针砭时弊的战斗性刊物，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国内劳动状况、读者言论等12个专栏。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密切关注当时的政治斗争，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文化，初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适时报道世界革命的动态。这个小型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广泛的影响，它的版式不久就为雨后春笋般继起兴办的许多报刊所采用，冠名“评论”的报纸也为数不少，如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以及其他许多周刊、旬刊或半月刊，都模仿它的版式，大体采用了类似的分栏，一时形成了报界的规范。《每周评论》从1918年

12 月创刊到 1919 年 8 月停刊，共出了 37 期，陈独秀先后在该刊共发表了 140 多篇评论和随感录。

3. 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与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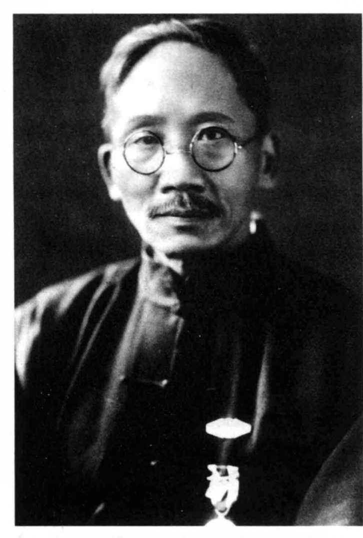
1945 年 4 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针对党内一些人揪住陈独秀不放的情况，毛泽东很客观地讲到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给予他高度评价。他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①]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无论是对党的成立还是对毛泽东个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都是产生过巨大作用的。

陈独秀在北京期间，有三件事是主要的。一是办刊，包括《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二是做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三是发起并领导了五四运动。

陈独秀到北京本是为《新青年》杂志筹款、募集股份而来的。在北京大展拳脚则是因为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曾相识于 1905 年的上海爱国协社，从事暗杀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对陈独秀“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1917 年 1 月 4 日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求贤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任文科学长，月薪 300 元。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4 页。



委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画像（新华社稿）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是拿出了真心诚意的，体现在三点上。一是“三顾茅庐”。蔡元培接受委任状当日的上午，即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但陈独秀因为应酬多睡得晚，日上三竿方才起床。但蔡元培先生差不多天天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是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由此可见蔡元培礼贤下士的风度！二是蔡元培还为陈独秀做了一点假，在其履历上做了文章。在蔡元培“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所附履历中，说陈独秀“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蔡元培在 5 天之内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15 日即贴出第 3 号《布告》，公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三是蔡元培顶住了压力。在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告示贴出后，全校震动。校中遗老遗少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讥讽陈独秀只会写几

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进行了有力驳斥。他说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也为蔡元培的诚意所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任职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对于北京大学从一个官僚富家子弟厮混文凭的旧式学堂发展成为一所现代大学作出了贡献。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即是指陈独秀带来的新气象。陈独秀改进文科教学，如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外语，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教师自由讲解，允许旁听，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这也是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科学思想理论传播发端地和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原委之一。

但是，陈独秀的改革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慌。他们纠集起来，反对陈独秀的改革，不断地找借口攻击他，甚至借助北洋政府势力来压制和驱赶陈独秀。最后以陈独秀嫖妓、有伤风化为借口赶走了他。现在有人说陈独秀嫖娼被北大驱逐而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使中国历史向左转。其实这个说法始于胡适。1935 年 12 月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期间，胡适还写信给汤尔和，怪他 1919 年 3 月 26 日夜，和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私下讨论开除陈独秀，从而导致陈独秀后来"左"倾。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

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①] 汤尔和回信辩解当时社会流传确有其事。胡适不禁摇头。其实，胡适也知道，即便没有1919年的事，陈独秀也必然会脱钩而去的，只是蔡、汤两先生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实在可惜。

发起并领导五四运动是陈独秀在北京期间的第三件大事。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五四运动前，有两个和会召开。一是国内的南北和平会议，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不仅没有削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消弭军阀混战，相反，北方段祺瑞还勾结日本签订了共同军事协定，出卖国家主权。二是国际上的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利益，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消息传到国内，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5月2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日，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指出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曾经的对帝国主义主持公道，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完全破灭了。

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并扮演了总司令的角色。毛泽

---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2页。

东曾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① 陈独秀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指导、大造舆论等方面的工作，而且直接参与发动了 5 月 4 日的上街游行示威。

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理由如下：

其一，亲身参与。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陈独秀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励下，五四前夕，北京各院校的青年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正是这个小组，在五四运动的发动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其二，大造舆论。陈独秀和李大钊利用《每周评论》这个阵地，组织舆论支持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经验，指导运动发展。陈独秀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为五四运动呼号，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 7 篇文章和 33 篇"随感录"。6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学生团上街演讲，八百余名学生又遭军警逮捕，分别关押在北大法科讲堂和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消息传出，陈独秀无比愤慨，对被捕学生十分关切。6 月 8 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这篇不满 100 字的短文极富哲理，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当时的爱国学生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03 页。

其三，引导方向。陈独秀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等五项要求，指导运动深入发展。

陈独秀的“直接行动”，引起了京师警察厅的注意并密令各区署对其进行严密监视。1919 年 6 月 11 日晚，陈独秀到位于北京前门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密探抓捕。6 月 13 日晨，陈独秀被捕消息被披露出来，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震动京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发表消息、评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展开营救活动。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反抗强权、要求民主自由的象征。所以，在陈独秀的被捕与营救，摧残与反摧残的斗争激流中，社会各界汇集成巨大的反帝反封建力量，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4. 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性质和方向。自从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所接触、所效仿的都是英美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制度。如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效仿对象，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以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为蓝本。包括陈独秀及其同期的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本人对法兰西民主思想文化有着极为深入地研究，推崇备至。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陈独秀曾评价说：“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

国宪章，赖以成立”，“由斯以谈，人类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他认为近代欧洲三大文明——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赞誉溢于言表，几乎达到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境地。相反，此前在欧洲流传了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却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零星地被提及，却从未被系统地介绍过。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学习效仿选择的方向，从向欧美学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向了学习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开始这一转变的就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此，中国历史发展有了新的方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独秀也完成了自身的转变，从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开始了他人生的新航程。

五四运动唤醒了陈独秀，促其思想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就已经注意到了十月革命这一改变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指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他还加深了对十月革命的认识：“18 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 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但追溯陈独秀的思想渊源，我们认为他始终是一个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倾向较重的人，而且尤其崇尚法兰西文明，竭力鼓吹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对于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因此，他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李大钊是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同陈独秀一样，李大钊一开始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热心崇拜者，

但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就以敏锐独到的眼光捕捉到了十月革命的信息，开始了对十月革命的宣传。1918 年 7 月 1 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了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界文明之绝大变动”，而且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可见，李大钊已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之后又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论文，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号召国人向俄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李大钊已经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观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前夕。张国焘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时说：“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①] 直到 1919 年 2 月，陈独秀还主张用“放下战争的方法，用和平议会的方法来解决时局”，其政治上的幼稚和理论上的混乱可见一斑。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打破了陈独秀对西方的迷梦，使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虚伪性以及帝国主义的凌弱本质，从而抛弃了法兰西文明，转向苏维埃俄国，并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中去。特别是 3 个月的牢狱生活，使陈独秀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已从一名积极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这种转变也是急剧的，依然陈独秀还没来得及对自己的民主思想进行清理，就已投身到斗争的最前

---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93 页。

线。因而这种转变是不彻底的，还带有浓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印迹。

胡适曾说陈独秀是因为坐监牢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全书的官话本是不禁止阅读的。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了感动……使他感觉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抱着这样的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走进那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当然是不难的转变。"① 据有关专家考证，陈独秀也确实把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比较，认为两者有诸多相同之



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画像（新华社稿）

① 转引自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6—457页。

处，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觉悟。北京牢狱之灾后，他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契合，于是更加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向列宁主义跃进。就这样，1919 年下半年至 1920 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①]

陈独秀在完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新文化运动以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契机，通过思想文化运动与群众政治运动的结合，强化了前期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思想解放氛围，促成了社会改造的革命形势，创造了适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二是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就是由《每周评论》发表；1919 年 5 月，《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推出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注意。从此，《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陈独秀执笔发表《本志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标志着陈独秀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过渡；1919 年 11 月 12 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1920 年 5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主要文章有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界联合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

---

① 唐宝林、陈铁建：《陈独秀与瞿秋白》，团结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 页。

南女工问题》，还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融入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这些均反映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20 年 9 月，《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其第 8 卷第 1 号发表陈独秀《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标志着陈独秀正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号起《新青年》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苏俄革命和建设的资料，并发表了列宁某些著作的译文、列宁传略和列宁主要著作目录，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三是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大论战，有力地维护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同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次大论战，进一步廓清了人们的思想迷雾，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陈独秀是与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主辩手之一。通过论争与批判，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使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从而为建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5.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

1919 年 9 月，陈独秀虽然出了监狱，但仍被特务监视，行动仍受限制，被要求重大行动必须得到政府批准。但他并不遵照所谓的“豫戒令”行事，于 1920 年 2 月 5 日应邀抵达武汉，参加武昌文化大学毕业典礼并作演讲。北洋政府十分恼怒，加派军警对陈宅严密监视，企图以“煽动民众，扰害治安”，再捕他入狱。

李大钊等人紧急行动起来，从火车站直接接走了陈独秀。然后在王星

拱家里化装成一个店伙计，李大钊装成一个账房先生，亲自把他送出北京城，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就在这逃亡的路上，“南陈北李”商议着“开天辟地”的大事——“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4 月 2 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陈独秀将 5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还特约了孙中山、蔡元培等题词。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 5000 多工人于 5 月 1 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的步伐。1920 年 3 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的引荐拜访了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4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等人，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5 月间，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组织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 年 6 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关于党的名称，

开始时沿用了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党”，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并转告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复信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7 月 19 日，再举行筹备会，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 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发起人一共是 8 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成支部。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便利用同志、朋友及师生关系，联络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筹组共产党。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国民党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与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武汉组织除陈独秀派刘伯垂去并找包惠僧协助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为支部。

陈独秀在成立上海发起组和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 1945 年“七大”预备会议上肯定了陈独秀的功绩，说他“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①]

湖南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毛泽东在蔡和森提议、督促，陈独秀的直接委托、指导下创立的，是直属陈独秀等人创建的共产党的一部分。陈独秀充分相信毛泽东、彭璜在他的书信指导下，可以独立自主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他与李达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 10 条、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及时寄给了毛泽东，使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长沙地方团成立的进程如期实现。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经历了从神交到革命同志、再分道扬镳的历程。陈独秀曾是青年毛泽东崇敬的偶像，后来又成为毛泽东批评的对象。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4 页。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神交，《新青年》则是媒介与纽带。当时的陈独秀，以其独到的政治理论见解、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犀利的如椽大笔成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有志青年的偶像。1917 年 3 月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写了《体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响应民主与科学之精神。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在《新青年》全文登载。

当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达到了极致。他曾在同张昆弟、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①] 1918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为联系湖南长沙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馆员。在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兴奋不已。18 年后在延安会见斯诺时，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当时“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1919 年 7 月，毛泽东效仿《每周评论》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从此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7 月 14 日，为声援陈独秀，毛泽东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高呼陈君“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③] 1919 年 9 月，陈独秀出狱后，看到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及其连载的《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十分赞赏。他在第 7 期《新青年》上，特意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9 页。
②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3—305 页。

《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将《湘江评论》评价为“最有力的”。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19年12月，毛泽东为“驱张”而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他一到北京就去箭杆胡同9号拜访陈独秀。陈独秀鼓励了毛泽东等人的驱张运动，并应毛泽东之请，撰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其中写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


(第一版)

湘江評論

湖南學生聯合會 所

本報每週一出版日如下 每號銅子二枚 外埠大洋二分郵費在內

The Shian Kian Weekly Review

創刊號

創刊宣言　澤東

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
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
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
話，於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
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種潮流
，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麼
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
什麼力量最強？民衆聯合的力量最強。
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

。見於政治方面，由獨裁政治，變爲代
議政治。由有限制的選舉，變爲沒限制
的選舉。見於社會方面，由少數階級專
制的黑暗社會，變爲全體人民自由發展
的光明社會。見於教育方面，爲平民教
育主義。見於經濟方面，爲勞獲平均主
義。見於思想方面，爲實驗主義。見於
國際方面，爲國際同盟。
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
」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爲平
民主義。（兌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義

並且毫無效力。歐洲的「同盟」
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
所以我們的見解，在學術方面
徹底研究。不受一切傳說和迷信
，要尋着什麼是真理。。在對人
，主張羣衆聯合，向強權者爲
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
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
「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
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國際的強權，迫上了我們的
是日本。罷課，罷市，罷工，
種運動，就是直接間接對付強
動的方法。
至於湘江，乃地球上東半球
條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
這江上和他鄰近的民族，渾渾
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
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

助之好友 能多傳播者 特別減少票費 函到即將所須之報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新华社稿）

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这次谈话中，陈独秀还向毛泽东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此时的毛泽东，其思想

[1]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1924年2月至年底，毛泽东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时的寓所纪念地外景（新华社稿）

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大杂烩”，甚至还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当毛泽东看了陈独秀介绍给他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后，思想豁然开朗，如同黑暗中的灯塔照耀着他前进。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过。”①

1920年4月，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

① 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页。

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交谈中，陈独秀还委托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

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毛泽东与陈独秀经常发生联系，或者在一起工作。1923 年 4 月，鉴于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领导的工人运动成绩突出，陈独秀把毛泽东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6 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表扬了湖南，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担任中央局秘书，与委员长陈独秀一起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两人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奉陈独秀党中央委派，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不久，由于同国民党负责人经常发生摩擦，他辞去了组织部秘书职务。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陈独秀十分崇敬，密切配合，成为陈独秀领导党和革命工作最得力的助手。1924 年底患病回湘休养，不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毛泽东似如鱼得水，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大搞农民运动，走向辉煌。

客观地说，我们认为陈独秀是毛泽东的思想导师和中国革命的启蒙者之一，他影响并改变了毛泽东的一生。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都认可。可是，毛泽东是个“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人。他仰慕陈独秀的才华，但不会盲从他的一切；他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却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这或许就是伟人相交值得品鉴之处。

三、被免职原因：为大革命失败负责

1. 离职过程：从辞职到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的职位危机应该是从 1927 年 4 月 27 日到 5 月 9 日间召开的党的五大开始的。

五大是在国民大革命濒于失败的前夕召开的。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的 3 天里，遭杀害者 300 多人，被拘捕者 1000 多人，流亡失踪者 5000 多人。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此次政变后不久英勇牺牲。之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广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人相继被害。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4 月 6 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 80 余人。28 日，李大钊等 20 人英勇就义。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

在南北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中国共产党牺牲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精英分子，损失之惨重为建党以来所未有，党的领导人也失去了在上海的立足之地，不得不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岌岌可危的

革命形势，党的领袖们自然十分揪心。一方面，共产国际也由于陈独秀对国际路线常有龃龉，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日渐恶劣，也就产生了撤换陈独秀的想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又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另一方面，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右倾问题，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的指导。瞿秋白是党内较早认清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并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对陈独秀的主张和路线提出了质疑。在一次有罗易、维经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就指出中共中央存在严重的危机，说中央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招致了“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党组织早就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导致了中央的领导威信下降。这番话的矛头就是指向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瞿秋白等人适应了共产国际“中途换人”需要。两种力量的结合造成了陈独秀的下台。

这样，在五大上，陈独秀的地位就成了与会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据郑超麟回忆：“外国人鲍罗廷、罗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而在五大上对陈独秀发起挑战的正是瞿秋白。2 月时，瞿秋白写了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副标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准备提交五大讨论。这本小册子从理论到实际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右倾妥协错误，指出“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表



陈独秀（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在一起（新华社稿）

面上是揭露和批判“彭述之主义”，并没有直接点陈独秀的名，实际上却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瞿秋白把这本小册子还拿到五大会场上散发，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共有 38 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纷纷揭露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鉴于大家的批评，陈独秀也检讨了自己在反对孙中山北上、反对北伐、退出国民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五大上，尽管陈独秀仍当选为总书记，与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九人组成政治局，与李维汉、张国焘三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也尽管陈独

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五大以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他的领导危机自此开始呈现，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

五大以后，武昌和长沙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这时也呈现出手忙脚乱、失张失智的境地。一会儿要求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一会儿又要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般逻辑混乱的政策，自然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共产国际出尔反尔、始终不一、逻辑错乱的指挥引起了率性而为的陈独秀的极端不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遂致书中央，请辞总书记职务。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从此陈独秀不再视事，但没有正式撤去他总书记职务。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纳兹等人来到武汉，宣布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让他再担任总书记。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罗明纳兹拒绝陈独秀与会。会议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实际上解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此，陈独秀远离中共权力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了上海隐居“反省”。他因自觉负有责任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 1927 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但他反省的结果，却是始终不明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这段时期他比较消极，整天埋头于中国文字拼

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的研究，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

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他去苏联的决定；以“撒翁”署名写一些揭露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等国民党、北洋军阀反动派丑恶表现的文章，极尽嬉笑怒骂，火力集中而猛烈，很有战斗力。比如，他在上海总工会办的双日刊《上海工人》第 43 期骑缝上发表他写的讽刺国民党的歌诀《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诚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1928 年 6 月他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邀请，没有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就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文件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路线后，就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即反对当前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规定，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反对在“苏维埃”旗帜下进行夺取政权的运动，等等。他在 1929 年 8 月 5 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这是陈独秀由改良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

思主义后，又一次人生的重大转折。

1929 年 8 月，陈独秀与彭述之、尹宽等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发表了经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样就出现了公开的党内分裂活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他没有接受意见。10 月，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央，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地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1930 年 3 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批准。

1932 年 10 月 15 日，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然后被引渡给国民党后连夜押解南京。1933 年 6 月 30 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 8 年。1937 年 8 月，卢沟桥事变后释放出狱。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以为陈独秀要回到党内，就由毛泽东、张闻天签署三个条件，要求他：（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捏造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文章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陈独秀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2. 理论指导失误：右倾机会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被免职，自然是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有密切的关系。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地讲，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包括了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看，一是年幼的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二是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一再妥协退让，使党在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从客观方面看，一是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它们联合起来绞杀中国革命；二是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共合作遭到破坏，如蒋介石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曾说：“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①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其思想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路线政策，主要表现为大革命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总政策。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故一般难以加入革命”；无产阶级则“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故“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却“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资产阶级虽然是与工人、农民“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便失去了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基于上述分析，陈独秀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中国革命得出了这样的错误结论："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结果"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待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之后才能进行，形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分离的"二次革命"。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其建立在"二次革命论"基础上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党权、军权、政权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只做民众运动。他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此时，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位"。陈独秀不但不同意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还指示已参加地方革命政府的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否则要开除党籍。他认为中国现在"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而只能是"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1926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汉口特别会议上其错误观点得到系统化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其主要表现是：放弃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政策以国民党为转移，为了迁就资产阶级，宁愿放弃农民这一最重要的同盟军，甚至诬蔑和压制已经起来的农民运动并拒绝武装工农；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不主张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注意改造旧军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发挥甚至压抑工农的武装力量。陈独秀的这些思想错误，致使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新右派显得束手无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已经发展起来的6万多党员急剧下降到1万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要追究责任，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自然难辞其咎。

3. 被共产国际抛弃：倔强的替罪羊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时制定的《二十一条》规定，"凡愿意加入

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作为一个支部，受其领导"。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一组织原则，加入第三国际并执行其指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人事也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之中。陈独秀尽管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如果一旦他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当革命遭遇危机、失败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就抛出陈独秀，让其作为"替罪羊"承担责任。陈独秀被迫让位，可以说，完全是莫斯科的意思。陈独秀自己也说过："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乃至作为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态，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①]

早在 1926 年底，共产国际的一个三人小组来华考察中共中央和维经斯基的工作，并在次年 3 月呈交一份详细报告，系统批判了陈独秀及其支

①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持者维经斯基的错误，肯定了瞿秋白的正确立场，认为应该撤换陈独秀，只是由于他在党内的威信太高，看来还得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必须改组党中央。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陈独秀）代表中派。我们相信：假如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维经斯基）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么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切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莫斯科接受了这个报告的建议，派罗易等人来华执行。他们到达武汉后，就与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组成新的临时中央，指挥一切，而撇开了正在上海的陈独秀。不过，他们还是看清楚了一个事实，即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仍然很高，并无合适人选可以代替。6 月 17 日，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就提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7 月 9 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了一封信，要把中国革命危险形势全部诿过于陈独秀，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斯大林的眼中，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几乎一钱不值，"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性和业务上不精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一切都搞砸了。19 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说陈要求退出国民党是为了"更加脱离群众，从旁边搞玩弄手腕的政客活动"。因此，应当"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造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各项指示，对那些认为当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1] 12 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 5 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是陈独秀自党成立以来首次被

---

①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 1 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98—514 页。

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23 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八七会议通过了罗明纳兹起草了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说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这一态度，自然遭到陈独秀本人的反对，党内也有同志不同意。在八七会议上，王若飞、李维汉也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劝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很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他拒绝了去莫斯科的要求，表示要留在国内急需研究、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究竟是陈独秀负责还是共产国际负责？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究竟怎样呢？

其实，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合作一开始并不愉快，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是比较紧张的。马林是在 1921 年 6 月受列宁委派来直接指导中国党的成立的。马林来到中国，即催促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的成立。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尼科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这时候，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政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他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1921 年 7 月 23 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出席，他指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参加会议。尽管缺席，但他仍被选为

中央局书记。这样，作为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与党的一大擦肩而过。陈独秀为什么不去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真的是在广州公务缠身走不开吗？非也。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久留广州。8 月 17 日，他致函陈炯明，辞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从这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想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可见，陈独秀并不是走不开，他不去上海开会，公务只是一个借口，其实是另有隐情。这个隐情又是什么呢？

李大钊也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会议。有的说是因为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并兼任图书馆主任，正值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有的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有的说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我们以为，其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而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领导北京市教职工的索薪斗争，还在同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时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这次索薪斗争持续了 4 个多月，李大钊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多方奔走，终于迫使北京政府于 7 月 24 日派员慰问教育界，并答应一些条件，斗争告一段落。但这时，党的一大已在上海开幕了，所以，李大钊未能参加。

陈独秀不去上海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主要表现在，他认为外国人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包办的倾向，他对此很有意见，所以不去。陈独秀认为，第三国际的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党的成立大会，本应先向陈独秀

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成立大会才合乎情理。现在通过李汉俊来通知他开会，他就有意见了。所以，他认为是国际代表包办了成立大会。陈独秀花费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结果最后由两个外国人主持成立大会，他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而马林要求召开成立大会，上海组的代理书记李汉俊已经接受了，会期不好更改。但自己又有意见，就只好借故抵制，不去开会，派了陈、包二人去参加。陈独秀不参加会议就是对马林包办大会的强烈抵制，这是根本原因。

陈独秀对马林来中国指导党的成立也是有看法的。马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来指导中共工作的。他主张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却不这样看。就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陈独秀也对马林以“钦差大臣”自居，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不满。例如马林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马林不与中共中央商量，私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对此极为不满，声言再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就这样，二人的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但陈独秀不久还是接受了马林的主张，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国际的领导和援助。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还得从陈独秀的突然被捕说起。陈独秀的这次被捕，使得他与马林的关系出现了转机。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在陈独秀家中把他及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捕去。陈独秀被捕，同样引起了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出狱后，陈独秀就了解到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出狱，除了各界营救之外，马林是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的，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和铺保。陈独秀对马林的这种帮助很是感动。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有恩必报。因为这件事他无形中改变了对马林的态度，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们在某些问题上一路磕磕碰碰走过。由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共作为其下面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并没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一切由他们说了算，不听话就撤职。陈独秀如此，后来的瞿秋白、李立三也是因为不听共产国际的指示被莫斯科撤职，倒是王明因为听命于莫斯科才受到重用。共产国际可以随意撤换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直接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都是听命于莫斯科，比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因此，大革命的失败，怎么可以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个人负责？就连当时的维经斯基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大的责任。"

1922年3月，马林根据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考察，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受到中共党内的普遍反对，陈独秀也坚决抵制。为此还特意写信给共产国际，提出反对加入国民

党的六条理由。但是最后马林拿出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共就只好服从了。可以说，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胁迫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合作中，共产国际有点太看重国民党而看不起共产党，鲍罗廷还认为中共“诞生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所以，经济、军事、政治援助绝大部分都给予了国民党，结果是反过来帮助了蒋介石。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服从于苏俄利益的需要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其目标是全力支持并帮助国民党推倒亲西方而对苏不友好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一个像土耳其亲苏德基马尔政府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新生的苏维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是将来的事，当前还未及考虑。为此，斯大林全力支持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让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斯大林指示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在国民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支持国民党的北伐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只能协助北伐战争而不能妨碍北伐战争，更不能破坏国共合作。为此，苏联把大量的资金和军火供给了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1923 年 6 月至 1927 年 7 月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 26 万卢布；1924 年至 1927 年 6 月，其对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 1400 万卢布。[①] 苏联向孙中山援建了黄埔军事学校，帮其培养和训练大批军事干部，还向中国派遣了大批政治、军事顾问。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时急需大批有政治觉悟和丰富实际经验的政治干部，1924 年 1 月苏俄政府就派出了一个顾问小组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黄埔军校开学后，苏俄政府又派出 50 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人，组成顾问团到达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开办时，资金困

① 朱洪：《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简况》，《党的文献》2007 年第 2 期。

难，武器奇缺，苏俄送来了10支小手枪，8000支完全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有500发子弹。此后苏俄继续运来大批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计有步枪18000支，机关枪90挺，子弹1200万发，子弹袋4000个，军刀1000把，大炮24门，炮弹1000发。为解决军校经费困难，苏俄政府还资助现金200万卢布。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假如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就不可能有黄埔军校，也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

在北伐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国民政府还是在国民革命军中，都有大批苏俄顾问。据苏联学者统计，这个时期苏联共向中国派遣了135名军事顾问。北伐作战方针及作战计划也是在苏俄顾问帮助下制订的，一些主要的战役也都有苏俄顾问参与指挥。苏俄顾问在指导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同时，还帮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建立了生产武器弹药的工厂，帮助国民革命军装备了一些修理厂，培养了一大批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制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

大革命的失败显然与共产国际有关，也和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有关，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说逼迫下进行的。我们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被苏联所操纵，也就是被斯大林个人所操纵。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十分“关心”，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1927年间专门讨论中国问题122次，共作出738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又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

4. 党处在幼年时期：不成熟的党与不成熟的领袖

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党的状况时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

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①]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其间只有四年时间。我们不可能等到理论完全准备成熟了再建立党，也不可能等到理论完全成熟了再来进行革命。党是在斗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但是，党处于幼年的现实，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和陈独秀的离职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成熟的党与不成熟的领袖”的一种表现。

党的“幼稚”、“不成熟”首先体现在尚未摆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色彩和影响，未能适应从学术性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转型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由研究性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政党的。如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这些知识分子的同仁团体是共产党成立的渊源。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衍化、发展起来的，其主要成员大多是当时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进步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当时，他们主要活动于“三社二团”（即星期评论社、民国日报社、新青年社、上海工读互助团、沪滨工读互助团）之内。成员大多为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编辑、记者等。他们能写善说，理论水平高。这些是实现政党政治的有利条件。但是，一则，他们多少带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存在对社会底层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尤其是对广大农村和农民缺乏了解等缺陷，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二则，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绝对化的倾向也十分明显。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要么全部肯定，要么全部否定，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完全对立。陈独秀晚年检讨他的思想方法时也说过：“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这种思想方法可以使陈独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成为思想家、理论家，却妨碍了他成为一个策略性强的、能屈能伸、左右逢源的政治领袖，无法做到在化解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这种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会影响到他的理论，如他的“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就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力量雄厚，也有能力领导，因而应当一切权力归国民党；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获得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只有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后，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时候，才可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二次革命。这种把革命阶段截然分离的理论，导致了在实际斗争中不敢大胆谋求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沦为资产阶级的“帮工”，因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

党的幼年不成熟性既表现在陈独秀身上，也表现在全党。这时期全党的幼稚主要表现在“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历史特点之一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①] 因为理论准备不足，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比如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但陈独秀对苏俄和列宁主义的了解，却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的“二手货”。

维经斯基从 1920 年 5 月到上海，到 1921 年 1 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0 页。

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①]

5. 个人性格：叛逆与服从的纠结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曾说：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是一个人在现实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如谦虚或骄傲，诚实或虚伪，勤劳或懒惰，坚强或懦弱，果断或犹豫等都是人的性格特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命运是自己选择和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性格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养成，也会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影响下发生改变。人的性格作为一种潜意识便是主观因素之一，而且是主导型的因素。性格会影响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关键事情上左右人的抉择。所以，性格是一个人命运的主导因素。正如荣格所说：播下一种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②]

陈独秀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会受到其性格的明显影响。陈独秀自己有一首诗可以算作是个性自描：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固执坚毅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老朋友章士钊对他也有一评价：“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不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这是对其性格的最好写照；陈

---

①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② 〔瑞士〕荣格：《荣格的智慧：荣格性格哲学解读》，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 页。

独秀胸怀坦荡，从不讲假话，喜怒形于色，坦率直言。鲁迅1934年8月1日写《忆刘半农君》说到陈独秀："假若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心直口快，待人真诚，在党内是有口皆碑的。瞿秋白曾对秘书羊牧之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郑超麟也说陈独秀就不搞阴谋诡计，他拍桌子骂人，但不在背后暗算人。邓小平曾说到党内"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①]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陈独秀不讲假话。他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他身体很好，从不休息，不是同人谈话就是写作。陈独秀讨厌在队伍内部瞎折腾，反对自己人整自己人。不管别人怎么反对他，公开辩论也好，当面发火也好，谈不拢拂袖而去也好，但他就是不利用职权罗织罪状加害于人。刘海粟在监狱探望陈独秀，索字留念，陈独秀赠其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正是他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写照；陈独秀风骨傲然，视富贵如浮云。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物，中过举人，做过知县，不断升迁到知府、知州、道员，而且很有经济头脑，亦官亦商，在东北、北京、杭州、安庆等地广开商店，置产业，聚资数万，还在安庆贵池殷家汇置地800多亩。仅在安庆四牌楼附近的房产就有近10处，又在安庆南水头盖有一座公馆，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与李鸿章比邻而居，成了令人羡慕的"安庆望族"。但是，陈独秀从来没有享受过继父的一丝一毫。在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他宁可过贫穷艰

---

① 李庚辰主编：《红旗飘飘》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1页。

苦的日子，也没有动用过继父的遗产。陈独秀走南闯北，从不依赖父辈留下的私产，贪图安逸生活。他一生中很少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收入，常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是个穷知识分子，时人都称他为“寒士”。1937 年 8 月 23 日从南京监狱释放后，面对种种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不为所动。晚年在江津，陈独秀在政治上遭受了一连串的坎坷，在物质生活上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但即使这样，他也坚拒嗟来之食，尤其对来路不明的赠款，都退回去。很多人都送他钱，但他有的收下，有的就坚决不要。如蒋介石、张国焘以及国民党内很多高官都曾送钱给他，他都退回去了。临死时，他嘱咐妻子要自立，不要利用他的声望卖钱，要自谋生路；陈独秀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婚姻生活、对待子女的教育都不落俗套，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

陈独秀也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争论时容易态度粗暴，作风生硬。章士钊说他“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后，他的毛病——作风粗暴、生硬，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那么个火暴的脾气。李达批评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党的领袖人物来说，确实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的个性融合在他的血液之中，表现在生活、工作中。这都无关宏旨。但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这些性格难免就不是弊病。他有着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立思考，但迫于国际纪律又不得不服从国际的指示；这种服从又不是出自于内心的尊重与悦服，心里始终疙疙瘩瘩，在接受国际指示时缺乏灵活性和策略性，显得比较生

硬，不懂得“软着陆”。因此，陈独秀具有独立的人格思想，但在现实中又兼具优柔寡断的特点。比如，在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陈独秀一直持反对态度，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但鉴于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又不得不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事件的处理上都最终接受了国际代表的处理方案；因此，在大革命时期，集中反映到陈独秀的身上，就是他的独立人格与“国际纪律”冲突的过程。陈独秀还把重情重义的个人品性带到了建党活动和革命过程中。因为马林曾从监狱中救过他，他就放弃了不参加共产国际的主张，以中共作为国际的支部；为了“情义”二字，放弃自己本来坚持的原则，甚至动摇信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为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羊而倍感委屈，此时，托洛茨基似乎为他说了话，竟使陈独秀十分感动，就投靠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和信仰。他是一个直爽而富于情感的人，是一个非常合乎人情的人。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这是他成功的基础，但也是他失败的要素。他有坚强的意志，却缺乏冷静的头脑，这是他身为领袖的一大缺点，也是他一生事业失败之症结。



第二章

革命理论家的政治革命

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 年），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1927 年 7 月—1928 年 7 月，1930 年 9 月—1931 年 1 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7 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 11 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 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0 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1 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 年 2 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张太雷）。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1923 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同年 6 月当选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7 月参与创办上海大学。1924 年 1 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 年 1 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后又参加领导五卅运动。1927 年 5 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 7 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临时中央紧急会议，后任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8 年 4 月去苏联，6 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并

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 年 8 月回到上海，9 月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 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 年夏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 年 2 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时担任红色中华通讯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同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 年 2 月 23 日在福建被捕，6 月 18 日英勇就义，年仅 36 岁。

一、"历史的误会"：从《多余的话》说起

为什么使用"历史的误会"这样一个词语？这个说法出自瞿秋白被捕以后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里面写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临死前留下的最后文字，是他在生命行将牺牲以前，也就是他说的余剩的生命最后关头严格剖析自己给后人留下的交代。那瞿秋白是如何被捕牺牲的呢？他留下的这篇《多余的话》又给他的身后带来了什么呢？

瞿秋白于 1935 年 2 月份在福建被捕，6 月 18 日在长汀从容就义。说到瞿秋白到苏区直至牺牲，有人提出瞿秋白的三个"不得不"，即"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1. "不得不走"

"不得不走"指的是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 1904 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 1907 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米夫以共产国际为招牌，狐假虎威，肆意干涉中共党内事务。


瞿秋白的资料照片（新华社稿）

瞿秋白与米夫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后来王明、博古又假手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进行迫害。其缘由就在于米夫天大的野心。米夫想做中国党的“婆婆”，必先做中国党的思想、理论和精神上的领袖，进而达到完全控制中共的目的。米夫生于1901年，小瞿秋白两岁，曾兼任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当时，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研究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农民问题》，文章批判托洛茨基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训》使米夫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专家”，《中国的农民问题》又使米夫成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茨基，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

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1928 年 6 月，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跃，以指导者和决策者的面目出现。据张国焘回忆说：“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加压力。……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其实，米夫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米夫的这一做派首先遭遇到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他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研究，曾发表过《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章。他对米夫的这种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研究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与米夫的奋斗目标自然会产生冲突，引起米夫的忌恨。米夫真正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中共六大上，米夫与瞿秋白均分在草拟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小组。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米夫夸夸其谈，而瞿秋白对其却不置一椽。六大上，瞿秋白当选政治局委员，且被决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莫斯科。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更为繁密的交集。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瞿秋白忍无可忍，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就更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

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王明一派对瞿秋白的忌恨首先源自于对“江浙同乡会”的调查和处理。“江浙同乡会”是王明等人所捏造的发生在中山大学学生中的一个子虚乌有的所谓反党秘密小集团。中山大学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举办的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政治

学校，在校学生最多时六七百人。1925 年开办时米夫任副校长。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比较集中的地方，中共代表团理应协助共产国际办好中山大学。但米夫总是借口如何办学是学校的内部事务，拒绝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过问。中大绝大部分学生对学校的方针和由米夫、王明控制的党组织支部局十分不满，闹得很厉害。米夫不是接受意见改进工作，而是对学生施加压力，甚至妄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打击。先是斗倒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即叶青），让王明一举成为“学生公社”主席；而后米夫、王明联手又把原校长撵下台，米夫稳稳地登上中山大学校长宝座，王明则当上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通过这几场斗争，米夫与王明结成了利益同盟。王明也开始网罗和编织自己的小宗派，打击异己。“江浙同乡会”就是其中典型事件。王明把来自江浙及其他地区的不同意见者都划归这一“反党秘密小集团”，向米夫建议彻查，严肃处理。此事闹得很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向忠发、周恩来都介入了此事。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校方决定开除十二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逮捕了四人，一批学生受株连，俞秀松被打成了托派。党的六大以后，苏兆征、周恩来过问此事，发现所谓“江浙同乡会”存在的证据不足，希望他们慎重从事。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后，代表中国党调查这件事情。瞿秋白态度是公正的，他找了当事人谈话，看了一部分格伯乌的调查材料，发现材料和一些推论结论矛盾百出，没有一件材料可以证明“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只不过是同乡同学间的一种经济互助而已，并不能得出它是反革命组织的结论。瞿秋白于是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不要轻易批准联共中央监委的报告，并建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处理这个案件。1928 年 7 月 27 日，苏共中央监委召集有关各方如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和格伯乌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上述三方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成立“江浙同乡会”事件委

员会，负责调查解决这一问题。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参加了事件调查委员会。经过近半个月的阅读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方负责人谈话等缜密调查，证明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纯属子虚乌有。该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于 8 月 10 日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根据该大纲的意见，联共（布）中央监委起草了《关于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指控被怀疑参加这个互助会的同志反党、反革命、与国民党右翼军阀分子有联系、支持（谭平山等人的）第三党、试图夺取中共领导权和实现这类政治目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并认为“江浙同乡会”一案“已被撤销”。米夫、王明挑起并鼓噪一时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也就不得不就此收场。

对“江浙同乡会”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异议让米夫和瞿秋白关系日渐恶劣，也使王明一伙将瞿秋白视为仇敌和直接的打击对象。虽然说，瞿秋白并未自始至终参与此事件的处理，他是自从 4 月离开上海来到莫斯科后，接连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两个会议，紧张的工作，过度的劳累，使他的沉疴肺疾复发，去巴库疗养。当时中共代表团参加处理“江浙同乡会”联席会议的代表是周恩来和苏兆征，瞿秋白并没有出席会议。但仍然有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江浙同乡会”与瞿秋白挂上关系，别有用心地将他指为“江浙同乡会”的后台。还在雅罗斯列夫斯基调查“江浙同乡会”问题期间，就有人反映说：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说瞿秋白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组织自己的一派，而那些“江浙同乡会”的人为使同乡会得到发展，必然与瞿秋白等人发生关系。这种“分析”可谓有鼻子有眼，让人忍俊不禁。它表明因“江浙同乡会”问题引起的猜忌、倾轧有多么严重和可怕。到 1929 年，在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中，“江浙同乡会”更成为王明和米夫等人排斥异己、打击瞿秋白的一把利剑。

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发动“清党”，中山大学当然也不能幸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1929年底，中大的清党活动一开始，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就公开指责瞿秋白和张国焘这两个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张国焘右倾），这种对本国党的领导的公开攻击，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而在清党过程中，瞿秋白和张国焘都受到了支持托派的指控，而这些指控则全部来自中大。据盛岳回忆：“我们同时审查他们（指瞿秋白和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时间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瞿景白做了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瞿秋白为此悲伤不已。

1930年8月，瞿秋白受共产国际委派，与周恩来一起回国，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8月初，他与周恩来一起离开莫斯科，取道欧洲回国。瞿秋白离开了莫斯科，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逃避米夫对他的继续打击。9月，瞿秋白与周恩来共同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作了《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一面批评李立三等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错误，一面又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最

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中央一向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的，就是完全同意中国革命高潮一定到来的总路线上的，在这立场上来布置工作是对的"。总的说，六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一次会议。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30 年 9 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它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撤销了中央总行委及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及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指导机关里的支配地位和作用；全会正式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这对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是，随着李立三在 7、8 月间的一些藐视莫斯科权威的观点、语言、想法、行动等信息陆续传到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十分震动和恼火，对李立三的斗争也骤然升级，自然也牵涉到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立三路线"揭发不充分的问题，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瞿秋白及其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指控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及其指示信到中国后，被王明宗派小集团利用，成为米夫、王明集团打击瞿秋白，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借口。他们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进行宗派活动，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以便彻底改造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机构，并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完全由米夫操纵、帮助王明一伙上台的不正常会议。米夫亲自与会，并严严实实地控制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压制对于召开这次会议的一切质疑。会上，瞿秋白又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靶子。王明在会上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其中点名批判瞿秋白，认为他作为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政治领导者与李立三的

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非彻底批倒批臭不罢休。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调和态度”、“两面派态度”、“右倾政治意见”等帽子。米夫、王明一伙不仅集中火力展开对瞿秋白的思想斗争，而且还采取组织措施，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六届四中全会最后由米夫“钦定”名单对中央委员会进行补选，对政治局进行改选。结果，不是中央委员的陈绍禹（王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贺昌四人离开中央领导机关；另外，反对“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和王明宗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完全遭到排斥。在生活上，王明主导的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他没有抱怨，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瞿秋白这段时间在党内报刊《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上面以“狄康”为名经常发表时政论文及杂文，紧密联系时事新闻，运用杂文手法，冷嘲热讽，针砭时弊，以小见大，尖锐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及其图谋。但是，瞿秋白没有想到他的文章却再次招来了在全党范围内的“无情斗争”。为了配合博古等人到中央苏区后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罗明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和“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被博古指定为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1934年6月被捕后叛变，成为中统特务）在上海揪出瞿秋白作为斗争的靶子。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

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时还作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尽管瞿秋白极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所代表的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2. “不得不留”

“不得不留”指的是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不愿带走瞿秋白随军长征，而让他留在苏区根据地。

瞿秋白是在 1934 年 2 月初抵达瑞金的。来根据地之前，瞿秋白就在根据地革命政权中担任着一定职务。在 1931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任教育人民委员；193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 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就在瞿秋白抵达瑞金的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1934 年 2 月 5 日，瞿秋白来到根据地后，还兼任了《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瞿秋白在根据地有一种归家的感觉，见到了许多相识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为能与他们一起共同为建设根据地而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焕发出崭新的激情，抱病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据刘英《秋白同志在苏区》回忆：秋白同志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他的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书和文件。在这间屋子的外面另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张旧长条桌和几条长板凳，这是大家开会的场所。每次开会，秋白同志总是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给大家倒水。尽管大家喝的是白开水，可是都很

高兴，会场气氛活跃，谈笑风生。秋白同志喜欢用毛笔，在他的破旧桌上放着一墨盒和几支毛笔，还有苏区造的粗黑纸张，可他用这些简陋的文具不知写了多少文件，花费了多少心血！庄晓东在《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中也回忆道：中教部系统的同志们的工作热情是高的，干劲是大的，但问题也不少，有时一大堆，几乎处处要秋白同志亲临指导，一处不到一处不了。在他的小小卧室兼办公室，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等他答复解决，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秋白同志一向是终日伏案，埋首写作，需要安静的，这时他的习惯和作风却变了。有人来找就见，有事要解决就谈。不但约人来谈，而且还亲自下去调查了解。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学着骑马。他自己是一个病人，还骑马跑得很远去看望患病的同志。一次骑着马飞跑着去看正在养病的王稼祥和其他几个同志，他们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秋白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但一早起来骑马出去了。晚饭后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去散步，有时还同大家打打球，在厅里就放着一张乒乓球球台，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秋白同志变了，变年轻了。"其实呢，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暲医生天天都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卧床，但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他这种带病工作的忘我精神，实在令人钦佩！[①]

3. "不得不死"

"不得不死"指的是瞿秋白的牺牲。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① 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1—392 页。

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走了，还得有一部分同志必须留下，继续在这里打游击，牵制敌人。谁走谁留，成了当时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虽然早已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很多人渴望的。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张闻天 1943 年 12 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①] 另据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

---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 12 月 16 日），载遵义会议纪念馆编：《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 页。

见，那就永别了。’”[①] 就这样，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又戴着重度近视眼镜、根本无法掩饰其身份的瞿秋白留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中央苏区，随着其他留下的同志一道打游击。

留守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分局，瞿秋白任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由顾祝同、蒋鼎文分任南、东西路总司令，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所谓“全面清剿”，雩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1934 年 11 月底，蒋介石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十二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十万大军像篦子一样篦过去篦过来，不留任何间隙，让红军无处藏身。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 年初，中央分局决定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2 月 11 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动身，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经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安排，这一行人，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还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他们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于 2 月 24 日拂晓渡过汀江，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就在这里，他们被当地地主武装发现，报告给保安十四团，受到围攻。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躲在半

---

① 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 年第 5 期。转引自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编：《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3 页。

山灌木丛中被发现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瞿秋白自供为林琪祥，现年 36 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曾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 年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被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主力红军转移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 年 1 月携款逃离，走到水口又被苏区地方武装抓获，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料被你们的武装发现俘获。瞿秋白趁敌人尚未搞清楚他的身份之际，写信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等人。请他们找铺保保释他出去。鲁迅在得悉瞿秋白被捕以后，多方设法营救。但这时敌人也清楚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营救未能成功。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送给瞿秋白的对联。鲁瞿二人从 1931 年 5 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 年夏秋之交，两人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扶助和掩护瞿秋白，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无间。从 1932 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首先想到鲁迅。鲁迅和许广平也总是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瞿秋白多次对党内同志说起鲁迅：“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为帮助缺衣少食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二心集》的版权，这在鲁迅著作中是唯一例外。《鲁迅全集》当中，有十多篇文章是瞿秋白和鲁迅漫谈之后写成，再经过鲁迅修改，用他的笔名发表。在鲁迅一生中，除早年与二弟周作人合写之外，再难找文笔交融、文思相通的知音。鲁迅营救瞿秋白失败后说，瞿若不死，译《死魂灵》这种书是极相宜的。1935 年 10 月 9 日，鲁迅带病校编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他写的《介绍〈海上述林〉上卷》中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敌人是怎样知道瞿秋白的真实身份的呢？原来，在 4 月 10 日，中共

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名不详）被捕，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都在濯田地区被俘。这一消息很快被电告驻防在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进行紧急查报。这时，三十六师所俘获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郑大鹏（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当过炊事员，红军长征后回上杭国民党保安十四团钟绍葵团部做炊事员）也已供出瞿秋白等被俘情况。

瞿秋白被俘后来还牵出一桩冤假错案，即周月林和张亮为瞿秋白被捕而蒙冤几十年。张亮后来不知所踪（亦说在 1938 年 7 月，张亮被保释出狱后来找寻丈夫项英时，项英怒不可遏地一枪击毙了她。）周月林则蒙冤难洗，被关押多年。周月林是当时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梁柏台的夫人，且是中央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中央红军长征后，梁柏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工作。195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市革命公墓（今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要求有关部门缉查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和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到了永定县，与张鼎丞会合，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只有张亮和周月林一起被俘，瞿秋白被杀害了，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被俘没多久就被保释出狱，三年后又被放了出来？张亮已死，只有周月林还活着。于是，在 1955 年 8 月 24 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65 年 12 月 24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周月林 12 年徒刑。直到 1979 年，周月林又一次提出申诉。1979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中学时代，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还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因仰慕瞿

秋白的学问，曾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过共产党。不过，他始终是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健将”。宋希濂见到瞿秋白后，先指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宋希濂这样做，既有师生之谊，最终目的是玩弄以柔克刚手法，软化瞿秋白。他知道瞿秋白声望大、位置高，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但瞿秋白不为所动，几次交谈都只能给瞿秋白宣传主义的好机会。审讯没有突破，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依旧毫无所获。6 月 16 日，蒋介石密电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 月 18 日，吃过早饭后，瞿秋白先是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全唐诗》；后又将唐人诗词集句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据天津《大公报》报道：是日，瞿秋白来到长汀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而且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唱着《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

点头说："此地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刽子手从脑后开枪。瞿秋白从容就义，年仅 36 岁。当日下午，瞿秋白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瞿秋白临刑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的留影（新华社稿）

瞿秋白视死如归，理应名垂青史，但是他在被俘期间写的《多余的话》，却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名声。瞿秋白牺牲后，刚开始的时候还享受着哀荣，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的评价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①] 1950 年 12 月 31

---

① 陈光林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员学习修养大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53 页。

日，毛泽东应杨之华的请求，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说："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① 1955 年 6 月 18 日，在瞿秋白英勇就义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同志主持安葬仪式并亲扶灵柩入殓。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他简要地回顾了瞿秋白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对瞿秋白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报告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②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风云突变。《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瞿秋白也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之一。1967 年 5 月 12 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挫骨扬灰。

"文化大革命"后，瞿秋白的历史冤案开始得到纠正。1980 年 2 月 29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瞿秋白的问题指出："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③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负责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复查工作，最后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肯定了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

---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57 页。

② 薛庆超、李景林、薛志超著：《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形成》，群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6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8 页。

党的立场，坚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则迄今未找到手稿，“即使就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分析《多余的话》，它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①] 1980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给予了“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评价。

至于是否有《多余的话》的问题，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多余的话》是 1935 年 5 月 17 日到 22 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在监狱写的自传性文字。全篇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六个部分。到目前为止，人们看到的《多余的话》都是抄件。据当时到狱中采访瞿秋白的《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唯一的一次采访）说，原件是写在黑布面练习本上，用蓝黑墨水的钢笔书写的。这“黑布面练习本”是否就是杨之华分别时给他买的黑漆布面笔记本？不得而知。又据说，瞿秋白在监狱时就托人将原件寄到汉口一个亲戚家。亲戚是谁？寄到没有？也不得而知。但是就《多余的话》的内容来看，伪造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瞿秋白所作。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敌人为了自己的宣传效果，对其进行删改的可能。[②] 1964 年，周恩来同毛泽东和陆定一在人民大会堂谈话时说过他看到过真迹，是可信的。另外，丁玲说在延安的时候，人家都说《多余的话》是假

---

① 朱钧侃、刘福勤等主编：《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大事记述》，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 页。

② 张秋实：《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东方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7 页。

的，她说她一看，谁也编不出来，谁也写不出来那种风格的文字。她说她对瞿秋白太熟悉，和瞿秋白感情很好，也最崇拜瞿秋白，没有人能够模仿得了。有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见到宋希濂，宋说瞿秋白确实在监狱里写过《多余的话》，并且说我们那里就没有这种人有这样的水平，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瞿秋白，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无法改动，再说改动有什么用？没有用，对瞿秋白没有任何影响，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投降的。

我们看看《多余的话》究竟写了些什么。

所谓“历史的误会”，即指他本是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使他走上了政治革命的舞台，并且把他推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地位。这个“误会”的缘由就是因为家中贫寒、无钱报考北大、只能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开始的。因为学了俄语，所以来到了苏俄，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列主义，参加共产党，开始了其“文人”的政治生涯。他坦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主义的烈士，我对政治早已厌倦，“我只要休息”。在结尾时他写道：“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也就是说，瞿秋白写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为的是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说明尽管他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但由于始终未能克服“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因此终于未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人。即使曾经当过党的领导人，那也是“历史的误会”。这就是瞿秋白的“心忧”所在，也是他从一个普通的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及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真实的心路历程的描述，是他写作《多余的

话》的目的所在。

要读懂瞿秋白革命历程的“历史的误会”，我们还得从他的生平谈起。

瞿秋白 1899 年 1 月 29 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奶名阿双，小学及中学初期学名瞿双，别号瓠舟、铁柏、铁梅，又作涤梅；后来，改名为瞿爽，或作瞿霜，同时又改号秋白。

瞿秋白自幼家道中落，母亲因家贫自杀。1916 年，本想去考北京大学，但无奈付不起学费。1917 年 4 月，应文官考试，结果没有被录取。他就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去旁听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课。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无钱升学，生活无着，瞿秋白只得“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入学时间是 1917 年 9 月。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将决定他终生的命运。这段时间是瞿秋白在深深的苦闷中彷徨的时候，也是他选择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期。

在绝顶黑暗的社会，置身于穷困清苦、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这一切都催促着瞿秋白心灵的早熟。他憎恶这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这个社会使他变得过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却往往表现为冷漠和避世，借助于经学、佛学这类传统而陈旧的思想资料。这反映出他不满现状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他后来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

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那时瞿秋白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融入了这个青年学子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现实的生活也促动着瞿秋白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触动着他对社会问题的探求。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瞿秋白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种，即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图存的大火连接在一起。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也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 5 月 4 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瞿秋白组织游行，撰写文章，上街发表演说，因此而两次被拘捕。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思想发展的里程中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开始冲破个人孤独的、满足于心灵探索的壁牢，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爱国反帝斗争。他后来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于是，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6 月 3 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他被捕了。他鼓励前来看望他的同学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6 月 8 日瞿秋白等被捕同学被释放，受到上百名学生的欢迎和庆贺。瞿秋白成了同学中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的领导的天才。"两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并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压迫与向往光明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变革，需要步入新时代。

五四运动既使瞿秋白受到震惊、鼓舞，又使他进一步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深重，促使他去思考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去探索中国的出路。于是，瞿秋白便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一道组织筹办《新社

会》旬刊。在《新社会》旬刊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涉及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人生问题。这些文章的政治倾向性也开始明白地显露出来。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黑暗反动统治，认为中国只有“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才是生路。他明确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指导群众运动的新的信仰和指导青年正确对待生活的人生观。他认为，要使社会改造获得成功，那就必须把群众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建立“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用“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去创造“新的生活”。他对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倍倍尔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抛弃了各种外来思潮中的流派和社会改革方案，参加了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倾向于社会主义，表达了初步的社会主义信念。

不久，瞿秋白觉得书本上的求索和朋友间的探讨，对社会主义仍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看不真切。他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认个清楚，就应当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俄国去。1920 年 10 月，他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他是 1921 年 1 月 25 日到达莫斯科的，一直到 1922 年底，在苏俄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两年之中，先后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章上发表了 50 篇通讯报道和专论，计 20 余万字。此外，还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等 4 本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专著。这些报道和著述以第一手的材料和感悟，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苏俄当时状况，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瞿秋白广征博引各种文件、报告和著述，扼要而全面地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中国读者见到了人类的曙光，从而激励无数有志之士向往俄国，信仰马克思主义，以苏维埃俄

国的今天为中国的明天，并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未来而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

可见，瞿秋白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并不是因为学了俄文而造成的“历史的误会”，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人生选择。从这一点上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

二、当选主要负责人：革命理论家

瞿秋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未被正式任命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领袖人物。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写的《八七会议》中指出“八七会议只选举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在八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产生的。有的教科书说‘八七会议选出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是不对的。至于说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则更是误传。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八月九日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管农委、宣传部和任党报总编辑，实际上负责抓全局工作，但从来没有使用总书记的名义。”① 但瞿秋白的领袖地位和作用是得到肯定的。1964 年 4 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导人，一是陈独秀，二是瞿秋白，三是向忠发（实际为李立三），四是王明、博古，五是洛甫（张闻天）。这就是肯定了瞿秋白在党内实际上起到过最高领导人的作用。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瞿秋白正式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或代理总书记、总负责人。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奇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每一时期都设有最高领导职务，并通过某次会议选举出最高领导人统领全局，负责党中央工作，但也不止一次地出现曾负责党中央工作却没有正式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瞿秋白如此，后来的李立三、王明、博古、毛泽东亦类似。那瞿秋白是如何成为党内实际负责人的呢？

---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0 页。

李维汉曾经有一段话可作一些说明："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是驳斥彭述之的谬论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们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①] 这段话比较明确地说明了瞿秋白担任党的第二任领导人的基本缘由。

1. 由驻俄记者到马列主义宣传家：系统介绍共产国际的第一人

瞿秋白是在苏俄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的。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的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实现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他写的《饿乡纪程》，向中国人民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与中国国内的黑暗相比较，说明了中国人走俄国人道路的必要性。1921 年 6 月，他以记者的身份，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休息时见到了列宁。1922 年 2 月经张太雷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9 月，瞿秋白除担任新闻记者外，开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

---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1 页。



熱血日報

中國人不能受外國人統治

中國的上海歸中國人管理

全國各界聯合一致對外

由瞿秋白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新华社稿）

（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生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从远东各国来的，其中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生。中国学生单独编为中国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肖劲光等都在这里学习。瞿秋白在班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瞿秋白亲临其境，耳濡目染，对共产国际就近观察、思考，而且使用的是俄语，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宣传、介绍比较全面系统，甚至有较深入的研究。如在报道俄共十大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一文中，专门写了“第三国际会”一节；以《莫斯科之赤潮》为题，报道了1921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四个国际性会议。此后他接连写了《世界劳工之统一战线与莫斯科》、《反对社会革命的革命党》、《世界的

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世界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少年共产国际》等介绍和研究共产国际的文章。

瞿秋白在苏俄工作了两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因而马列理论水平较高。在苏俄期间，他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并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加之瞿秋白的所具备的能说会写的俄语能力，逐渐在共产国际人员中已经赢得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受到了俄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视。1922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维经斯基曾经鉴于瞿秋白是一位“通晓俄语的好同志”，与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商量，希望能调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工作。他认为，瞿秋白到共产国际海参崴局工作是合适不过的事。

但维经斯基的想法并没有实现。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见到了瞿秋白，改变了主意，要调瞿秋白回国工作。大会期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一直随同陈独秀口译会议讲话和笔译文件、大会简报。由于朝夕相处，配合密切，瞿秋白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理论素养和个人能力，以及精熟的俄语翻译水平，新生苏维埃国家对他的革命熏陶和他撰写的旅俄通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瞿秋白熟悉十月革命和苏俄各方面的情况，认识苏共领袖人物，也非常熟悉共产国际方面的事务；他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形象的人，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所有这一切，使陈独秀对瞿秋白不仅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而且十分赏识并寄予厚望。瞿秋白也考虑到在苏俄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只涉及俄国的情况，却缺乏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于是共

产国际四大一结束，当陈独秀动员他一道回国工作时，瞿秋白欣然遵命，决定告别驻俄特派记者生涯，跟随陈独秀回国工作。1922 年 12 月 21 日，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两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国。

瞿秋白回国后，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和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同时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瞿秋白迸发出火一样激情投入到工作中，发挥自己所长，焚膏继晷地编刊，写文章。1923 年 6 月 15 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自己一个人就在上面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六篇理论文章，创作了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三篇。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也很多。此外，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从 1923 年 1 月到 1927 年 7 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 200 多篇，100 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作为一个杰出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瞿秋白是当之无愧的。[①]

瞿秋白回国后还参与了上海大学的创办。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成立于 1922 年春，学生 160 多人，校舍与设备均极简陋，是典型的弄堂大学。开学不久，该校校长竟携全校学生所预缴的学膳费溜到日本去留学，全校学生愤而发起改组运动。1922 年 10 月 23 日，上海大学召开成立大会，于右任就任校长。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经李大钊推荐，共产党员邓中夏到校任教务长。陈独秀为了切实加强上海大学的领导力量与教学力量，决定派瞿秋白参与筹建，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与瞿秋白一道，整顿校务，对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教师队伍、学校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改革。他们以“为应社会之”为办学宗旨，引导学生心怀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之目的，把上大办成时代性、革命性凸显，能够担负时代所赋予的革命使命的大学。在他们的主持下，上大最有特色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搬上了讲台，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任主任的社会学系，开设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并通过其他课程的讲义，来阐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上大教学活动中产生的，如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等。通过革命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初步地接触了马列主义学说。这就为学生们提供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不少同学以此为起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上海大学虽然是由国共两党共同

---

① 金再及：《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 10 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5 页。

举办的，但在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主持下，上海大学成为了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园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堡垒。当年国共两党对上大的共同评价是："广东可说是革命策源的大本营，而上海大学好比是派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虎穴奋斗的先锋队"。[①] 其中瞿秋白功不可没。

瞿秋白在工作中与陈独秀建立了良好关系。起初，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大多数问题上意见还是一致的，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也引起了两人的不同思考，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陈独秀和瞿秋白相差整整 20 岁，瞿秋白一直将陈独秀视为前辈长者，十分敬佩他的思想和学识，把他看作是他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早在 1917 年，瞿秋白就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也拜读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也正是受《新青年》的影响，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两人回国后，陈独秀对瞿秋白委以重任，让他主编《新青年》、《前锋》等党内机关刊物，还为他的《赤都心史》的出版盛情地向胡适推荐。而瞿秋白也坚定了同陈独秀一起干革命的决心和信心。瞿秋白回国后，李大钊准备介绍他进北大任俄文教师，外交部也打算聘用他，月薪 200 元。但瞿秋白最终选择和陈独秀在一起，到上海做一个职业革命家。1923 年 3 月下旬，在筹备中共三大时，陈独秀将三大党纲草案的撰写任务交给了瞿秋白。草稿完成后，陈独秀作了一些修改，瞿秋白由此发现，他们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如在领导权问题上，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陈独秀却一口否认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说"只愿打头阵"，"不敢说是领袖"。这种分歧，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越往后，这两种思想分歧就越大，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1926 年第 1 期。

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负责人。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中央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这标志着瞿秋白在中央领导层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亟待党的领导人从理论上加以解答。而这时，陈瞿二人的思想矛盾也就日益明显。特别是在1926年“三二〇”事件后，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关于北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迎汪抑蒋”、上海暴动、革命发展方向、农民运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都有不同见解，甚至出现不可调和的状况，最终导致瞿秋白在党的五大上对陈独秀路线发难。

尽管思想分歧存在，瞿秋白对陈独秀的尊敬却是一如既往。在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副标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的小册子，指出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层发生的17例右倾错误，赢得了代表们的广泛支持，蔡和森、任弼时等人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也展开了批判，陈独秀被迫作了检讨。但瞿秋白在他的小册子中，出于对陈独秀的尊敬而没有直接点他的名，而只点了紧紧追随陈独秀的彭述之的名。瞿秋白始终维护陈独秀的领导权威和威望，对其人格品行给予肯定。他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当时各地对五大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反映很大，瞿秋白对秘书羊牧之严肃地指出：“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他又没有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又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也正

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瞿秋白批判陈独秀错误时，总不点陈的名，而点彭述之的名。瞿秋白这样做，用宗派主义的观点看，是搞“清君侧”；从良知和人品看，则是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表现。[①] 八七会议上，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拒绝陈独秀参加。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所，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要求，到莫斯科去。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在上海创办了《布尔赛维克》刊物，瞿秋白和李维汉专程看望了甫抵上海的陈独秀，邀请他写稿。陈独秀以“撒翁”笔名一共发表了 140 多篇短文，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后来，瞿秋白在中央负实际领导责任，因为“左”倾盲动主义而受到批判。在经历了这一段事情后，瞿秋白也加深了对陈独秀的认识、理解和体谅，因而更能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如在党的六大上，瞿秋白说，至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现在，只能说他（陈独秀）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错误应由中央政治局负责。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瞿秋白对陈独秀的评价也显示出宽容。他说，对于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至于过去，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看到瞿秋白对他的这些评价。

2. 由国际代表助手到中共领袖：五大后的中央常委

国共合作是党在建立后推动国民大革命的一大功绩。国共合作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倡议，陈独秀对此则抱抵触情绪。在陈独秀的心目中，国民党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与之“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

① 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共早期两代领袖的悲情人生》，团结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8 页。

对国民党没有好感的陈独秀甚至说出“宁死不加入国民党”的话来。但是，马林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只好遵命执行。这时候，中共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随着“二七”惨案的发生而陷入低谷。这也教育和启发了中共领导人，在中国，仅靠城市工人阶级，革命力量显得单薄，必须联合社会其他各革命阶级，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于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推动下，从 1922 年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加快了步伐。瞿秋白全力投入促进国共合作的活动中，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的开拓者。在三大上，瞿秋白积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驳斥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左”的谬误，得到了张太雷、毛泽东等人一致响应，使大会作出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瞿秋白的观点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称赞。马林在致越飞、达夫谦的信中，兴奋地提到了瞿秋白，说：“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日，在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马林再次谈及瞿秋白：“在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青的瞿秋白同志与他看法相同。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回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关于俄国的书，该书起初获陈独秀的极好评价。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① 瞿秋白由此而引起了共产国际高层的深切关注，并进而被来华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的鲍罗廷点将，成了他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 2 卷，转引自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3 页。

的主要助手和翻译。随着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推进，鲍罗廷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枢纽，瞿秋白的地位也日显重要。三大上，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开始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瞿秋白与国际代表保持着良好关系，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923 年 10 月，苏俄政府根据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派遣鲍罗廷来广州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性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为此，鲍罗廷必须选择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精通俄语的中共党内重要成员担任他的助手，以保持他与中共领导层的联络。在马林的推荐下，鲍罗廷甚至在没有取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把瞿秋白调去广州。瞿秋白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与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就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少不了瞿秋白的参与。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因其如此，鲍罗廷相信应当让瞿秋白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在鲍罗廷的推荐下，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使瞿秋白能够协助自己更好地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鲍罗廷对瞿秋白是何等的重视！直到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瞿秋白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留在上海主持宣传工作，鲍瞿两人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才告结束。

1927 年 7 月，罗明纳兹受莫斯科委派，接替鲍罗廷，成为共产国际全权特使来到中国。从此又开始了瞿秋白与罗明纳兹短暂的政治合作，共同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变，也共同犯下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留下了令人叹喟的一页。罗明纳兹到武汉当晚，就找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事后，瞿秋白又与罗明纳兹单独长谈了几次，向罗明纳兹详细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及紧迫问题，如制定中央新路线、召开党的紧急会议（7 月中旬中央已定）、发动南昌起义以及应对目前残酷斗争问题，帮助罗明纳兹了解到不少情况。这使他更多地得到了罗明纳兹的认识与了解。罗明纳兹一行来华的任务是，立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便能够纠正中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造中共中央领导，帮助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会议原拟 7 月 28 日举行，后因故推行至 8 月 7 日。瞿秋白同张太雷、李维汉一起协助罗明纳兹筹备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所作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参与起草和翻译《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报告时，由瞿秋白做翻译，瞿秋白还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党的新的方针任务的报告。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8 月 9 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瞿秋白被选为三人常委之一，在罗明纳兹的支持下，瞿秋白成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新的领导人。

罗明纳兹之所以在与瞿秋白接触了十来天以后，就选定他作为自己的政治搭档，其原因与瞿秋白个人所具有的一些有利条件紧密相关。首先，瞿秋白曾先后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担任过翻译和助手，其名字早已为莫斯科决策层所熟悉，马林等人在给共产国际的各种报告中多次提及瞿秋白，其中鲍罗廷的“推荐”更为重要。因此，刚来华的罗明纳兹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他。其次，在短暂的工作接触中，瞿秋白的才华引起了罗明纳兹的重视。此时罗明纳兹迫切需要一个可以直接对

话、互相交换意见的中共中央高层次的同志，或者说他需要一个可以依赖的、有文化修养的高级助手兼翻译，而瞿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瞿秋白善于理解罗明纳兹的指示，并加以“中国化”的解释，然后及时地落实到中共中央下达的各种指示中，因此，罗明纳兹感到他与瞿秋白合作，能够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顺畅的渠道。又次，瞿秋白在中共党内享有较高的威信。因此，瞿秋白受到了罗明纳兹的倚重。[1]

---

① 张秋实：《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瞿秋白与罗明纳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三、去职原因：由代言人到代人受过

1. 错误："左"倾盲动主义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指导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的斗争形式。一时之间，党在城市、农村各地都领导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党内的"左"倾情绪滋长起来。瞿秋白所主导的党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高估了形势，不顾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等主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给革命力量造成了新的挫伤。如 10 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应当汇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11 月 1 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通告认为，在全国混战的局面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山东及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通告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武装暴动，

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只有各地努力发动群众，方能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11 月 9 日至 10 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际。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在这种“左”倾政策的指导下，党在城市和农村都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前有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后相继举行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其他还有在湖北沔阳、公安、蒲圻、咸宁、当阳、枣阳、黄安、麻城

等地，广东海陆丰及琼崖地区，江西吉安、东固、万安、泰和、永丰等地以及陕北清涧、直隶玉田、河南确山刘店等地爆发的武装起义。1928 年 1 月，又相继爆发了湘南起义，赣东北弋阳、横峰起义，福建平和起义，渭南起义，平江起义，醴陵起义，赣县、南康、信丰、雩都、寻邬、兴国等地起义，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起义，等等。这些起义的情况各不相同，结果互异。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失败了；有些起义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主观指导上有错误，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数起义，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1927 年 12 月广州起义的失败才对瞿秋白等人有所触动。广州起义虽然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农村去；加之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结果招致失败。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醒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湘鄂赣三省暴动，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是在部署上不像以前首先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等策略。1928 年 2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此后，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于 4 月 30 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追根溯源，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

错误同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有密切关系。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特别是联共（布）、斯大林比过去更加严格地要求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强调必须遵守国际纪律；更加紧了对中共中央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理论上，实行了直接领导。据查，从 1927 年 8 月中旬至 1928 年 6 月上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曾 26 次讨论过涉及中共、中国的议程。特别是 8 至 10 月，联共中央多次以“最高领导机关”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直接发号施令。国际代表亲自为中央起草重要决议、行动计划。[①] 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组成，由国际代表指定或共产国际同意。当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扭转被动局势的作用。如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思想极为混乱，尤其是对于要不要公开地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一原则性问题意见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欲挽救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深刻批判；有的人则担心这样做会“影响中央威信”，还有的人不同意进行批判，像张国焘就公开宣称“不同意陈独秀退出中央”，应该恢复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职务。罗明纳兹来华后，面对着这种思想上的散乱状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力主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迅速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决定》，公开地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路线。为此，罗明纳兹还警告说，凡不按国际训令办事者，一律取消其中央领导人的资格。经过罗明纳兹的不懈努力，中共中央领导层很快统一了思想。

但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共党内从右向“左”的转变同样负有指导责任。与陈独秀跟国际代表时常龃龉不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领导层在感情上更亲近共产国际、联共（布）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常怀

---

①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2 页。

有信任、尊敬和崇敬心理；在经历了联共（布）内部清洗“托季联盟”反对派的情况后，他们在组织上也表现得更为忠诚。特别是他们均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混乱局面中由罗明纳兹一手考核、确定的，因而对国际指示、斯大林的理论以及罗明纳兹的命令执行起来更显得认真、坚决，加上党内“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唯罗明纳兹马首是瞻。所以，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及罗明纳兹的某些错误理论和主张能够在中共内部畅行无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如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多次谈到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由此，他判断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并于 7 月 28 日著文称中国革命“（不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①] 尽管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它却成了这段时期中国党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看作了革命的对象，造成了革命阵营的进一步减缩。在斯大林“革命高潮论”的指导下，罗明纳兹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革命，要不断进行武装暴动。他为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8 月，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4、15 页。

的动力之一”。[1]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的联合，南昌时期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过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1月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决议案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没收资本家财产”、“土地国有”等“左”的主张，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的高潮”。甚至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还认为这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开端。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发展。”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这次扩大会议的“左”倾情绪还体现在组织路线上，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认为，党在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指出这是党内产生机会主义的“策源地”。为此，议决案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会议还要求在党的六大召开之前，彻底改造党的指导机关。

瞿秋白于 1928 年 4 月去苏联，6 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会议还指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2. 性格：柔弱畏葸

我们回到《多余的话》上面来。瞿秋白说他的政治革命是“历史的误会”。但我们要说，瞿秋白的革命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绝不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的革命信仰是他自己的志愿，是他人生经历的轨迹发展的正常逻辑。他自小就是有一个有正义感、憎恨社会丑恶的人，心怀改造社会志向，去选择，去奋斗。而一旦投入革命洪流，其信仰和立场坚定如一，百折不挠。少年时代家庭变故的打击，人生境遇的不如意，他特别憎恶贪

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尽管在强大的现实世界面前，少年瞿秋白深深地感觉到了无力无助，曾经“出世”过，“厌世”过，“避世”过，探求人生价值所在，试图躲避现实，远离政治。最终发现躲避不是出路，于是他很快又开始了“救世”的历程，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社会主义，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皈依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要说我自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切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这些都表达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表达了他选择革命理想的无怨无悔。这种忠诚和坚定是至死不渝的。

但话说回来，就政治领袖而言，特别是担任暴力革命时期的政治领导人，瞿秋白的性格似乎是不太合适。就这一点来说，瞿秋白所言之“历史的误会”，大概就是指瞿秋白本人的兴趣、性情、性格与做一个政治领袖之间难免有点不匹配。在《多余的话》中，他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瞿秋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风格，文艺也是他的爱好。瞿秋白自认为自己是个书生：“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我确是一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书生。”夏衍等曾经的同事也曾追忆说：“从仪表、从谈吐，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秋白同志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常穿一件灰色的哔叽袍子，平顶头，举止斯文得很。善于欣赏各种美好的东西，读到一篇好的文章他会反复背诵，逢人介绍。”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在写作、翻译等方面成就斐然，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有着开创、奠基性的贡献，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但文人终有文人的弱点，尽管瞿秋白的文人性格中的诸多侧面作为文人本身来

讲无关宏旨。如既温文尔雅而又果敢叛逆、意志坚定，平日不多言说而又思维缜密、思想犀利，爱憎分明、坚持真理矢志不渝而又信守忠恕之道，忍辱负重，希望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但作为政治家来说，就难免有些多愁善感，优柔寡断了。瞿秋白性格中最明显的就是偏软，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多了些忧郁气质，少了一些豪迈粗狂，该抗争的不去抗争，该采取强硬的措施不去采取，这些都是文人当政致命的缺陷。在《多余的话》中，他严格地剖析自己：“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撇开这些话中的消极和偏激性，可以看出，瞿秋白还是极富中国传统文人式的弱点的，其“根本性格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更别说要这个最怯懦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书生去做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感觉“别扭”。同时，瞿秋白对自己似乎始终都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他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用“犬耕”作别名示意。在给鲁迅和茅盾的信中，他恳切地解释说：“我从事政治犹如使犬耕田，总觉得力不胜任，做不好工作。但这绝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一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地领导全党的工作，那就是使犬耕田了。”所以，他在这种“扭曲”中颇感疲惫，幻想着回归到他所喜爱的文学上去，“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而“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超越时空条件来苛求前人了，瞿秋白作为一个“学贯中俄”的文人未能“脱俗”，从经历了轰轰烈烈、暴风骤雨的革命斗争到牢

狱之中死寂无望和瞬间而来的平静“闲暇”，从一介书生到政治领袖再到身陷囹圄的“囚徒”，直至即将离世的文人，内心世界的复杂、冲突、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恰好反证了其性格的柔弱畏葸，也正是其精神世界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反省”。瑕不掩瑜，这也使我们丝毫不能怀疑这位具有坚定信仰、坚贞追求、坚持立场的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光明磊落、不懈奋斗、视死如归的一生。

文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有着诗人气质的瞿秋白还不时地表现出浪漫和偏激。瞿秋白的爱情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们之间的婚姻持续了半年，王剑虹患肺病辞世。瞿秋白常以“梦珂”称呼王剑虹，“梦珂”在法语里意即“我的心”，“你的魂儿我的心”。

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是杨之华，也是瞿秋白的学生，与沈剑龙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姻。按说，瞿秋白与沈剑龙是情敌，但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之华家里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秋白家里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 1924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的《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

友的关系。”

三则惊世骇俗的启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瞿、杨、沈之间的恩怨更成了小报记者和无聊文人追逐的新闻“卖点”，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就曾在《晶报》上撰文评论此事，以翟春红、柳是叶、审黑店分别影射瞿、杨、沈，以至于党内某些同志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见了瞿秋白总戏称“春红”。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特别有意思的是，沈剑龙赠送给瞿秋白一幅自己剃光头、穿袈裟、手捧鲜花的照片，上书“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杨之华献给瞿秋白。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展示瞿秋白送给杨之华的“秋之白华”印章（新华社稿）

瞿秋白还擅长刻图章，常常把他俩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精致的小石块上。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杨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杨之华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第三章

工人领袖的地位提升

革命转折中的领导人向忠发和李立三



一、向忠发：一个“没有节操”的总书记

向忠发（1879—1931 年），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 年 8 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 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1923 年 2 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 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 年参加中共四大，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6 年 1 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 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1927 年 5 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 6 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 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 年 2 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 6 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他在 7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28 年底从苏联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了立三路线。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杀。

1. 著名工运领导人：从纠察队长到总书记

向忠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据罗章龙回忆：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汉口石码头装卸驳船上抬煤的装卸工头，同时也是石码头帮会的小头目。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号“奸狡佬”（鄂谚：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佬）。向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面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1924年，向忠发看到工人运动渐渐抬头，他摇身一变，想加入革命队伍。向忠发先加入码头工会，乱斗乱闯，渐露头角。他找许白昊，许白昊认为他品质太坏，不大理他，后来项英认为他有些能力，并且代表一个帮会的力量，力主吸收入党。当提出在支部会议讨论时，码头工会多数党员一致抵制，说：“向是个流氓，怎能让他入党，如果要他入党，我们就全体退出。”向忠发第一次入党未成，他怀恨在心，没有发作，从此以后，他伪装积极，自誓痛改前非，戒烟戒酒，处处表现老实。过了一段时间，他请林育南替他说话，育南不理。他有一个熟人同乡包惠僧，是斗级营一带地区的“报痞”，平日借记者身份，对民众进行敲诈勒索，外号“包老爷”，时已混入党组织。于是，向又请包惠僧替他说话，包惠僧从多方做工作，最后勉强通过，做候补党员。向忠发入党转正后态度突变，原形毕露，自称进了门

槛。以后有了靠山，便自高自大起来，对人说：老子今天已经跳到圈子里来了，今后谁敢惹我，老子跟他拼命。事后陈潭秋到上海中央报告此事，对文虎说向忠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文虎告诉仲甫，仲甫说，不必关门太紧，今后看他的表现吧。此事遂铸成大错，后来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以上罗章龙的这番说辞当然并不完全可信，极尽歪曲之能事；罗本人就是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难免掺杂个人好恶，而作出非理性的评述。正如党史专家杨奎松所言，过分地贬低共产党的总书记，结果只能是使老百姓对共产党本身的水平与能力产生严重的疑问。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好勇斗狠的帮会头目和只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如果说，这纯粹是共产国际的主意的话，那么，第一，难道它就不了解向忠发的能力？难道它就不知道，让一个毫无德行的人来做中共的领袖，即使不会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信任？第二，稍微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绝不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发生在向忠发就任总书记之时的“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绝不可能听任共产国际安排一个蠢材来做自己的领袖。①

而原本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向忠发是靠工人运动起家的，是党内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23 年 1 月，向忠发组织领导了汉冶萍总公司工人罢工斗争，接着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因在工运中表现不凡，他被荐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 年 1 月，向忠发以工人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任为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主管工运。北伐战争开始后，武汉工人运动高涨，向忠发和许白昊一起，全力组织和

①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恢复工会活动，参与建立审判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劳资仲裁委员会，领导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于是，向忠发名声大震，一时成为武汉三镇响当当的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邓培、王荷波、苏兆征、向忠发四人是从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中，王荷波和邓培崛起较早，他们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就成为了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苏兆征领导了 1925 年省港大罢工，亦开始成为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国民政府的北迁，全国革命中心由广州移向武汉，更使他成为工人领袖中一颗耀眼的新星。1927 年，北伐军移师北上。向忠发作为党和工会活动的领导人，在汉口组织工人开展斗争。9 月，北伐军进攻武汉时，他以汉冶萍轮驳工人为基础，组织从集家嘴至易家墩沿汉水一带的木船工人支援北伐战争。10 月，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项英任副委员长。总工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 13 个猛增到 270 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丰富的斗争实践，练就了向忠发生动活泼、贴近群众的语言风格和在工人中一呼百应的威望。1927 年初，武汉各界 40 万群众举行“追悼鄂赣死难工人领袖大会”，工人们更是喊出了“向忠发，好样的，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儿子!”“向忠发，不要怕，为我们工人干事，工人的子孙都会记得你!”的口号。那上下一心、群情激愤的场面，足以说明向忠发在工人中的影响不一般。① 因其如此，1927 年 5 月，向忠发作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发动

---

① 张文雄、胡锦昌、叶健君主编：《聚焦主席台 1921—1935：问鼎天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7 页。

组织者出席了大会，被推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工人领袖”的身份当选为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6 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正是伟大的工人运动造就了一批骨干分子，向忠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尽管他没有参加八七会议，却和苏兆征一样，以全票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得票比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都多。

八七会议后，向忠发被派往上海开展工作。10 月，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此时，由于各地暴动大都失败，党中央一时难以抽调合适的领导人前往，而向忠发正好来上海工作，于是确定这位有着工人领袖声誉和政治局委员身份的向忠发充当工农代表团负责人，并报共产国际得到同意。10 月 15 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两个武汉工人和 5 个上海工人乘苏联的轮船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转乘火车赴莫斯科。11 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向忠发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在莫斯科，向忠发频频亮相，在纪念活动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其能言善辩的口才和处理问题的魄力，均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共产国际正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向忠发这位 47 岁的老工人的出现，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们眼睛一亮。他们很乐意让向忠发参与处理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有意让他能有更多的表现。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是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风潮发生于 1928 年 1 月间，100 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忠发很快使事态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

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思路办的。这件事的妥善处理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让他们看到了他们认为合适的中共新领导人必备的素质：工人出身，有丰富的工人运动经验、较好的口才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培养，使向忠发更快地成为他们认为合格的中共新领导人，十月革命 10 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并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刻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结束欧洲之行后，向忠发和李震瀛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还以中共和联共（布）的名义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获大会通过。这使得向忠发的地位可谓直线上升。因为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于 2 月 21 日听取了向忠发的大会报告。在此之前，由于中国曾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布哈林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极为不满意，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担任革命的领袖。当然，这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2. 组织路线：“领导机关工人化”的产物

向忠发走上总书记职位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共产国际推行的“领导机关工人化”和“提拔工农干部”政策的产物。

1927 年 7 月 14 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共产国际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时，把党内出现错误的原因归结为主要领导均为知识分子。遵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于是，中共党内遵循共产国际的思路来改造党内领导机关。八七会议同时提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负重大责任”，“必须多使工人同志与贫农分子参加并学习党的日常工作的指导”，并且不适当地规定：负责工运的五分之四是工人同志，负责农运的“要尽量是工农分子，各工厂支部，各乡村支部负责的同志要一律是工人与农民同志，各区委县委负责同志工农同志至少须占二分之一以上”。同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教条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判定：“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并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策源地。”“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①] 接着《决议案》指出：“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分，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69—470 页。

分，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分，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民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后来李维汉批评这种举措：“大换班的性质是组织上的盲动主义，是对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既缺乏知识，又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产物。”[①] 于是，全党上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内逐渐形成了“干部工人化”和“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的组织路线。根据中央决定，各省委均重视吸收工农分子参加领导机关，确实培养提拔了一批优秀的工农领导干部。如广东的杨殷、罗登贤、陈郁、黄谦、李源、黄苏等；湖南的杨福涛、林育英、廖保庭、袁德生等；湖北的黄五一、黄赤光、夏文法等；上海的关向应、孙津川、万兴、陈寿昌等；江西的王凤非；满洲的王立功；山东的傅书堂等。[②]

向忠发似乎在有意利用这一政策，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在莫斯科期间，向忠发多次与斯大林见面，并按中共中央 11 月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两次写信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而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把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向忠发断言，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向斯大林报告时，他进一步阐述说，当前中共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争夺权力。解决这种问题的最

---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5 页。

②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5 页。

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他建议：应当“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能大张旗鼓”。向忠发的意见，契合了斯大林、布哈林的心意。一段时间以来，斯大林等对中国共产党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向忠发把这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给了向忠发以极高的赞誉，他批评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布哈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他也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到目前为止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在起作用，应当更多地将工人阶级优秀代表选择到党内来。根据苏联的经验，革命的成功要靠工人阶级。种种活动都表明，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由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来担任中共的领袖。[①]

向忠发上台是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在1928年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向忠发参加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与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向忠发在会上的报告中批评中共中央，认为中央领导人屡犯错误，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向忠发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国际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共产国际于是决定选一个工人出身的人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们的目光很自然地就集中在他们熟悉的向忠发身上。而向忠发很会拿自己的工人身份作金字招牌，一开口就是“我是一名普通工人，我只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再加上他来自基层，确实能联系基层实际情况讲一些意见，因此备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赏识。共产国际第一书记布哈林就赞扬他：“向忠发同志的讲话很有新意，符合中国社会的

---

① 张文雄、胡锦昌、叶健君主编：《聚焦主席台1921—1935：问鼎天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实际情况，这与目前当政的一些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有明显的区别。”

3. 客观机遇：党内宗派矛盾

向忠发最终能够成功登顶，也与当时党内大换班，党内宗派矛盾加剧有关。1928 年 6 月 15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上，各地代表大概可以分成三派互相斗争。第一是瞿秋白派，其实就是斯大林派，因为瞿秋白所执行的路线就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瞿秋白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依靠国际即斯大林的支持。这一派是六大的主流。第二是张国焘派。即“全总派”，以北方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为主。这一派在大会上站在反对派地位，但他们反对的只是瞿秋白个人，他们把盲动主义路线完全归咎于瞿秋白，恰好当时斯大林已经改变盲动主义路线，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取代瞿秋白的地位。他们却不知道斯大林虽然放弃盲动主义，却不反对瞿秋白。第三是以王若飞为代表的陈独秀派。他们是大会上真正的反对派，反对盲动主义，虽然也只攻击瞿秋白，但心里明白瞿秋白执行的是国际的即斯大林的路线。[①] 会议期间，张国焘与瞿秋白多次发生争论，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指责瞿秋白的机会。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两人的争论有时竟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周恩来后来曾这样描述说：“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②] 布哈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得不威胁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

---

①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3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1 页。

拔起来代替你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出面进行调解。他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希望他与瞿秋白能消除成见，互相合作。张国焘则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米夫问：这种合作是否带有勉强的性质？张国焘便指着桌上的一个瓷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说："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张国焘认为米夫的话含有强制的意味，因而他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①] 瞿、张两人在这次大会上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却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不让他们过多参与国内事务。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张国焘和瞿秋白的争论，向忠发两边都不赞成，而是显得比较客观。他采取一石双鸟的手法，攻击两人软肋，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均犯过错误。周恩来后来评价说，向忠发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各派争论、妥协的结果就是毫无政治野心、但是会看风使舵的向忠发上台。

共产国际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六大正式规定了"两化"方针："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的工人化"，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共产国际彻底由此改组了中共中央，安排了一大批非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进了领导集团。两年前，即 1927 年中共五大时，代表 82 人，工农分子仅 11 人，其余 71 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

---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381 页。

代表 84 人，工人代表 44 人，占 52%强，农民代表 6 人，占 7%，知识分子只有 34 人占 41%，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①] 选举结果：当选的中央委员 36 人中，工人 21 人占 58.3%，成为中共历届中央领导成员工人比例最高的一届，充分表明受共产国际、联共（布）领导人过分强调多选工人进领导机关、实行“工人化”的影响；36 人中共有 25 人，出生于贫苦工农劳动家庭，占 69.4%，较已往各届比例均高；36 人中没读过书、只读几年书的小学文化水平者共 19 人，占 52.8%，超过已往各届；高小毕业文化的 2 人，占 0.5%；中学文化水平的 6 人，占 16.7%；大学文化水平的 9 人，占 25%。其中赴法、日、俄学习过的 7 人，仅占 19.4%。表明总体素质水平不够高。36 人中有 13 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 36.1%。本届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共 14 人，其中工人成分 7 人，小学文化水平者 7 人，均占 50%；中央政治局常委 5 人，工人占 3 人，占 60%。[②]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这样片面强调“唯出身论”的做法，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主观地从出身片面强调党员工农成分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农化，非但没有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化建设，反而使党的政治影响力、组织内聚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六大期间，一大批经过大革命锻炼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未能发挥他们的领导优势。由于搞出身崇拜，把工人当作偶像。以致六大期间选上来的工人政治理论水平不高，不少人政治立场不坚定，领导能力低下，还有的个人品质不好，而当时又没有条件对他们认

---

① 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0 期。

② 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8 页。

真地加以培养和教育。比如，参加六大的代表中后来出了16名叛徒，其中14名是工人；这届中央委员中，李涤生、王藻文、顾顺章、向忠发、徐锡根、余茂怀、卢福坦、徐兰芝、张国焘等9人后来叛变，占25%。这说明，“唯出身论”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4. 去职：叛变革命

向忠发的去职是因为他的被捕叛变。

向忠发的被捕始于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曾参加青帮并成为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借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顾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

中央特科是当时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的特别机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及其追随他们的帮派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对付革命力量，暗探、工贼、叛徒四处钻营，撒开一张有形无形的网。为保卫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周恩来组建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设有四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查、反间谍；三科为行动科，负责镇压罪大恶极的叛徒，下设“红队”；

四科为无线电联络科，负责通信联系，培训保卫人员。

“红队”是由顾顺章领导指挥的。“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令国民党军特警宪胆战心寒。“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顺章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他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经济开销。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几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熟悉，据她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陈赓也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果不其然，这句预言最终得到了应验。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叛变的。1931年4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返沪途中，在武汉勾搭上一名妙龄舞女，沉浸在温柔梦乡乐不思蜀。盘缠挥霍一空后，居然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民众乐园登台表演魔术，被街头四处搜寻的叛徒尤崇新撞见，遭国民党中统当地情报负责人蔡孟坚逮捕。顾顺章逮捕后，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迅即变节，供出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机关遭破坏，被捕牺牲十余人。顾顺章还以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

导人的地址为由，要求将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因为他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担心走漏消息。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一天 6 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向中统头子徐恩曾报告，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字样。但徐恩曾并不在，而是在上海的“小三”那里逍遥快活。电报由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收到。他见这么紧急的电报，猜测一定是有重大事情发生。于是他将电报偷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4 月 26 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逃往上海。后来钱壮飞安全撤往江西苏区，1935 年牺牲于长征路上的金沙县。

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让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派驻机关全部搬家隐蔽，致使顾顺章消灭中央机关的计划却全部落空。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使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站），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和培养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党组织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供出，恽代英旋即被处决。1931 年 6 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和森惨遭杀害，年仅 36 岁。1933 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

逃过一劫。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 年 12 月 1 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同时，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得再多，也是有限的。从 1933 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顾顺章后，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这件事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知晓了，报告给了徐恩曾，徐恩曾就萌生了除掉顾顺章的心意。蒋介石也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1935 年 6 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向忠发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顾顺章叛变后，他们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住在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住在二楼，担任联络员的工作。顾顺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首先找到曾经给杨秀贞当过娘姨的女佣，通过这个女佣追查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

则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本来中央已决定同意向忠发在离沪前与杨秀贞见上一面的要求，见面时间定在 6 月 21 日上午，6 月 21 日下午一定要离开。向忠发却违背组织的规定，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地溜出来，私自到旅馆内去会见杨秀贞，并不顾陈琮英的提醒，在旅馆内住了一夜。6 月 22 日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租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出卖他的就是该车行的会计叶荣生。叶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向忠发。敌人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向忠发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向忠发逮捕。

周恩来知道向忠发被捕后，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向忠发被捕后，即向敌人求饶。他首先提供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陈琮英与杨秀贞被捕。在巡捕房里，向忠发一看见陈琮英，就指着陈用湖北话告诉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敌人并没有听懂他的湖北话，也就没有在意，向忠发又转过头对陈琮英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敌人接着问了陈琮英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发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去了。向忠发还向敌人提供了中央机要处的地址，这个地方是中央负责人看文件的机关，造成机要处人员张越霞、张纪恩被捕。敌人来搜查时，刚巧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及时知道消息后，又外出通知有关同志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对于向忠发的叛变，1967 年 5 月 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 年 6 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 年 6 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

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上午被捕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急于邀功请赏，立即给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蒋当时不在南京，电报又转至庐山，蒋介石接到电报批复就地处决。向忠发叛变后，熊式辉又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已招供”。蒋收到熊发来的电报，便批复“暂缓处决。”但这时由于向忠发提供的情报处处让敌人扑空，这让熊式辉十分失望，熊式辉已经按照蒋介石批复的第一封电报，于 6 月 24 日将向忠发枪决了。行刑时，向忠发竟作揖下跪求饶。但是敌人并没有饶了他。此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

谁最先发现了向忠发叛变？是黄淑仪。黄淑仪，原名黄彰定，又改名黄慕兰，后名黄定慧。1926 年她年仅 19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当时由周恩来安排在互济会特别营救部担任部长，负责情报搜集工作。黄淑仪在上海结识了大律师陈志皋，在一次偶然的闲暇中见到了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曹无意中说起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 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 4 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黄淑仪匆匆赶回家，打电话通知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经过分析，断定叛变者即是向忠发。潘汉年将此事立刻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二、李立三："秘书长越权"与"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1899—1967年），湖南省醴陵县人，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醴陵县阳三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先后就读醴陵渌江中学、长沙长郡中学和广益中学。1919年9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同年10月，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2月中旬，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被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9月，与刘少奇等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创建汉冶萍公司总工会。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同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代理全国总工会领导武汉政府时期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是5名常委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恢复党的工作，曾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广州的战略思想。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

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同志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发言，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总清算”，诚恳坦率地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受到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蒙冤逝世，终年68岁。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1. 长于工运：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总指挥

李立三是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杰出领导人。李立三从事工人运动，最早是从安源开始的。安源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领导并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都是这里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在这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组织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这次大罢工之所以被称之为“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主要是因为“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了完全胜利”。在当地工人群众中流传了几十年的一首民歌中，有句歌词是

"有个能人李能至"(李立三的别名),即颂扬李立三。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李立三在这次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安源是位于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六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煤矿。这里蕴藏丰富的优质煤炭。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局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20 世纪 20 年代初,路矿两局共有工人 1.3 万多人。因深受压迫,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安源离李立三的家乡醴陵只有几十里路。当时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立三,被陈独秀派遣到湖南,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国参加革命,并特别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希望他能到安源去领导工人运动。1921 年底,毛泽东带着李立三等人来到安源,离开时,决定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工作。

留在安源的李立三,用三种方法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首先,办平民小学,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拜访工人家长。他给工人上课,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既讲文化知识又讲马列主义。他教"工人"二字时,把"工"、"人"两字上下连起来写成一个"天"字,寓意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在这里,他成立青年团安源支部,创建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几个月后,吸收团员 8 名,党员 6 名。其次,办工人俱乐部,用游艺的方式吸引工人。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李立三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货物新鲜、丰富,价格低廉,很受工人欢迎。凡是加入了俱乐部的,可入股发放购货证,用证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油、盐、米、布、鞋、袜等生活必需用品,比市场便宜很多,一般的货价是市场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这样一来,俱乐部的工人大大增加,几个月之内在册队员增加到 1000 多人。这些方法为后来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成功经验。

1922 年 9 月 14 日零时,作为新成立的罢工委员会总指挥,李立三发出罢工开始的总号令。按照周密的计划和部署,汽笛声声怒吼,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1.3 万多工人齐声高呼"罢工!"罢工工人

组成了监察队，佩戴红袖章，手举小红旗，肩扛铁棒、岩尖等武器，雄赳赳地在街市和工厂附近站岗、巡查，维持秩序，防止敌人破坏。在工人的强大威力之下，江西督军和路矿首领，深恐局势不可收拾，迫不得已与李立三磋商复工条件。在李立三的坚持下，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出代表签订正式条约，答应罢工工人的要求，大罢工取得胜利。条约涉及十三条，主要是为工人争取权益，如“每年十二个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工头不得殴打工人”等。安源大罢工的胜利，不仅使党团组织得到了锻炼与发展，大大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而且在诸多方面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典范。李立三成为赫赫有名的工运领袖，很快从安源走向全国。

五卅运动是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又一个高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成功范例。它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可是，时过不久，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却遭受到严重挫折，白色恐怖卷土重来。1923年4月初，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的保护下秘密离开安源，经长沙抵达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在武汉，李立三运用在安源的经验，以香山会馆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团结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举办起平民学校并使之在全市开花，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和加强了党组织，并在重点工人区，包括汉阳钢铁厂、京汉铁路车辆段所在的江岸区、武昌长沙铁路车辆段所在的徐家棚区、汉阳纱厂所在区，以及在人力车夫、店员中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秘密恢复了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并在各家工厂发动抗议和罢工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国共合作开始后，李立三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1月，李立三赴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中共中央根据上海中共党组织的请求，立即调李立三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李立三到达上海后，改名为李成，即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下设的

工人农民部的工作。

李立三在上海运用安源的经验，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在工人中成立俱乐部，创办《上海工人》周报，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1925 年 1 月，李立三在上海出席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四大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决定“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人运动。会后，中央工农部将所属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命张国焘为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1925 年 2 月，李立三与邓中夏等人领导与指挥了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22 家日商纱厂近 4 万名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斗争坚持了十余天，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了罢工工人的要求。这次大罢工成为了五卅运动的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运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紧接着，李立三领导了五卅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5 月 15 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并开枪打死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 10 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第 32 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 33 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 日，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关于罢工的形势。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统一指挥 30 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5 月 30 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 2000 多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英国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 13 人，重伤数 10 人，逮捕 150 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当晚，李立三作为工会代表与上海总商会进行谈判，迫使其签了罢市令。

6 月 1 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公推李立三为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发展为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 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指挥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是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的又一次高峰。1926 年 9 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在这里，他导演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汉口英租界是近代中国 7 个英租界之一（另外 6 个是上海英租界、天津英租界、镇江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广州英租界和厦门英租界），也是汉口的 5 个租界之一，是汉口的金融贸易区。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后，英国调遣军舰和水兵到长沙、岳州帮助吴佩孚抵抗北伐军；9 月 5 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县城，制造了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千人的万县惨案等。英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2 月 26 日，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福光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江面撞沉华商既济公司神电号客轮，400 余中国乘客惨遭不幸。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当日，总工会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 20 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他在发表的演讲中，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宣布："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1927

年 1 月 3 日，一帮英国水兵上岸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干涉群众集会，从而引发冲突，英水兵杀死和杀伤群众几十人，造成了“一·三”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以湖北省总工会为首的各社会团体代表，联名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道歉、撤军和收回英租界等 8 项要求，要求政府执行。5 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了有 30 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武汉三镇各界同胞广泛开展反英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声势浩大，指挥工人纠察队占领了英租界内的行政大楼、邮政局、电报局等，实际控制整个英租界。最后迫使英国当局在 1927 年 2 月 19 日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协定规定，前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 3 月 15 日解散，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历时 66 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耻辱史得以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

这里还要提到李立三的名字也与工人运动有关。早年，李立三一直用着原名李隆郅。1924 年 11 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做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邓中夏与李隆郅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接受他的建议，就问：“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遥见远处路边站着三个人，便突口说道：“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从此，李立三这一名字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连在一起，一直沿用到终生。

2. 武装斗争：南昌起义首倡者和领导人

我们都知道，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8 月 1 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是：谁最早提出了这次起义？周恩来，叶挺，贺龙，还是朱德？其实，这次起义的倡导者是李立三。



李立三等人倡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新华社稿）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组建临时中央政治局，李立三进人常委。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十一军（叶是十一军下属、二十四师师长）和贺龙的第二十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两人赶往九江，准备找叶挺等人研究随张发奎南下问题，打算“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7月19日，李立三、邓中夏两人到达九江，谭平山亦到。

翌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和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在军事上，南昌、九江间的叶挺、贺龙的军队已处于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和第九军的包围监视之下，军事态势极其严峻，“已到极严重之时期”，因而决定，我军“赶快集中南昌”，并“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均在南昌之武装”。

这次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并就会议形成的共识写信报告给党中央。会议后，李立三、邓中夏两人立即赴庐山向瞿秋白汇报，建议发动南昌起义，请瞿秋白同志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并请中央即速可决”。

李立三之所以能够提出南昌暴动，是基于对当时政治与军事形势的正确判断与革命发展方向与道路的深刻思考。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发展军队，却没能掌握自己的武装。而蒋介石、汪精卫反动以后，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党内已经意识到了过去的问题，抛弃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致力于军事斗争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中国革命必然要走的道路，不二法门。李立三于是就萌发了武装起义的想

法。“马日事变”后，他曾与蔡和森一起向党中央提出“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可惜未被中央采纳。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以后，虽然中共力量在全国处于弱势，但在南昌这一局部地区则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举行起义有可能会取得胜利。时势造英雄，当时的形势已经决定了南昌起义的必然性，而李立三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向党中央提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因此成为了南昌起义的首倡者。

随着形势更加危急，7 月 24 日，李立三从庐山赶回九江，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一起召开了第二次九江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形势和南昌暴动问题。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 28 日前集中南昌，28 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这次会议具体研究了暴动的政治纲领，加快了南昌暴动的准备工作。

李立三的提议得到党中央的认可，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在南昌举行起义。党中央任命中央常委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去前方主持起义。周恩来 7 月 25 日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即南昌、九江，九江旧称浔阳）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李立三坚决主张把暴动区域选在南昌，因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周恩来同意李立三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 7 月 30 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起义的酝酿关键时刻，中央代表张国焘提出暴动应慎重。7 月 30 日又“假传圣旨”，反对举行南昌暴动。李立三挺身而出，站在周恩来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据理力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

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①] 在 30 日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李立三明确反对张国焘；31 日继续召开前委会议，李立三同其他前委成员一起，与张国焘激烈辩论，迫使张改变主意，从而确保南昌起义的顺利进行。进入南昌起义组织实施阶段，李立三作为重要领导者之一，又为南昌起义作出了特殊贡献。

李立三参加了南昌起义，是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成员之一。南昌起义开始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立三任委员。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革命委员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农工委员会委员、政治保卫处处长，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总指挥的安全保卫、搜集情报、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有时还负责筹款和运输等，在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极其重要。起义军在 8 月 5 日开始南撤，李立三率领政治保卫处的干部（陈赓等）和战士随军南征。他亲自主持和指挥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克服重重困难，认真做好安全保卫、伤员撤退、发动群众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南昌起义部队在转战潮、汕受挫后，李立三离开部队，到达香港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李立三对南昌起义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写成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后发表在 10 月 30 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 7 期上，就南昌起义过程中政治、军事、土地革命的政纲、劳动保护政策、财政政策、镇压反动派、宣传工作、赣粤工农运动和暴动、党组织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阐述，为后来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土地法的形成，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完善提供了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3. 错误路线："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领导

---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296 页。

的分工中，他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由于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刚刚回国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错误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职务，李立三就递补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替了原来由蔡和森担任宣传部长、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又因为周恩来去顺直省（河北和天津、北京两省一市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此后人们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带地区，上世纪 20 年代，中共曾于此建立“顺直省委”）巡视，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来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与向忠发、周恩来并称中央领导集团“三驾马车”。周恩来 3 月份去苏联汇报工作，总书记向忠发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李立三的意见代表着当时中央的意见。

1927 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中国革命形势从 1929 年下半年到 1930 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1930 年 2 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中原战争。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比如，2 月 17 日，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一致决定，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目前的中心策略；组织长江局，首先在湖北发动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由此，李立三兴奋起来，确定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为目标。

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四处讲话，发表文章，鼓动政治示威，武装暴动，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李立三准备把他的“左”倾思想推向全党。6 月 11 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整套冒险主张。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李立三制订出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发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暴动，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出兵武汉，红七军挺进柳州，红十军进攻九江，最后准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个计划，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当它传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气愤地说：李立三简直发疯了！李立三确实有点疯狂了。他甚至异想天开，要求把侨居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要求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出兵进攻北方。

这个决议，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代表罗伯特看到这个决议后，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求中共中央停发。李立三很不高兴，说罗伯特右倾。6 月 21 日，他甚至向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停止罗伯特在中国的工作。持续发高烧的李立三，一边与罗伯特在共产国际打官司，一边强力推行他的路线方针。6 月 25 日，他与向忠发共同致信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说国内正面临“革命巨潮”，要求周恩来即刻动身，万勿迟延。李立三控制的中央沉浸在预想的胜利狂热之中，接连召开会议，举行武汉、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将党、团、工会合并成中央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还决定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和江苏省委也建立总行动委员会。其结果，苏区和红军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白区举行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江

苏省委、南京市委遵照李立三的指令在南京暴动，100 多名党员牺牲，发动兵变的党团员因身份暴露，40 多人惨遭杀害。上海地区的党员数由 2000 锐减到 600，天津地区的 500 多党员只剩下了几十人。湖北、福建、浙江等地省委因被破坏得太严重而无法恢复。

李立三狂热自大，超过了共产国际的容忍程度。莫斯科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在纠正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 8 月初各次会议的记录，发现李立三竟然没有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公然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甚至提出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主张把苏联拖向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境地，这不能不使斯大林“龙颜”大怒。所以，当斯大林看了中共的会议纪录和远东局的报告后，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要李立三速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李立三于 1930 年 10 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随即召开了一系列针对李立三的批判会。在这些批判会上，李立三态度诚恳，反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1938 年 2 月 23 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1939 年 10 月出狱。1946 年 1 月 6 日，在苏联整整待了 15 年的李立三回到国内。

李立三没有做过委员长或总书记之类的职务。但他在党内负过总责。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干部工人化政策。因为工人干部大多文化不

深，理论欠缺，既不会写，也不会提出什么大的决策，因而容易出现“大权旁落”。李立三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事实上形成了起主导作用、一个人说了算、大权独揽的局面。这样就造成“秘书长越权”现象。当然，这在党内也是少有的现象。

4. 个性：大胆、急躁，敢说敢干

向忠发不可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他没有政治领袖的才干；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三是缺乏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远大的革命战略眼光。李立三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领袖人物。但是他也不可能探索出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个人性格与革命形势需要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一说。

第一，从个人性情方面来看，李立三是一个急躁、简单的热血青年。他有两个绰号“小大虫”和“坦克车”，均表示其性子急躁、杀伐心重；他领导的安源罢工和五卅运动，为其带来美誉且赢得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他冒进发动城市兵暴，又为其后半生背上了“立三路线”的不好名声。

青年时代的李立三是个性格十分外露的人。他天性好动，因此每有体育活动总是少不了他。他性格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他思想活跃，善于讲话，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李立三的疾恶如仇让同学印象深刻。每当同学们在房子里谈起灾难深重的祖国时，谁一提到反动军阀，他会立即挥动拳头：“推翻!”谁一谈起无耻政客，他会摆动胳膊：“打倒!”谁一讲到卖国贼和反动派，他会高声喊道：“杀掉!”“推翻”、“打倒”、“杀掉”这六个字就成为了李立三的口头禅，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旧世界强烈的憎恨，与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立三为人坦率直爽、胸怀开阔、急躁的性格特征和粗暴夸大的性情。正因为李立三

杀伐心重，赵世炎给他起个绰号“小大虫”（即小老虎）。

第二，从他的阅历看，李立三显示出重实践、轻理论的特征。李立三搞工人运动非常有经验，但理论上比较薄弱。我们可以将这一点与蔡和森比较一下。蔡和森是党内的理论家，长于理论宣传。他到法国勤学，拒绝俭工，并随身携带字典致力于翻译外文著作。凭着一本法华字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各国革命运动、各种思潮的小册子上百种。据郑超麟回忆说，蔡和森读法文马克思主义的书，蛮读，蛮译，吸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他不洗脸，不理发，整天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囚徒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当蔡和森躲在宿舍阅读大量马列书籍时，李立三则在工厂，卖力翻砂。在法国两年，李立三只有一身“装扮”，一条灯芯绒长裤，一双开口的皮鞋。但他找到劳动的意义。他在回忆中说，这样可以促使知识阶级猛醒，并能同劳动阶级联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杀个七进七出，然后才有光明。

1921 年年底，蔡和森回国，被陈独秀留在中央工作，看中的就是他的理论长处。他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成为党内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2 年 6 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起草二大宣言，为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贡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 年 9 月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大量文章。1927 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六大后，蔡和森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因为犯错而被李立三接任。而李立三回国后，被陈独秀派回湖南，从事工运。回湖南后，被毛泽东派去安源领导矿工罢工斗争。可以看出，他始终战斗在工人运动的第一线。李立三感兴趣的不是如何把理论宣传工作做好，而是去制定中国革命如何快速省力的路线。正因为他理论准备不足，思考不深，难以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致使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李立三和蔡和森，一个长于实践，一个长于理论，都不能做到党的最

高领袖的位置，而综合了两个人长处的毛泽东就可以。1943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话："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1] 讲的就是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理论是不行的，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则是盲目的实践；但仅在理论的书斋里打转转也不行，理论的生命在于与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做到了，所以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

① 转引自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舶来品”

“左”倾盛行时期的领导人王明和博古



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集大成者

王明（1904－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县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治纲领。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被捕，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1. 留学苏联：攀上米夫

继向忠发之后成为中共总书记的王明，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人物。和向忠发不同，向忠发的情况鲜为人知，王明则是家喻户晓的“反面教材”。王明之所以成为中共早期领袖，完全是共产国际“选种、育苗、移栽”的结果。这是王明上台的基本前提和大背景。

从王明上台的过程来看，主要依靠两件杀手锏。哪两件呢？一是靠，

二是斗。王明的“靠”和“斗”紧密配合，运用娴熟，“靠”是“斗”的资本，“斗”是“靠”的表征，“靠”中有“斗”，“斗”中有“靠”，两者相辅相成，最终使他成功登顶。

我们先说他的“靠”。王明的“靠”，即是他一心一意依靠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更明确地说，就是靠米夫。王明与米夫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 年 5 月 23 日出生于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一个贫困家庭。幼年在家乡读过七八年私塾，1920 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 年夏升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学习，1925 年 10 月入党，11 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中山大学原名“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习惯上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山大学”，也有人称其为“劳动大学”。它是苏共为了纪念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于 1925 年 10 月在莫斯科开办的一所大学，以孙中山名字命名，帮助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政治理论骨干。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1927 年 7 月 2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但中山大学并没有立即更改校名。直到 1928 年，“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才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习惯上仍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直使用到 1930 年秋学校停办。中山大学自 1925 年 9 月成立到 1930 年秋停办，五年时间里共招收了四期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工和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生名义上由国民党选派，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像蒋经国、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以及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全都毕业于中山大

学，且为第一届毕业生。

王明到了中山大学后，由于有一定的英文底子，加之肯于钻研，对俄语狠下工夫，学习成绩进步很快，半年内俄语水平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因而给人留下了“面目俊秀，聪颖年少，俄语流畅，对列宁、斯大林教导谙熟程度令人钦佩”的印象。除了俄语，王明还对列宁主义这门课倾注了许多精力和下了很大工夫。为什么？因为该课的任教老师是学校的副校长——年仅 24 岁的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上这门课时，王明总是抢着发言，以博取米夫的好感。果然不错，米夫注意并非常欣赏这个身高 1 米 50 多高的小个子中国人。从此，王明积极追随米夫，大搞宗派活动，深得米夫赏识。

米夫何许人也？米夫全名巴维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米夫，生于 1901 年，小瞿秋白两岁，大王明 3 岁。1901 年 8 月 3 日出生于俄国一个小官吏家庭。1917 年 5 月投身革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20 年年末，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 年毕业后，留在该校搞科研工作。与此同时，还兼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1925 年，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米夫被任命为副校长，同时还为学生讲授列宁主义课程。

米夫号称中国问题专家，写过关于“五卅运动”的《上海事件的教训》和《中国的农民问题》。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茨基，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 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

虽然王明刚到苏联时米夫的地位还没有如此显赫，但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和雄辩的理论才华对王明还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米夫讲授的列宁主义课程也成了王明最感兴趣的课程。王明俄文班同桌庄东晓，叙述了当

时的情形："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校长——米夫。"

米夫一心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米夫一直想在中共党内寻找一个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人，以达到他操纵中共的目的。王明的出现，正中下怀，与他一拍即合。王明熟记名词术语，讲起来头头是道，自然得到米夫的青睐。每当讨论出现分歧时，米夫总是指定王明发表意见，王明也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地大讲一番。王明俄语好，可直接与米夫对话。接触多了，思想交流深了，感情自然也就更密切了。王明也就成为了米夫重点关注的对象。

与米夫一样，王明也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据 1927 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底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在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

为了达此目的，王明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绝不是妄想。王明的第

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1927 年 1 月，联共（布）中央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家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米夫就选王明做自己的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但陈独秀不愿接受，又不便推辞，答应先让王明在宣传部当干事。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王明自知前途渺茫，于是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回到莫斯科后，米夫在王明的帮助下击败了教务派，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他对王明信任有余，欣赏有加，他认为王明理论上有造诣，政治上懂策略，并且在家里挂起了王明的大幅照片。这年 9 月，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王明留校做翻译，实质上成了米夫的专职秘书，拿着公文包，整天跟在米夫身后。随着米夫职位的巩固和升迁，王明相应的“水涨船高”。

2.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合法的上台

六大是米夫把王明推向前台的一次重要步骤。中共六大是受共产国际之命在莫斯科召开的。米夫受命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与组织工作。米夫便推荐了王明为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文件、大会发言及对外交涉等工作，与中共领导人频繁接触，使他成为了“名人”。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时，就是王明任第一翻译。这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主张中国党要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游击战争。王明据此写了《武装暴动》的小册子，鼓吹城市暴动，轻视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并塞进供代表团阅读的材料中。

在六大会议上，米夫与王明一唱一和。但由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未能实现通过六大爬上领导岗位的美梦。

1929 年 3 月，王明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厚望回国。王明动身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指示要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中共中央在当时曾经有过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先安排他们到基层，锻炼一个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表现的能力，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这样，王明被派到上海沪西区委、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任《红旗》报通讯员。1929 年 10 月，王明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

王明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从 1929 年 3 月回国到 1931 年 10 月离开上海，是王明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期。王明在《红旗》报工作期间，除了采访、编辑和写作之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有时还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和做工人工作。1930 年 1 月 12 日，王明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被突然闯入的一群巡捕逮捕，关在提篮桥监狱。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巡捕房和监狱都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王明就买通了一个看守帮他送信，并告诉了这个看守详细地址。而这个地址就是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了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幸亏这位巡捕只顾索钱，没有发现这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米夫的。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在这封信里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了脑后。米夫大发雷霆。另一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在信中，他汇报了一些情况，也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总的说，他这封信对自己的错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中央审查了他被捕的经过和他写给中央的信，并给他回了信，严肃地指出他犯了几种重大错

误，并通知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

1930 年 12 月 10 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上海。米夫到中国的使命是：把瞿秋白赶下台，将王明拉上台。他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经过一番了解情况以后，米夫对政治局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产生怀疑，认为通过紧急会议，并没有充分把握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所以，米夫向中央提出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建议。米夫与政治局委员分别谈话，把王明说成是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英雄。米夫对瞿秋白严厉批评，对向忠发采取拉拢政策，为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王明也拼命活动，大造舆论，要把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头功抢在手里。米夫不仅迫使中共中央将原定要召集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还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书记。米夫要王明担任这一职务，是给王明进入中央设置一个台阶。

王明是通过米夫直接插手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

米夫、王明经过一番策划后，1931 年 1 月 7 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宣布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限定会期一天。有的人在会前 20 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会后还不知开什么会。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22 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 37 人。代表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章龙等，康生等二人作记录。为使王明入选，米夫事先找了中委、候补中委们，一个个谈话，要他们选王明。虽然如此，米夫还不放心，因为王明既不是中委，又不是代表，是没资格参加四中全会的，所以广受质疑。米夫遂用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决定增加五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而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米夫此举，在中共党内开创了非常恶劣的先例。尽管遭到反对，米夫还是以共产国际批准做挡箭牌，强使会议开下去。会前，米夫替中共

中央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强行让大家接受他起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强调这份名单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同拟定的，是国际名单，会议只有执行权，没有修改权。米夫终于借共产国际之威，使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王明先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不久即又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就这样，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长达 4 年之久。米夫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结果非常满意。他在后来撰写的《英雄的中国》一书中，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的最有才华的领导人”，“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3. 组织习性：宗派主义

我们再来看看王明的“斗”。在革命时期的权力场上，没有人不是经过斗争而上台的，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也是夺取和执掌权力的不二法门。权力场上的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也。王明深谙其中真谛，所以，他的上台也是“斗”来的。

苏联支持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诞生，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特殊一页；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培养了一大批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王明就是其中特殊的一员。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了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主义从这里孕育。如果说决定每个人一生的成长发展都有一个“关键期”的话，那么，王明一生的“关键期”，就是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

王明在列宁主义课的积极表现搏得了米夫的好感，但在当时也仅此而已。王明真正引起米夫的重视，是从王明参加关于旅莫支部的大辩论以后开始的。中山大学开办以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负责领导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叶青），他认为同学们到中山大学来的主要任务不是读书，不是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来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旅欧支部不仅不督促在校学生党员学习马列理论，而且把用功学习的党员叫作学院派。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了广大党团员的反对，终于引发了 1926 年春天的一次大辩论。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的王明，在讨论会上，一马当先，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旅莫支部”的做法失去了大多数党团员的支持，存在了半年左右就被解散了。王明却在这场辩论中初露锋芒，再次引起了米夫的重视。在 9 月初举行的“学生公社”改选大会上，王明一跃成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学生公社”的主席。

王明喜欢搞斗争，只有自己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在背后支持自己的集团式的力量。这就是小集团宗派。所谓团结一批人打倒另一些人，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是争权夺利的有效手段。王明喜欢搞宗派活动。当时中山大学教务长阿古尔与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由于在学校工作等问题上各执己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又各有一批支持者，从而形成了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党务派”，两派经常发生争论。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学生中素有声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曾经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而第一期学生中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也较有影响，他们曾经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所以，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了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

“党务派”和“教务派”在1927年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就教务和党务工作等问题相互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双方也互不妥协。9月，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了解到“党务派”和“教务派”难解难分的争论，王明认识到这是控制中山大学权力的天赐良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应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打垮“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搞垮了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米夫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王明协助米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使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927年下半年起，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说到王明的宗派活动，就不能不说到历史上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山大学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比较一致，但没有固定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只是人们对他们的一种笼统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不能列出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根据普遍的说法，它指的是1929年放暑假前，中山大学党支部进行了十天的工作总结，对于党支部的工作报告（即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正确与否）争论得很激烈，最后以表决的方式来做决定。结果，王明派的人占优势（表决时王明不在，他已于1929年4月被米夫送回国内）。于是，反对王明派的人便把其中最坚决、最积极的29个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各种资料略有出入。事实上，人们常用这一专用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这些所谓的“布尔什维

克”，或追随王明教条宗派的人，政治表现后来发生了深刻变化。诸如，正是王稼祥、张闻天的觉醒，才有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博古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其他一些同志也为党做了很好的工作，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只有李竹声、王云程、盛岳等少数几个人，后来脱离了革命队伍。

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力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大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影响，扫除搞宗派活动的障碍，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罗织罪名，制造了“江浙同乡会”等一系列事件，并在中共六大以后，逐渐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实际上进行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中山大学有几位学生，要孙冶方请客做中国饭菜，因为他当翻译，每月有近百卢布的收入。这天凑巧来了不少人，挤了满满一屋。正当大家热热闹闹时，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屋里说话声都是江浙口音。回校后，他将此事向支部局报告：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在孙冶方处叽哩呱啦，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也是浙江人。他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享受红军待遇，每月领取八九十元卢布的津贴。一次，中山大学的江浙籍留学生向蒋经国要钱会餐，蒋经国回信说：我现在的会费并没有着落，等有了再寄来。这封信落在支部局的手上，大家议论来、分析去，又是会费，又都是江浙人，因而判断在中山大学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中山大学创办之初，有一批来自上海大学的学生和教员，后来又从上海、无锡等地来了一批产业工人，江浙人在中山大学所占比例相对高一些。共产党人不讲乡谊，但同一地区出生，尤其在同一地区工作过的人，生活上较为接近，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真有“江浙同乡会”这种组织存在，也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于是，王明向米夫建议，对“江浙同乡会”彻底调查。王明制造出一

个“江浙同乡会”事件，其目的是要整倒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老党员，在党务派与教务派的斗争中是王明的对头。后来，他们离开了中山大学去了列宁国际学院，但在中山大学中仍有一定的影响。王明在中山大学名气虽大，许多人并不服气，甚至有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小鬼”。王明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想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应王明等人的要求，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而且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工作。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并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然后，王明和米夫又找到在莫斯科访问的向忠发说，有人在中山大学组织反革命的“江浙同乡会”，应当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注意。向忠发偏听偏信，到中山大学大发宏论：“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党内是秘密的。”向忠发断言，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的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他甚至还说要枪毙其中的一些人。向忠发来中山大学讲话后，不但引起了学生中的极大混乱，人人自危，也使学校的处理手段更加严厉。在有格伯乌参加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开除 12 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当然，假的就是假的，后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中央监委和有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参加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而予以否定。

在捏造出了“江浙同乡会”之后，王明一伙还搞出像“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别”，并说这些“反动派别”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起来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形成了反动的“第二条路线联盟”，必

须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王明的这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使中山大学里的一批党团员遭受打击迫害，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也横遭诬陷。

王明凭空捏造出“第二条路线联盟”，矛头直指当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而且，瞿秋白在调查和处理江浙同乡会事件时秉公办理，澄清了这个组织并不存在，为受冤屈的同志平反。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入骨。大约在 1929 年，苏共开展清党运动，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此机会，对瞿秋白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他们诬蔑瞿秋白是什么“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并造谣说瞿秋白参加了劳动大学里的党内小组织派别，如此等等。瞿秋白也因此被解除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职务。

王明彻底整倒瞿秋白是在反“立三路线”的过程中。李立三盲动路线酝酿之际，王明推波助澜，比李立三更“左”。不过，虽然王明和李立三实质上都在坚持“左”倾冒险主义，都在宣扬“左”的错误主张，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对马列著作引经据典，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共产国际决议照抄照搬，不准变动一字一句。所以，王明认为李立三的某些理论观点违背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决心与他争辩一番。恰好这时博古、王稼祥等人回国，为王明撑足了底气，几人一起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与李立三展开论战。王明等人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滔滔不绝。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的行为十分意外和恼火。理论上争辩不过，就摆出家长作风，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撤销了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并给予纪律处分。会后，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

自信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并没有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

“立三路线”后来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派瞿秋白、周恩来迅速回国，于1930年10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瞿、周等人认为“立三路线”不是路线上的错误，只是在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但是，当中共中央把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发现原来李立三提出了“一个好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准备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并且还要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吸引到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来。具体计划是：先在广州、香港组织起义，把英国卷入斗争中来；再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动起义，引发日本和苏联发生冲突，最后让它爆发为全世界帝国主义和苏联之战。根据这个设想，李立三建议共产国际“立即采取进攻路线”，命令苏联红军向东北地区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李立三这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明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这封信的精神由沈泽民等人带回国，但他没有按组织程序先向党中央汇报，反而首先透露给了王明。王明得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立刻在一帮人中相互转告，四处串通。他们清楚地知道党中央对此事毫无思想准备，竟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党的会议上抢先把国际十月来信中关于立三问题是路线错误的观点捅了出来，和中央唱对台戏。

王明原来曾表示拥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且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自得知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他突然改变态度，马上起来批评三中全会的错误，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后经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

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政治上要反右倾，组织上要“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王明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指瞿秋白）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1931 年 1 月 7 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钻进了中央领导岗位。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王明手里。6 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 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王明为代表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实行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残酷打击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的“钦差大臣”满天飞，落到哪里，哪里的干部就挨整。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对他们要排斥的干部，一律给戴上“右倾分子”、“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他们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并没有因为四中全会撤销了瞿秋白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停止。本来瞿秋白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和国际执委，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还嫌不够，在 1 月 27 日作出的决议中，特别点名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正在重病中的瞿秋白被迫于 1 月 28 日写了第二次声明书。王明在对瞿秋白实行政治打击、组织处理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减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

性地发给他十六七元钱。1930 年到 1932 年间，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 50 至 90 元，中等工资 20 至 30 元，最低工资 8 元到 15 元。给瞿秋白的这点生活费，仅能维持他们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能求医治病了。

王明的“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不仅实施于党的高级干部，而且也实施于一般干部，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除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还在生活上进行刁难，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点稀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

在实行错误的干部政策的同时，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推行“左”的肃反政策，使各根据地的肃反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 30 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赣西南苏区肃清 AB 团时，屠杀 7 万多红军官兵。红 20 军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的 700 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 30 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使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红 25 军原有 12000 人，43 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 6000 人，而红 4 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

比如说，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 1932—1934 年的两年多时间内，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 4 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 3 个！四次大肃反之后根据地由原来的 5 万多人减员为 4000 人，杀得只剩下 4 个党员，即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本人。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 3 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

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①]

1931 年 6 月，向忠发叛变后，王明成天惊魂不定。由于当时国民党悬赏捉拿周恩来和王明，因而他们二人已无法在上海活动。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便决定调周、陈（绍禹）二人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王明就于 1931 年 10 月 18 日，与孟庆树等人一起，秘密乘日本船离沪赴苏。直到 1937 年 11 月才再次回国。

4. 延安争权：最终失势

1937 年 11 月 29 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毛泽东冒着纷飞的大雪，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并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饮水思源》：“中央三位领导同志驾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这不是喜从天降吗！……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作‘喜从天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但话语中却有些反客为主的

---

① “肃反”事件的资料主要引自如下书目：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 60 页；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 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477－78、480 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6 页。

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紧接着召开的延安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取得了较量中的暂时胜利，一时之间党内似乎形成毛泽东与王明"双雄"并立的权力格局。

会后，王明同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主张，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搞独立性，俨然成为与中央对立的第二政治局。

王明回国后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关注。中共中央也及时地派人到莫斯科汇报情况。1938 年 3 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如实地汇报了中共党内的情况。任弼时在汇报中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这个意见，在任弼时到任 4 个月后的 1938 年 7 月，终于有了明晰的表达。那时正值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

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①

1938 年 9 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毛泽东与王明领袖之争的转折点，它使斗争态势发生根本性逆转。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这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承认，无疑对领袖之争的最终结局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这次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定。作为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首次由毛泽东提出，其含义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②

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而王明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在 1945 年的中共"七大"上，病中的王明坐着担架来到会场，在会场停留了 15 分钟。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缺乏威信，王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被解除。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出于挽救王明的需

---

①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6、306 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5 页。

要，代表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 44 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名列博古之前。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会场（新华社稿）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对毛泽东作了违心的颂扬，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 "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毛泽东对于王明的老底很清楚，知道他"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像，装腔作势，不太自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谈到了如何继续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

题，希望他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鉴于此，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决定，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在会上，王明也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会议结束后，3 月 16 日，毛泽东亲自到王明家里帮助他，劝他写好声明书，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毛泽东还把张闻天等人的认识材料提供给他作为参考。3 月 28 日，党中央又派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再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从速写好声明书交与党中央。可是，王明后来对党中央要他写声明书的决定一直采取拖延态度，最后干脆否认会上曾有这一决定，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耐心帮助加以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对自己严重的历史错误仍然缺乏认识，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和帮助。此后王明虽然在政法战线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对于过去的错误却一直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检查，对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一声明的决定一直拒不执行。

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他“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就王明问题作出决定，这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明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有直接关系。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表明，王明问题已发展成党内重大问题。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来，除了张国焘，中共中央还没有专门针对某个人的问题作出决定或决议。七届二中全会曾对王明问题作出过决定，但那只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对王明问题作出书

面决定，这就标志着王明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成为党内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中央委员会作出专门的决定。

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王明去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北京不久，就病倒了。因此，王明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也不知七届三中全会对他的决定。直到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交给他后，他才看到全会对他的决定。为此，王明于 8 月 17 日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明“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鉴于王明的这种态度，8 月 18 日，毛泽东就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 11 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杨尚昆立即让孟庆树代转了毛泽东的批示，通知了王明。王明在信中强调“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应在“11 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在这期间，王明的病情又有发展，于是他于 9 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并于 10 月 25 日动身去了苏联。这样王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再向党中央写出任何声明书。

1955 年初，王明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们送到机场。王明去苏联以后，秘书田书元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此后到去世为止，王明再没有回过国。

5. 家庭：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大别山区是传统革命根据地，王明的家乡安徽金寨位于其中。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群众闹革命，组织武装起义。王明一家人踊跃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他的父母、兄弟姊妹、舅舅等人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王明的父亲陈嘉渭，号聘之，为人纯朴，主持公道热心助人。1929 年 5 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 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霍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霍丘县运输公司经理等职。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又回到家乡，开过一段"糕饼店"，以后又以教书为生，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并且继续为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母亲喻幼华，善良、能干、贤慧。鄂豫皖苏区建立后，喻幼华担任女子小学校长和其他妇女工作。她时常登山涉水，到处动员妇女帮助苏区政府和红军，支援革命。

王明兄弟姊妹一共 5 个，王明为长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二。姐姐陈先民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在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

大妹陈觉民 1929 年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在商城一区模范小学教书，后调到县妇委工作。二妹陈映民 1930 年加入共青团，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 年又参加了红军，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 年，陈映民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陈映民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红军长征以后，她又跟随部队踏上了艰苦的征程，到了陕北。弟弟陈绍炜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学，后又调到六安县七区四乡苏

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以后也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王明大舅喻幼堂，共产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俩于 1930 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但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王明有没有才能？有的。王明家境贫寒，小时长得又小又瘦，但人却聪明、机灵。5 岁启蒙，7 岁上私塾就会吟诗作对。因为个子小，王明跪在凳子上挥毫泼墨，题诗作对，成为当地一景。有一次喻先生讲《论语》，当讲到“宰予昼寝”，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时，王明和几位同学听后颇不赞同。时年 9 岁的王明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质问孔夫子：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王明这首诗歌处女作，后来被夫人孟庆树收录为《王明诗歌选集》中的第一首。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从九岁起，每逢过年前腊月二十三日左右，他就要忙着给别人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请他写春联的人很多，我们住的那条街的人，几乎全部是找他写。因为他字写得又好又快，许多老夫子写的都不如他写的好看。那时他的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写春联时只能跪在凳子上，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牵着纸张，磨着墨。他肯帮助别人，对求者从不拒绝。加上人小又有才能，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一到过年就要给绍禹买点小礼物或送几文压岁钱。”

然而，王明的悲剧在于王明的才能没有用在正道上。主要还是他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导致才非所用，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二、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者

博古（1907—1946年），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主持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

1. 临危受命：24 岁的总书记

王明在国内待的时间并不长。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后，他在国内只待了 9 个月的时间。王明 1931 年 9 月去莫斯科后，博古就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们所推行的一套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博古 9 岁丧父，年少清贫。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192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秋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俄语上帝的意思）。1930 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25 年 8 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教育影响下，10 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 10 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比王明晚一年。除反对中共旅莫支部的斗争未参加外，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山大学所有的派别斗争，成为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但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30 年 5 月回国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及《劳动》三日刊工作，与王明一起组织小集团活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之后在米夫的支持下，反对立三路线和所谓的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被任命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虽然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从 4 月开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顾顺章叛变后，博古也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进入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向忠发叛变后，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博古与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 6 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年，他只有 24 岁。1933 年 1 月，博古等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来到中

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工作。1934 年 1 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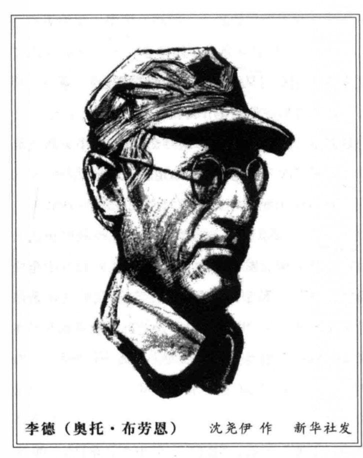
博古的思想与王明是完全一致的。1931 年 9 月 20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就是由王明起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2 年 1 月 9 日通过下发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后来由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制定的方针政策，与王明的《两条路线》以及《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博古在被批判时是并列的，被称为“王明、博古宗派”，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1933 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出动 100 万军队、500 架飞机、1200 门大炮，在全国范围内对红色根据地展开第五次“围剿”，其中 50 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博古担任野战军司令部政委。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尽管予敌以重创，但红军亦遭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2. 军事失败：聘用李德的恶果

博古本人不懂军事，所有的军事上的事情都是交给别的同志去做。其中有一个人叫作李德。李德是何许人也？他是如何成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此话说来还有一番渊源。

原来，1931 年 6 月 1 日，有一个叫约瑟夫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


李德（奥托·布劳恩） 沈尧伊 作 新华社发

李德（奥托·布劳恩）画像（新华社稿）

被英国警察逮捕。经审问，发现约瑟夫是负责向马来亚共产党人转递经费的，这个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租界警务处迅速查实了这些信箱是属于名叫牛兰夫妇的。这样，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就逮捕了牛兰夫妇。人虽然抓住了，但租界当局却无法最终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这一秘密一直到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布，牛兰夫妇的真实情况才披露给世人。

原来，牛兰夫妇是受共产国际指派，于 1927 年 11 月到上海来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的。他们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本来，牛兰夫妇隐藏得非常深，令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无处下手，已经准备放人。但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即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叛变后，所供认的情况中包括了牛兰夫妇。但顾顺章并没有见过牛兰夫妇，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

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尽管牛兰夫妇的身份得不到确认，但由于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国民党方面还是认定牛兰就是“牛轧糖”。于是把牛兰夫妇“引渡”过来，押往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共产国际于是指令佐尔格负责营救牛兰夫妇。佐尔格要求送来两万美元，用于贿赂中国有关官员。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人分头携带两万美元来到上海，其中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奥托·布劳恩（1900—1974），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两次被捕，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 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31 年 6 月，毕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巧碰到需要有人给佐尔格送款这件事。于是，布劳恩就作为送款员来到了上海。哪知到了中国竟一去不复返。

关于李德来华说法多样。一说李德是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指派；二说他是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后跟随博古去了苏区；三是奥托·布劳恩自己所著《中国纪事》所述，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现在发现的材料则说李德是博古代表中共中央所请的军事顾问，带有私人性质。

据王树增在《长征，你所不知道的故事》里记叙，1937 年，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了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作过什么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

派到中国去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估计王明也仅限于知道李德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但是不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他也不清楚。

奥托・布劳恩到达中国时，博古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他们两人曾经在莫斯科相识，在上海一见如故。两人从 1932 年初到 1933 年初在上海相处了整整一年。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由于自己缺乏军事工作的经验，更由于奥托・布劳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于是，博古在 1933 年春动身去中央苏区前就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由此可以看出，奥托・布劳恩并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而是博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聘请的军事顾问。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正在来上海途中，后来也没有去苏区。

到苏区后，博古迅速把他推介给党内其他同志。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丰富斗争经验的

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作为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新手，也不具备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能力，他与博古抛弃了井冈山地区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法，硬搬硬套西方战法，其结果只能是失败，给中国革命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李德作为所谓的军事顾问，在根据地仍然过着西方式生活。博古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一座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四周是稻田，还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这也是人们后来称呼李德的代号。博古还为他找了老婆，以满足他旺盛的生理需求。

正是因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是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西征”，到湘西根据地去同贺龙、萧克领导的二、六方面军会合。1934 年 10 月中旬，西征开始了。岂知一去不回，走上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红军的惨重失败，使博古痛心疾首。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代，可又一筹莫展。行军路上，他常拿着一把小手枪，朝自己乱比画，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对自己以前的做法和主张产生了怀疑。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与会同志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红军挫败的主要原因。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决定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博古的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就此结束了。

博古虽然犯了重大错误，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比如，在遵义会议期间和会后，凯丰（何克全）坚持“左”倾错误，对博古说“这个大印不能交出去!”博古严正拒绝了挑拨性意见，表示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他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把文件担子放到了张闻天处。遵义会议后，博古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与张、周、毛共同领导长征。博古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先后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为此，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表示过：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延安时期，博古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博古曾担任过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和《新华日报》董事会成员、《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等职。陈毅有一首诗：“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虽然是以清凉山来指称延安，但清凉山就是当时延安的新闻中心，党中央的声音就是通过这里的电波、报纸传播到全国各地。

博古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自己曾经犯过的“左”倾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他多次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①] 在《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整风学习中，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犯错误的教训，说他20岁刚出头当党的总书记，除了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别的知道的很少，这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1945年6月，博古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等同志在重庆出席国共谈判与政协会议，在由重庆飞返延安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途中，由于云浓雾大飞机迷失方向，撞在山西省兴县以南40公里处的黑茶山而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刚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来的原新四军军长叶挺等17人。博古时年39岁。

博古和王明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然而，他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有志的革命青年和学生领袖，在革命斗争中崭露头角；他们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并成为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宗派的成员；他们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在20多岁就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们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

---

① 吴葆朴、李志英、朱星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页；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23页。

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都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他们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法律、宣传等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继续做出了贡献。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王明较早地认识到了一些“左”倾错误，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曾多次对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对于错误的纠正上，博古要比王明彻底。他们在延安整风中的态度不一样，因而结局也不一样。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博古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整风中受到批评后，曾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

第五章

长征路上的“左”倾分化

平稳过渡时期的领导人张闻天



张闻天（1900—1976 年），曾化名洛甫，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浦东）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17 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 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同年，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 7 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 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 年 6 月初在上海入党，10 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做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张闻天 1931 年 2 月回国。从 3 月起，以中央宣传部长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1931 年 9 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 年 1 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 年参加长征。延安时期主管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1938 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1950 年以后，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9 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1976 年 7 月 1 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一、负总责：长征途中领导人的调整

1. 红色教授：理论水平高

张闻天是党内造诣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功底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1917 年，17 岁的张闻天进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这里，张闻天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接触了欧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受到了民主、自由的熏陶。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对他思想的觉醒起了决定的作用，由此开始，他对旧中国的一切产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闻天立即投身到南京学生运动中，成了最活跃的几个学生之一。随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不少政论、杂评和感想录，开始了最初的社会、政治活动。这时候，张闻天便表现出理论特长。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 年 8 月，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 50 号至 52 号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进窥”（即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此文还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中的这些活动，展现了他日后成为革命思想家、理论家的才华，是他迈向中国领导层的起点。

张闻天还自有其特殊之处，他既到过日本、苏联留学，更是党内早期唯一有留学美国经历的领导人。1920 年 7 月中旬，张闻天和沈泽民一起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1922 年 8 月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勤工俭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24 年 1 月回国。这段留美生涯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1985 年，何锡麟先生曾经回忆：“1945 年，张闻天用商量的口气和我说，‘研究世界经济，是否应以研究美国经济为中心?’张闻天的这一意见，不仅显示了他在国际经济方面，多么富有远见，而且，也表明张闻天的留美生活，使他对美国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多么的熟悉。”张闻天后来能成为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在经济思想上，有很深的造诣，同他的留美经历有直接关系。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他又同萧楚女、杨闇公等共产党人一起，在重庆传播新文化，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邓小平在 1979 年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赞扬张闻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这是很贴切的评价。

1925 年 10 月，张闻天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他同行的有 100 多人。在这批人中间，有些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内以至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如云泽（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以及陈绍禹（王明）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属这一批。

张闻天编在第一班，通称英文班。同班同学大多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听苏俄教员用英语讲课。张闻天是他们中唯一留学过美国的人。所以，他是以译员身份在学生名单之外单列。对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张闻天都学得很好。他还担任学校的英文翻译，同时又集中精力学俄语。4 个月后，张闻天就开始充任学校的俄文翻译了。他还是中大墙报的编委会成员、经常撰稿人。1926 年 2 月，张闻天被批准为中大联共（布）支部局下设的组织委员会和宣传鼓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3 月又被批准为教育会议成员。张闻天在国内本来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新文学家了，又先后留

学日本和美国，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以他原有的学识和名望，再加上勤奋、坦诚，很快就成为中大的突出人物，为师生所瞩目。

1928 年 9 月，张闻天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 4 人，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苏联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被旅莫中国学生戏称为“四大教授”之一。张闻天在莫斯科留学长达五年，其中有三年是在中大，最后两年转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但同时还在中大兼课，与中大仍有工作上的来往和联系。对于张闻天，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五年的学习和深造使他获得了理论上的提高，正如杨尚昆所说，张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他在中大读书非常勤奋，当时与他同过学的李敬永回忆说：“闻天同志学习非常努力，早晨起得很早，我也是一个好早起的人，可是每天我起床时，总见他已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他读书很多，知识渊博，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都学得很好。“事实上他不仅勤奋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主动学习，善于钻研和思考问题。

2. 中央书记处成员：地位比较高

张闻天于 1931 年 2 月从苏联回到上海。此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已经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在王明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正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并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出一批干部。难怪博古一见到张闻天，就十分高兴地连声说道：欢迎，欢迎！目前党很需要“理论干部”，也很需要“斗争干部”。王明、博古等人在国内并没有扎实的群众基础，的确需要张闻天这样理论水平很高的人来壮大他们的队伍，于是极力拉拢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在此之前的 2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张闻天的好友、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因此，张闻天这时从国外回

来，正好填补了中央宣传部长这个空缺。当然张闻天也不感到突然，凭他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和能说会写的才华，应该是能够胜任这一职位的。

自此，张闻天开始以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他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张闻天上任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撰写文章，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工作勤奋，文思敏捷，仅仅两个月时间，就在《红旗周报》等党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分析政治形势，揭露帝国主义，抨击南京政府，指导党的工作。就在张闻天工作刚刚走上正轨的时候，党中央机关出了大事。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连续遭到国民党破坏。蒋介石悬赏500元大洋捉拿王明，王明不敢在国内待下去，避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王明、周恩来尚未决定离开上海之前，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曾经成立过“上海中央局”，协助他们两人工作。张闻天是上海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其他成员是卢福坦、博古、李竹声、李富春）。王、周两人作出离开上海的决定以后，周、王、博、洛（洛甫即张闻天）四人9月在博古家中开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秦邦宪是总负责人，张闻天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九名委员之一（另外八名委员是：卢福坦、秦邦宪、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同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另外三个成员是卢福坦、秦邦宪、康生）。张闻天同临时中央其他同志一道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

随着白色恐怖加剧，到1932年冬，中央已经难以在上海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1月，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会上，张闻天被补选

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的张闻天已经成为仅次于总书记博古的党内领导人，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

所以，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对张闻天的争取，就是对“左”倾教条集团核心的分化。正如毛泽东所说：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因为他的地位，而且还有他个人本身的因素。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①] 在遵义会议上，由张闻天根据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事先拟定的“三人提纲”，作对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提出了系统的批评的“反报告”是最恰当的人选。正是因为他的服众和在遵义会议上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被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推举为取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人。

3. 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走上正确路线的轨道

张闻天长期沉浸于理论研究与宣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曾经一时之间为王明教条主义所迷惑，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成为“左”倾集团成员之一。回国后又成为当时“左”倾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积极执行“左”倾路线。但张闻天又和王明“左”倾宗派主义其他成员有明显的差别。王明、博古、王稼祥都是青年学生，张闻天比他们年岁大（比王明大4岁，比博古大7岁，比王稼祥大6岁），社会经历多，老成稳重，政治上也更成熟一些，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对“左”倾错误发现得比较早，

---

①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认识转变得也比较快。

回国后，张闻天在工作中经历了从“博洛矛盾”到“毛洛合作”，反映了张闻天从思想认识、方针政策以至策略路线方面逐步挣脱“左”的桎梏的过程，也是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分歧产生、发展的过程。这是张闻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节点”，对中共党史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张闻天同秦邦宪相识于 1925 年。当时，张闻天曾到博古就读的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作过讲演。同年 10 月张闻天到苏联留学；第二年年底，博古也到了莫斯科。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博、洛都站在支部局的一边。回国后在临时中央的共事期间，两人虽然工作作风不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在中央苏区，张闻天也站在“左”倾路线的歧途上与博古一道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参与领导了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甚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尽管张闻天身为“左”倾中央的重要成员，但他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不同，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勇于独立思考，并对苏区领导工作有着许多独到见解。

早在上海临时中央时，张闻天看到“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就逐渐醒悟，开始努力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1932 年 10 月，临时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张闻天就将“左”倾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在革命危急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将临时中央自身工作中的错误，作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张闻天之前还没有过，也预示着张闻天终究要同“左”倾错误分道扬镳。这也说明：虽然这时张闻天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临时中央“左”倾思想的束缚，但已处在努力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逐步变化过程中。[①]

1933年初，他到中央苏区后，在实地考察了“左”倾路线在苏区实施的后果后，逐渐对某些“左”倾政策产生了异议。此后，随着对“左”倾路线认识的深入，他与“左”倾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李德产生了分歧，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尤其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对“福建事变”的政策等问题上与博古等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有几件事，可看出“博洛矛盾”的端倪。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与强烈的反响。可是，博古对于这个宣言却是竭力反对，以关门主义的态度拒绝正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张闻天则表示赞同。两人分歧初现。

福建事变后，张闻天与博古之间的分歧更大了。福建事变发生在1933年11月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以反帝倒蒋为职志”，在与红军方面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的基础上，通电反蒋，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变发生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初，这无疑是红军统战破敌、打破敌军“围剿”的绝好机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都提出了把握这一良机的主张。张闻天也认为，应该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军事同盟，互相支援，配合作战，以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可是，博古、李德对这些建

---

① 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议置若罔闻，不予理会。他们在政治上采取“左”倾关门主义方针，认为福建事变“只是一伙政客欺骗民众的把戏而已”；在军事上，他们拒绝毛、周、张、彭等人的正确建议，坚持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既不出击，也不拦截，葬送了一次破敌“围剿”的极好的机会。对此，毛泽东气愤地说：“愚蠢！这是帮助蒋介石的最愚蠢的方针!”张闻天不仅坚决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做法，而且还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36期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博古等人“自命为清高的，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作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这除了表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者不知道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动摇，来取得我们自己的利益。”博古、李德错误地对待福建事变，拒绝援助十九路军，后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策反和十几万重兵“讨伐”下，归于失败。蒋介石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迅速掉转枪口，回师江西，将几十万大军分成东、中、西三路，重新向江西中央苏区杀来。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这才有唇亡齿寒之感，可为时已晚。

广昌战役前后，“博洛矛盾”更是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 年 3 月，敌人集中 11 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张、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 9 个师的兵力，并亲赴前线直接指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 4 月 10 日至 28 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 18 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两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在 4 月 28 日撤离。

广昌战役的失败完全是李德、博古不接受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推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结果。广昌战役失败后，约在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斥之为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此后，张闻天受到排挤，被调往闽赣地方做巡视工作。离开了“左”倾思想的中心，张闻天更加广泛地接触到了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使其进一步体验到“左”倾错误的危害。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在组织上受到排挤，最终被挤出了中央实际领导核心，被遣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闻天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张闻天就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未按博古的意图去架空、排斥毛泽东，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与毛泽东真诚合作的态度。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泽东参加。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闻天也主动接近毛泽东，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张闻天都搬到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在交流与探讨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思想日益接近，加之政治上二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境遇，使他们对“左”倾中央的不满产生了共鸣。这样，到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张闻天已开始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倾向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

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闻天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泽东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三个成员中，毛泽东、王稼祥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自长征出发后至遵义会议期间与“最高三人团”的斗争诙谐地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整风笔记中说：“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谈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又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

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 1934 年 11 月底突破湘江时，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 8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中央红军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失去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李德老发脾气。李德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执行他的决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张闻天、王稼祥和毛泽东一起，准备和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在党的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曾经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2]

4. 领导才干与民主作风：容易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遵义会议既然否定了博古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且遵义会议后党在政治、军事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了，可在组织上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被推举为全党的领袖而是推举了张闻天呢？有人说是毛泽东谦虚。但这种分析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那究竟是为什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 12 月 16 日）》，转引自石志夫、周文琪编：《李德与中国革命（有关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 页。

②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1 页。

么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处于党内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时期，张闻天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是在极端困难的时刻召开的，起到了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但当时党内在正确与错误路线的认识上并不统一，有很多人尚未从“左”倾路线方面转过来。遵义会议也是一次紧急会议，完成党的领导集团的人事更迭和路线转换，搞不好会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那样的话，罪莫大焉。因此，这时候必须选出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作为过渡。这个人代表着未来正确路线的走向，也必须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以超群的领导才干和民主的工作作风统领全党，团结红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长征这一战略转移。无疑地，张闻天是非常适合的人选。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能够得到“意见一致的”推举即是很好的诠释。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指挥错误，但“左”倾领导时期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是来不及清算的。也就是说，遵义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但并没有全面肯定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曾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并发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就全党范围来讲，并不为人们所了解，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大张旗鼓地歪曲、贬低和批判，使得人们对毛泽东更加不够了解。张闻天曾经回忆，他到苏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认识毛泽东，对“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他有什么主张与本领”，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也仅仅是局限在“偏于作战”，“主持战争”是其长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任命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后，仍然不相信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提出要求中央开会来讨论军事问题。这就是说，毛泽东这时在党内的知名度并不高，他的思想并不为人们所熟悉。这是其一。

其二，还有一些人对批判“左”倾错误抵触情绪很大，对毛泽东成见很深。比如说，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就指责毛泽东“打仗

的方法不高明”，“顶多是看了《孙子兵法》!”毛泽东对此后来说，他那时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听何凯丰这么一说，倒促使他要找到《孙子兵法》看一看。何凯丰甚至鼓动博古“不能把大印交出去”。

其三，这时候为什么不选周恩来做总负责人？美国研究周恩来的学者张大卫曾经感到疑惑，就说“周恩来为什么拒绝把自己的潜在支持者组织起来”，而是全力支持毛泽东呢？周恩来从 1927 年起就一直在党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是一名老资格的领导人。但他不是王明派系的，所以，始终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排挤。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瞿秋白一起纠正“立三路线”，被王明一伙攻击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想把周恩来挤出领导层，但周恩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正直的道德品质为全党所公认，因而没有得逞。在王明路线统治下，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到苏区后，他同朱德一起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纠正肃反扩大化；在长征初期，周恩来力主采纳毛泽东的主张，避免红军全军覆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周恩来的性格特点以及长期养成的组织纪律观念，以及刚刚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不久，他不会采取像毛泽东乃至张闻天、王稼祥那样尖锐的形式，去和“左”倾错误领导人博古、李德作斗争。而只能采取主动承担责任、带头自我批评的方式支持毛泽东。

综合以上来看，在国民党百万军队围追堵截的生死关头，为了不至于使党内分歧演化为一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残酷斗争，需要选出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包括以后也可以向共产国际好交代的领袖人物，张闻天无疑是不二人选。李维汉曾就此做过分析。他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毛泽东等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是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时，如

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有重大意义。”[①]

张闻天的个人品质、领导才干和工作作风也得到了大家一致公认的好评。他对党忠心耿耿，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他对同志满腔热忱，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干部。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他作风民主，工作扎实。张闻天并不是一个喜爱争权的人，相反，他对此看得清醒，总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正是从党的利益出发，张闻天原则性强，不苟且，不怕事，不随波逐流左右摇摆；民主作风好，尊重人，团结人，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如他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共事，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同志参加和指导。据当时主管政府经济工作的吴亮平回忆，那时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住在瑞金下岗区沙洲坝，两人相邻而居，每当吴亮平有事请示张闻天时，张闻天总要他再到隔壁向毛泽东请示。张闻天同志尊重毛泽东同志，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工作方法。为了加强基层苏维埃的建设，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于 1933 年秋到几个乡作系统的调查，写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的著名指导文章。张闻天认为开调查会是个好办法，也召集几个区的同志开调查会，写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人民委员会专门出版了毛泽东、张闻天所著的这两篇文章的合订本，有人称赞这本书对苏区政府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张闻天同志高兴地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在苏区的肃反中，一些干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甚至迫害的时

---

①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毛泽东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 页。

候，张闻天同志总是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保护干部。如有人诬陷傅连暲是 AB 团，社会民主党，还要抓走他。张闻天听说了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卫生部门负责人，严肃地批评了对方，说“傅连暲的事你们不能再搞了，马上停止，要是不停止再搞下去的话，就处分你。”这样，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保护了傅连暲。傅连暲以后多次对夫人说，我这条命是张闻天救的，当时如果没有张闻天打那个电话，出来替我说话，我怕早就死掉了。

二、离职过程：平稳过渡

1. 有职有权阶段

张闻天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遵义会议在组织问题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1935年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扎西水田寨花房子）里宿营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上所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就从组织上撤换了党中央主要领导，正式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负责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负总责”的作用。这一时期党中央常委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后奉派出国）五人组成。毛泽东是其中的“灵魂”。张闻天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倾注全部精力与才智，团结中央



这是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会议室（新华社稿）

政治局，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为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努力。张闻天任职期间，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出了特有的贡献。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长征途中，坚决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战略。到达陕北后，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持召开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起草制定了《中央关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一文件与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起成为我党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标志。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闻天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统一战线转移到全国的统一战线”，反对“审蒋”、“除蒋”，而应“释蒋”。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支持毛泽东的独立的敌后游击战路线，反对王明的投降主义。

这段时期，毛、洛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

泽东看出张闻天心仪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关心，为他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成眷属。

张闻天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 年 4 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议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上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做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张闻天作风民主，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闻天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自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遇事总是同毛泽东商量。从 1935 年 10 月初到陕北直至 1938 年 10

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①] 杨尚昆曾经评价张闻天对促进党的团结方面的贡献，说：“自从他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样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

党的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2. 主持中央工作阶段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党内不再设总书记，由洛甫、毛泽东、王明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张闻天不再被称为总书记，但仍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一直到1938年9月—11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遵照共产国际关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六届六中全会上，也有人提出“毛泽东为总书记”，会议没有能够讨论这个问题。1943年12月整风运动中，张闻天检讨说：“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

3. 形式上当政治局会议主席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威信空前提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逐渐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面对这一事实，张闻天表现了明知豁达的态度。

---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1938年4月12日，张闻天针对中共中央已经成立集体领导的书记处而外间仍盛称他为总书记的状况，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张闻天（洛甫）启事》，指出：“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采取“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的方针，主动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1939年初，张闻天已经不担任中央负总责之职。1939年7月至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只分管宣传、干部教育工作。1940年5月，张闻天将象征一把手的秘书处移交给毛泽东。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离开延安到西北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从此事实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1943年3月，中共中央实施机构调整，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4. 延安整风中权力移交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这样的叙述：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

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一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1941 年 9 月至 10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说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听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以后，张闻天第一个作检讨。他首先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不谈自己的功劳，不计较名位，没有牢骚怨言，而是老老实实，坦率真诚，无情地解剖自己。对于过去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发言中，张闻天还提出"补课"的问题。他说：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这次会后，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了，对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认识也更为系统和深刻。张闻天说话算数，不仅是口头表示，而是有实际行动。从 1942 年 1 月起，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直到 1943 年 5 月才回到延安。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犯过路线错误的大有人在，但以这种形式进行"补课"的，张闻天是第一人。

张闻天作为党的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战初

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他毕生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他的理论创造，曾一度被埋没，他本人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事实上，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共党史上应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张闻天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有着许多重大贡献和理论创造。在五四运动中，他是青年学生中自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邓小平称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他还积极参加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取得胜利的奠基人；他是“左”倾领导集团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率先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的“左”的策略；他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对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中共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与毛泽东紧密合作，战胜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党史专家张培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 1937 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中，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巩固。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

“左”倾错误，成为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

邓小平在 1979 年 8 月 25 日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号召学习张闻天同志“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①] 张闻天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科学地分析了东北经济构成，提出了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他在“文革”中所写的肇庆文稿，是批判“左”倾错误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他也是党内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1937 年 9 月 10 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张闻天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后来，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和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体而精辟的阐述。并且，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有颇多建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1995 年 8 月 31 日，《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暨纪念张闻天同志九十五诞辰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发表纪念讲话，称：张闻天同志作为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坚决站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一边，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的斗争。他在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贯彻党的

---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8 月 26 日。

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同志为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战略转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①2000 年 8 月 30 日，江泽民在纪念张闻天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提到："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受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②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辞世之时，恰逢建党 55 周年。后有昔日战友和部下著《怀念张闻天》诗，评价其一生曰：

留日留美复留苏，遵义庐山何嗟如。

残冬未尽身先逝，化作春泥香如故。

闻公立志解民忧，逆风疾雨劲更道。

诲人不倦深得益，甘为孺牛照千秋。

---

① 《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1 日。

② 江泽民：《在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 年 8 月 31 日。



第六章

名至实归的中共领袖

遵义会议之后的领导人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当了半年兵。1914年到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

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同年 8 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 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 1930 年底起，同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长征途中，参加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开始确立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开始后，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 年 10 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 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达到空前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1943 年 3 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 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 1976 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一、确立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到七大

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党的七大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

1. 遵义会议：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1921 年他作为湖南长沙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党的一大，1923 年中共三大时成为中央局秘书。1927 年八七会议至 11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秋收起义途中，毛泽东大胆放弃原准备攻打浏阳、长沙的设想，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转兵罗霄山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井冈山的宁冈会师。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此后，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红军队伍不断增加，根据地不断扩大，掀起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为此建立了不朽功勋，也先后担任了红四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28 年 6 月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

为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这时还只是政治局一般成员。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后设政治局常委，五中全会后设书记处（即常委），毛泽东均非其成员。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1933 年 1 月后，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所掌控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不断受到排挤。在“左”倾集团领导人眼里，毛泽东是苏区右倾路线的头子。从 1931 年赣南会议到 1934 年 10 月长征开始，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所担任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之领导职务逐步被剥夺。1934 年，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为张闻天所代替，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成为虚衔。毛泽东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博古在苏区开展的批斗“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的。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权，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感叹：“那时候，我这座庙不灵了，整整几年时间里，鬼都没得一个上门的。”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心中的郁闷和压抑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也不愿与“左”倾路线的一帮人在一起共事。中央红军准备放弃根据地西征，毛泽东就明确表示不走，留下来打游击。关于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前因后果，过去一直是说博古、李德等人不想带毛泽东走，担心毛泽东会利用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夺取红军领导权，因而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让他在中央苏区自生自灭。如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

了。"[①] 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现在不少材料又披露不是博古不想带毛泽东走，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不想走。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最佳搭档。周恩来有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以党的利益为核心，以党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以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相忍为党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他全力支持毛泽东，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周恩来的性格和能力使然。这不是说他的性格不好或者能力不强，从性格方面讲，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个完美的人；从能力方面讲，他也是中共党内英杰。周恩来 1898 年出生，比毛泽东小 5 岁。但他很早就倾向革命，从事革命活动，几乎与毛泽东同时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他 19 岁时留学日本，21 岁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22 岁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24 岁时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26 岁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27 岁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28 岁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1927 年 8 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 年六大以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31 年 12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 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

①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 1 辑，第 176 页。

得了重大的胜利。从周恩来的简历中，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足以担当起领导职责。

周恩来善于组织和协调，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翻开中国现代史，周恩来的名字始终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毛、周两人无疑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一对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的政治搭档，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合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剧。如果说毛泽东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领袖；那么周恩来则是执行者，是首辅，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曾有一位国民党官员对尼克松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则可能是我们。"当然，这话未必尽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一团烈火，周恩来是一个控制火势的人。"从性格和才能上说，毛与周可以说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毛泽东离经叛道，特立独行，善于谋划，战略性强，具有大开大阖的领袖气魄。周恩来则克己忍让，顾全大局，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善于组织，善于求同存异，执行力强。

最重要原因还是在于周恩来在工作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正确性。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发生在他与博古之间。这次谈话则反映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深刻认同。谈话发生在遵义会议后，博古不再担任中央负责人了，准备由张闻天接替他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地明确下来。所以，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都还由博古掌管。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遵义会议 20 天之后。跟着博古的那两个挑子怎么拿过来？这个问题也是由周恩来去解决的。周恩来在那天晚上与博古彻夜长谈，解开了博古心中的块垒，心甘情愿地拥护中央决定。他们是怎样谈的呢？博古曾经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

汉年做了笔记，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而是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博古听了周恩来的一番话语，也感觉到了这一点，第二天一早就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全部交出来了。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一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他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的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至深。①

那么，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相识、相知和相行的呢？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初相识是在 1925 年 10 月。彼时，毛泽东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两人初次见面，一个忙于东征、一个正在上任，虽近在咫尺，但却一直无暇过深交往。但在广州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伙伴关系；两人互相佩服对方的才干。周恩来在领导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时，为了搞好政治教育，特邀毛泽东等同志去作专题报告；而 1926 年毛泽东受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亲自选择了 16 名教师，也包括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去了南昌领导起义，毛泽东则被派到湘赣边界

---

① 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 年版，第 121 页。

领导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遇到挫折，被撤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军队。事情反映到中央，当时周恩来在中央负责，以中央名义写了一封信交陈毅带回井冈山，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由此，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确立了更加牢固的领导地位，使毛泽东的一些思想主张能在根据地各项工作中得到贯彻。这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上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党的发展和事业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根据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上的才能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

1932 年 1 月，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以目前红军的力量不应打大城市，可以打一些地主土豪的寨子。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致电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坚持要红军攻打城市。结果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还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局。周恩来派项英去请被王明一伙闲置在一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口信时，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匆匆下山了。毛泽东赶到前线，指挥部队撤出战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自此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更加信任，也更注意发挥他的作用。1932 年 3 月 30 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作出一个正确判断，他致电周恩来，提议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开创革命根据地新局面。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并亲自前往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 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取得了漳州大捷，歼敌约四个团，缴获了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王明路线办事，而多次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1932 年 10 月上旬，在宁都会议上，

一些人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军事全责。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①

1932 年 10 月后，周恩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 年春，他和朱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在指挥红军转战南北，连连获胜时，他仍思考着如何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问题。他一再致电临时中央，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他认为"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终被恢复了军中的职务。

1933 年 12 月 20 日，博古、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广昌战役后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周恩来曾经说，当时"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② 博古、李德等人多次否定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片根据地丧失，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长征开始后，第一仗是湘江战役。这一仗使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人数锐减到 3 万人。广大红军指战员都希望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紧急召开临时会议，

---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8 页。

②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 1 领袖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7 页。

毛泽东被吸收参加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会上，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力主避实就虚，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人员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参加高层决策会议，他的战略转兵主张为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

1934年12月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2月18日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李德、博古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决定立即北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酝酿和准备作用。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1. 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 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3. 常委中再进行分工；4. 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了党中央最高决策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

领导地位开始确立。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会议室（新华社稿）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毛泽东这时还不是党的最高负责人。但是，我们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

---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9—492 页。

导地位，是有历史依据的。

其一，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胜利。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过许多意见，但均遭排斥，致使广大干部中的不满情绪日渐增多，要求改变领导的愿望也日渐强烈，党内争论激烈。直到1934年12月党中央先后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此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取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并在遵义会议前夜，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一个全面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反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是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共同商议，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的。这一点，邓小平在张闻天的追悼词中讲得很清楚，说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①] 毛泽东在会上也发了言，受到与会同志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可见，遵义会议从酝酿召开到作出决议，都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胜利。

其二，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的错误领导。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决定军事指挥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就结束了“左”倾的错误领导。

其三，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直至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三人团”，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会后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在3月4日被指定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有了直接指挥红军的正式权力。到3月11日，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

---

① 《悼念张闻天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组，是党中央在当时处理党、政、军要务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伍修权曾回忆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参加书记处。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①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可以从邓小平的回忆中得到证实。邓小平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遵义会议。他说："每天住下来，要等每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②

1935 年 2 月 5 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博古还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1935 年 3 月 4 日，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保证军事上的集中、机动和前方指挥的有效性，由张闻天提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遵义战役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接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要求"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

---

① 聂荣臻等著：《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7 页。

②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第 44 页。

受前敌司令部指挥”。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首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贵州苟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不能靠许多人开会集体研究决策，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使红军有了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和决策机构，代表中央行使军事指挥决策权。毛泽东进入党中央军事指挥决策核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从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2. 六届六中全会：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当然，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斗争确立的。

红军四渡赤水，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四川会理地区。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某些基层指战员有些怨言。此时，林彪甚至提出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改变军事领导的意见，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率领部队南下，并另立中央，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对抗。后经过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6 年 12 月 7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1937 年 11 月份，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12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1938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又作了长篇的总结发言，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党的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还于 1937 年 12 月 25 日在武汉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引起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他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

由于他在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要纠正他的错误，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一起

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1938 年 6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会上，任弼时、王稼祥都作了发言。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央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这个文件由王稼祥带回中国。此外，还有一个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文件。王稼祥动身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并作了重要谈话，其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当时很高兴，感到毛泽东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王稼祥于 1938 年 7 月回到延安。[①]

1938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指定王稼祥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文件。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②]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六届六中全会前，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时

---

①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6、306 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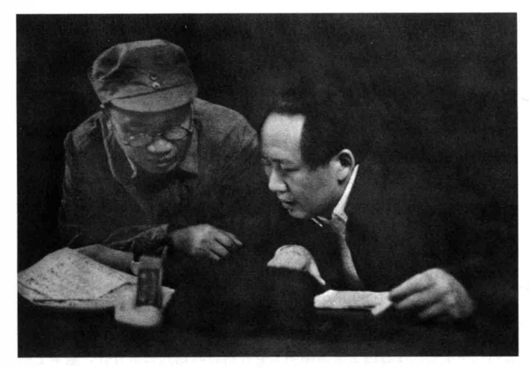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

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在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出席会议的王明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上全面阐明了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方针，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在组织上，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会后，张闻天主动将决策工作转移给毛泽东。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决断。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3. 党的七大：领导地位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42 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党受到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七大上的毛泽东和朱德（新华社稿）

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

上致开幕词和作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正式选出新的领导班子，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确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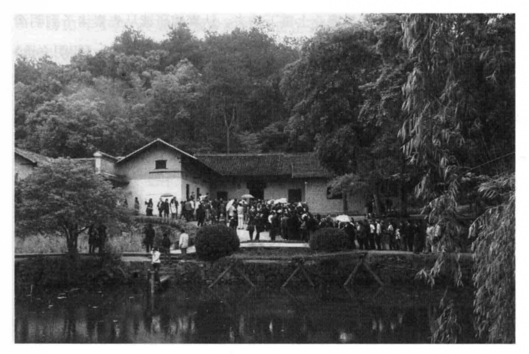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和到党的七大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确立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二、全党领袖：革命实践中产生

1. 革命早：党的创建者之一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这里是一个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航的河流，与外界少通消息；老百姓世代务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愚昧而落后。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塑造人生。毛泽东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就始于他的读书识字。其父毛顺生克勤克俭，精明能干。他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外出长了见识也想继续扩大家业的毛顺生意识到了识字的重要性，想把儿子培养成能帮自己记账的识文断字的“新型农民”。这也就给了幼年的毛泽东读书上学的机会，也开始了毛泽东为了求学而走出山村、龙游大海的壮阔历程。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由一个平凡的乡村青年转而立志宏远，把他的一生都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志向高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一次他走进了距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这里接受新学教育。也正是在这里，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位两年；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开始了他的政治启蒙，开始崇拜康梁，接受维新派思想，崇尚改良主义，成为他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梯阶。



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冲（新华社稿）

1911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来到长沙，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毛泽东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感受到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概，越来越倾向于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勾画心目中的政治蓝图，剪辫，投笔从戎，尽管稚嫩、简单，但兴奋、大胆，富于激情。辛亥革命后，毛泽东重归学业，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营养。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苦学砺志，心系社会，是毛泽东这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按照这一设计，他逐步确立了“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的目标，“畜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而一旦确立“改造社会事”的理想，他的读书就始终围绕着这一目标来进行。他在修身、哲

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业上重下功夫，认真地研读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几乎一一读过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这位青年身上逐步交汇起来。这为他后来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悄然兴起。与其他有志青年一样，心怀社会责任感的毛泽东这时也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真理。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创刊。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唤醒了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①]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5 页。

1918年4月，毛泽东领导和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开始了他与进步青年们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砥砺品行、切磋学术，从事革命活动，并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在众说纷呈的背景下，毛泽东受到了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研究并信奉它们。这并不妨碍他在各种学说的比较与鉴别中选择马克思主义。难得的是，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行给了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①]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平前，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7月，他创办了《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宣传用平民主义

---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打倒强权统治的思想。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只存在一个多月，在湖南却发生了很大影响。胡适当时《每周评论》推介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湘江评论》宣传“激进主义”而遭到了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也由于张敬尧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民愤汹汹，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为争取全国各地支持，1919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曾多次亲自带领群众到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示威。经过斗争，这场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次到北京，是他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关键阶段。这期间，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十分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

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①] 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极具重大意义的飞跃。由此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920 年 5 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同时送行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②]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与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7 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文化书社，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转向俄国。他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使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得以到苏联留学（其中有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10 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立共产党做了各种准备。1920 年 12 月底，萧子升从

---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0、133 页。

法国回国，带来蔡和森于 9 月 16 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在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 1921 年 1 月 21 日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0 年 8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委托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湖南建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1 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6 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29 日他与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一大，与其他代表一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也成为党的最早代表之一。

2. 起点高：老练的革命家

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一方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着手培养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成立了湖南地方党组织——湖南党支部，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他曾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 1922 年 2 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何叔衡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这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份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任主任。毛泽东及其湖南支部着力领导和组织湖南工人运动，深入工人群众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会，亲自担任了好几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各地的工人大小罢工等斗争蓬勃发展。他们一共建立了 20 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四五万之多。在 1922 年下半年，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斗争，还发动了长沙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罢工，都取得了胜利。11 月，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统一的工人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担任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成为当时全国第二个（第一个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地区性统一的工会组织。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批评了上海、湖北等地，独独表扬了湖南："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于是，1923 年 4 月，陈独秀就把毛泽东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6 月，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党的三大，并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和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毛泽东回到湖南，筹建和发展湖南

国民党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 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他多次发言，除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表明自己的主张。毛泽东的表现深受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经孙中山亲自推荐，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毛泽东坚持国共合作方针，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为，遭到了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的忌恨。他们“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在 12 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离开了上海。因此也错过了 1925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四大，也未能进入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

1925 年 9 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把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搞得生气勃勃。12 月 1 日，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 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蒋介石《整理党务案》出笼后，共产党员遭到排挤，毛泽东也随之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

毛泽东还是党内最早、最深切地注意和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毛泽东自己对个人简历曾作概括时说：从 1925 年起“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早期的毛泽东，全力从事工人运动，但他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在中共三大，毛泽东就提出过农民运动的问题，还与谭平山一起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获大会通过。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但当时中共中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推进国共合作，加上

毛泽东时任中央局秘书，一时无暇真正去从事农民运动。当时，毛泽东也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但毛泽东还是寻找有利时机进行农民运动的初步试验。1925 年 2 月 6 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养病，与家乡的早期共产党人毛福轩等人一起从事农村调查和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夜校，组织协会，发展党员，创建了中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韶山支部，发起了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农民斗争。1926 年 1 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6 月，在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他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迅速成长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着力推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发展。面对党内党外对于如火如荼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先后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铁的事实力主“农民运动好得很”，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1927 年 4 月，毛泽东参加了党的五大，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面对国民党叛变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大革命惨遭失败的白色恐怖，7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上山”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①] 这一主张的提出，便是建立在对农民运动的实践经

---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上讨论湖南问题时的发言》1927 年 7 月 4 日，第 222 页。

验、真实了解和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新华社稿）

毛泽东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响亮地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明白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有意留他在中央工作，但他却坚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1927 年 9 月，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湘赣

边界的秋收起义，并且转兵井冈山，由此带来了中国革命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新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①]

3. 领导魅力：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毛泽东不是口头理论家，而是一个非常注重实践、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革命家。在革命生涯中也经历了诸多磨难，有起伏，有困厄，在磨难中锻炼成长，最终成长为全党拥戴的领袖。

（1）在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压制和排挤，经历了过山车似的“三落三起”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有过“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经历，却很少知道毛泽东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三落三起”经历。1960年12月份，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其实，毛泽东还说过，在“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王明曾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只能从中大培养出来，军人充其量只能当将军，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不能成为党的领袖。”对此，毛泽东耿耿于怀。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那么，毛泽东的三落三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毛泽东的三落三起都发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第一次大落与复起就发生在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间。

---

①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致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陷于低潮。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的论断，但是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有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嘲笑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故意拿出一把左轮手枪，不停地晃动着说：政权是从枪口里出来的呢，还是从枪屁股里出来的呢？这反映了当时党内一些人还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9月，发动湘赣边界的农民暴动。在这过程中，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最后在井冈山地区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创造性转兵却受到了主张城市中心论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不理解和严厉指责。由此导致了毛泽东的第一次大落。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毛泽东在指导秋收起义的“失败”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应予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这一文件指示1928年4月传到井冈山时，却变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使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非常郁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几度遭到敌人破坏，交通又不方便，中央的指示很难传到井冈山。于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就决定派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亲自到井冈山去传达。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关卡很多，周鲁不能随身携带文件，只是凭一传再传的记忆上山传达中央决议精神。他对开除二字记得特别清楚，至于开除什么却记不清了。

周鲁当时年仅20岁，盛气凌人，目空一切。1928年4月份，他到达

井冈山。一到就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精神。周鲁说，毛泽东不执行中央进攻长沙的指示，擅自率兵上井冈山，是临阵脱逃，犯了单纯军事投机的严重错误。为了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周鲁一宣布这一决定，大家都大吃一惊，很不理解。毛泽东也没意识到问题如此严重，感到无话可说，就卷了一支烟，坐在那里大口大口地猛抽。周鲁接着又说，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一职自然也被免除了，改任师长。然后就要求毛泽东率部队开往湘南。尽管毛泽东并不同意把部队开到湘南去，但他敌不过周鲁，拖了几天后还是率部队开往湘南。这次进军湘南导致了井冈山的“三月失败”，根据地被敌人乘虚而入，井冈山失守。这些都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事，但他无可奈何。

不过，就是在湘南，毛泽东从特委机关见到了中央的正式文件，得知自己确实被开除了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了湖南省委委员职务，但并没有被开除党籍。这时他才松了口气，埋在心里的怨气也一扫而光。到4月，朱毛会师。中央也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中央对他的处分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毛泽东担任湘东特委委员和常委。随后，毛泽东又担任了红四军党代表，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并被六大选为中央委员等。毛泽东又起来了。

毛泽东的第二次大落发生在1929年6月到11月间，也就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到九大期间。这次大落比第一次要惨，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带领贺子珍等人到中共闽西特委去指导地方工作。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遭到内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赶出了红军，当老百姓，做地方工作。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屈受“严重警告”，被选掉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无奈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部队，比第一次大落所受到的打击还要大。

这次打击把毛泽东推向了政治生涯的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还被共产国际发了“讣告”。

毛泽东的“第二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1928 年 4 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部属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之后，毛泽东逐渐取得对井冈山红色区域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壮大军队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如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军执行打仗、筹款和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等。但是，这一套在当时的红四军领导人中，认识并不一致，经常在发生争论。1929 年 5 月，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井冈山。他来了之后挑起了红军内部对毛泽东职权范围和领导作风问题的大争议。6 月 22 日，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刘安恭煽动一些人一起反对毛泽东。大会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改选前敌委员会时选了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此后，毛泽东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闽西，他大病一场，患上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而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养病去了，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9 月，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表大会，要求毛泽东参加。毛泽东以党内争论没有解决，又身染重病为由回信拒绝，于是，刘安恭等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在毛泽东治病期间，共产国际发过一个“讣告”，说他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该说，共产国际的“讣告”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多方面的依据的。一个是，中共中央那时认为朱毛红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就想把红军分散和把朱德和毛泽东调出来。为了迷惑敌人，就建议公开发一个消息，说朱德和毛泽东已经死了，或者出国了。刚好这时候《申报》发

了一个来自南昌的通讯，说吉潭一战，朱德和毛泽东或死或逃。这个消息以讹传讹，到共产国际那里就成了“讣告”；二是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在红军中露面，敌人趁机造谣说“匪徒毛泽东已死”。《申报》在 9 月和 10 月相继刊登了两则消息，说毛泽东病故、暴死。这些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自然也信以为真。当然，这个“讣告”虽说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承认。

此时上海的中共中央，虽不认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但他们却很是欣赏“党对军队保持绝对领导”的想法。同时，红四军中所出现的这些争论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离开而消失。相反，毛泽东离开之后，红四军内的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于是，前敌委员会就派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这里的具体情况。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批评了刘安恭。会后由周恩来起草了《给红军第四军的指示信》，由陈毅带回井冈山。在这封指示信精神的指导下，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等十一人为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毛泽东在第二次复起后，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军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革命的大发展，连续三次粉碎了强大敌军的“围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0 年 6 月，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

候补委员，这是他在 1925 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五年后，再次接近中共最高领导层。按照常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可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仍然以城市中心论为指导，毛泽东不仅受到了严厉谴责和猛烈攻击，而且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由于王明路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毛泽东第三次大落的时间长、打击宽、受苦深。当然，对革命的危害也更惨重。

所谓大落时间长，从 1931 年 11 月赣南会议受错误批判开始，到 1935 年遵义会议止，三年多时间，毛泽东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一直没有发言权。所谓打击宽，就是先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的主要领导，再被取消红一方面军的领导职务，最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人代替；所谓受苦深，用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来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这一次大落与复起是毛泽东也是中国革命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始于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1933 年 1 月，由博古、洛甫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尽管中央苏区不断壮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依然鄙夷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那套想法。他们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和实践越来越不满，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也让中央担忧，因此开始防范并打压毛泽东。

一是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1931 年 11 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

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职务，由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全国红军。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人之外。

二是抵制打赣州，被迫隐居古庙。1932 年 1 月，临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对此持有异议。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他的关于三次反“围剿”和“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形势的报告遭到批判，主持人的位置也被换掉，这样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也就这样被免除了。失了兵权又被免了党权，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终于被击垮了身体。于是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1 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和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养病期间，红军攻打赣州失利，毛泽东又抱病冒着大风大雨赶去救险。之后毛泽东“带过”随军行动，指挥红军节节胜利；到 8 月毛泽东参加了前线指挥机构——最高军事会议，还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三是宁都会议再次被剥夺兵权。1932 年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受到猛烈批判。毛泽东感到非常无奈。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却是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不少人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毛泽东也是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

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

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一是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当然，他并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想法，转变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增强理论修养，以此来反击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毛泽东 1957 年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 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全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①]

二是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

当然，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第五次反“围剿”中的 1934 年 4 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

①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2 页。

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三落三起的经历，既是他个人的奋斗故事，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曲折历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多次蒙受冤屈时，总是相忍为党，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而总是以坚定的革命信念，精读马列，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与各种错误作斗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并由此更加激起他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志气，勇于实践，不断创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2）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作斗争

与张国焘的斗争，毛泽东后来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张国焘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后来领导红四方面军创立了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川陕根据地。1935 年 5 月，红四方面军从报纸中得知中央红军抵达四川境内的消息，为接应中央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当年 6 月下旬，一、四方面军两支红军主力，在懋功的两河口会

师。6 月 25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两河口镇外的草坪隆重举行欢迎大会，欢迎张国焘率领的第四方面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场面盛大隆重，气氛欢快热烈。

然而，当两军会师之初的欢欣喜悦下来之后，现实的固有矛盾和分歧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并很快导致党内冲突与斗争。这首先是源于张国焘自身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张国焘在党内资格老，根底深，他 1920 年即在北京加入中共早期的组织，党的一大代表，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组织委员。当年 8 月起又兼任中国劳动组合部书记并兼《劳动周刊》主编。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上，他进入中共中央局，同年 10 月创建中共中央军事部时，张国焘即为首任主任，一直到 1927 年 4 月，才让周恩来继任。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政治局常委之一。张国焘也是著名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农工委员会主席。其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六届一中全会上，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留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 年 1 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张国焘成为政治局三常委之一，另外两人是向忠发和周恩来。当年 4 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掌管党政军大权，人称“张主席”。大权独揽后，张国焘为培植个人势力，排除异己，先后以“肃反”之名将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及红军将领许继慎、邝继勋、曾中生等逮捕杀害，并殃及大批无辜。仅到 1931 年 11 月，被他杀害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即达 2600 多人。在地方各县也有大批干部被杀。由此，他在红四方面军内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仿佛“太上皇”一般为所欲为。从这个角度看，其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膨胀后，为争夺最高权力，与党中央的冲突斗争是迟早的事。

红军会师后两支部队的对比也刺激了张国焘向中央要官要权的野心。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仅剩 1 万余人（战斗部队仅七八千人，且是官多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而且武器装备极差。而张国

焘带领的四方面军，由于转战时间短，未经历什么恶仗，部队损失不大，会师时，仅战斗部队就达 8 万多人，加上非战斗人员，达 10 万之众。与缺枪少弹、疲惫不堪的红一方面军比较起来。双方比例是 10：1，而且显得兵强马壮，人多枪多。这样，两军会师后，再让张国焘接受中央的领导，他就显得心理不平衡。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也普遍存在与中央汇合后“吃亏”的心理状态。这种现实状况下，矛盾必然要爆发。

会师大会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四方面军中，具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政治局委员身份的，仅张国焘一人。会议开了 3 天，在关于今后的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上，双方分歧初现。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提出川西北不宜建根据地，红军必须北上川陕甘地区。张国焘却提出“以西康为后方”的战略计划。不过，最后包括张国焘在内，一致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集中兵力向北进攻……以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位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然而，当周恩来将此决定通知张国焘时，他竟大为不满，悻悻而辞。回到四方面军设在理县杂谷脑的总部，张国焘于 7 月 1 日致电中央各领导，认为北上战略是“右”倾，正式提出要解决“快速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这等于是否定几天前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决定》。而所谓“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则是向中央伸手要权，言外之意是：他拥有 8 万之众的四方面军，继续听命于中央的毛、周、洛（甫，即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不行，与他们共同指挥也不行。他张国焘必须拥有对红军“统一指挥”的权力。之后，张国焘、陈昌浩明确提出“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向中央施压要权。

鉴于张国焘的咄咄进逼，张闻天提出把总书记的位子给他。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为避免分裂，团结张国焘北上，中央政治局最后决定周恩来

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让张国焘任总政委兼中央军委总负责人；增补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兵两路北上。随中央机关行动的是右路军，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张国焘、朱德等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后，就借口噶曲河涨水，渡河困难，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张国焘的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央的坚决反对，中央反复与之讲理说服，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他还给陈昌浩发去一封秘密电报，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这封电报，马上意识到了张国焘要用武力手段夺权的阴谋，于是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率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连夜北上，脱离了危险之地。而张国焘却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走上了“另立中央”之路。

10 月 5 日，张国焘在率红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建制的五军团一路南下，抵达四川北部的卓木碉后，正式打出了“第二中央”的旗号，他公然自行成立另一个“中共中央”，以及“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自封为“主席”。不仅如此，他还以所谓“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开除党籍。而此时，中央红军已一路北上，于 10 月 19 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终于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

张国焘与中央红军分裂后，四方面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并不顺利，损失惨重，其在四川建根据地的设想遭到重大打击，处境不妙；四方面军内部来讲，特别是在高级将领中，毕竟分裂不得人心。加之，1936 年 6 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西康甘孜，与张国焘会师。贺龙、任弼时坚决拥护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连同一直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一起做了张国焘的说服工作。在此内外合力下，张国焘也深感坚持分裂没有

出路，不得不同意取消了他另立的那个“中央”。与二方面军一起，再过草地，挥师北上，于 1936 年 10 月抵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3）与王明右倾错误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 11 月，王明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季米特洛夫叮嘱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说：“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①]

1937 年 11 月 14 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几天后，29 日到达延安。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切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称王明一行是“昆仑山下来的‘神

---

①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6、306 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

仙’”，“回延安来是‘喜从天降’”。但王明并不领情，而是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反客为主，迫不及待地要求召开会议，听他传达国际指示。12 月 9 日至 14 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主张放弃独立自主，要求“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不少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王明在组织上，也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16 人名单。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显而易见，12 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不久，王明来到武汉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任书记。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

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是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没有公开批评王明，甚至让王明的言论公开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毛泽东只能发发牢骚，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的问题，3 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于 4 月 14 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 月 17 日，又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弼时的汇报中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①]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193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说：“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这样，

---

①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0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24 页。

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彻底粉碎了王明的争权之举，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这对于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会上，毛泽东针对王明下车伊始，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画脚，目无中央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调王明回延安工作。会上，有 40 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会议后期，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军事主张，已经得到了全党的承认。后来，经过延安整风，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的威信与日俱增，地位日益巩固。

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组织调整，决定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共中央决定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由此终结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此后，王明耍起了两面派手法。对于毛泽东，他也是既想尽力靠拢，又心怀不满。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下极力赞扬毛泽东，其用词之丰富在中国共产党内恐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在背地里又极力加以诬蔑，其遣词之尖酸刻薄亦无人能及。在很多报告、演讲和文章中，王明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有些并不十分重要的问题，他也主动写信向毛泽东请示。1940 年 5 月 3 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 5 个字：‘学习毛泽东！’”称赞毛泽东是“全党

团结的核心”，“是公认的领袖”，表示“应该学习毛泽东”。但在心里，在别的场合，王明对毛泽东却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王明在向中国女子大学全体同志传达这个报告时说：虽说今后学习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要注意，但仍应注意好好学习理论，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他还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由于他的这种态度，致使女大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仍未改变，谁也不敢“乱联系”。但王明的本意显然不是真正强调学理论、反对“乱联系”，而是旨在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

1942 年 2 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搞党八股的文风自然都成了重点整顿目标。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等领导同志都找他谈话，启发他承认错误，帮他改正。但王明拒不承认错误，邀功诿过，推卸责任，躲避批评。甚至还使出拉帮结派的特性，试图拉拢张闻天一起抵抗整风运动。这年 3 月，张闻天回延安后去看望他时，他便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并说自己的错误只不过是什么不懂人情世故，说话随便，遭到别人的猜忌等。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王明见这一招不灵，1941 年 10 月干脆称病躺倒住院，以此来拒绝参加会议，躲避检查。1943 年 3 月 16 日到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王明见此，才不得不开始承认错误。1945 年 4 月，王明写了承认错误的“万言检讨书”，对中央点名批评他错误历史问

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事后证明这是为了过关的敷衍之辞。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义尽至，苦心等待他改正错误。在七大上，出于团结全党的目的，毛泽东一再动员代表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七大开幕那天，毛泽东亲自带着两个担架员到王明的窑洞内相请，用担架把他抬到会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八大上，也是经毛泽东一再说服，代表们才“忍痛投他一票”，选举王明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此后王明还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但王明并未对党和毛泽东的苦心所感化，在其晚年于莫斯科养病期间，竟炮制出了《中共五十年》一书，恶毒攻击毛泽东，丑化中国共产党。王明在该书中还言之凿凿地说毛泽东通过傅连暲等具体指派金茂岳来谋害他。历史已经无情地揭穿了这完全是他臆造出来的虚假谎言。



结　语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领袖人物的产生在民间总是被描写为神话传说，特别是成功领袖更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美军驻延安观察员谢伟思曾经提出一个后来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称之为“谢伟思命题”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成功地战胜他的众多对手而成为公认的领袖?”“谢伟思命题”的疑惑就在于人们心中仍然存在的神秘感。此后几十年，人们一直试图解读其中的奥秘：或曰之以路线正确，或曰之以领导能力卓越，或曰之以善于用人，或曰之以牢牢地掌握了军队，甚至或曰之以风水迷信，以神话视之等。应该说，除了迷信的东西不可信外，其他的说法都有某一方面的道理。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深度挖掘领袖人物成功的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甚至组织内部的各种因素，去寻找领袖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适应性。从这一视角来看，毛泽东的成功还是有迹可循的。

恩格斯曾用平行四边形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以产生某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现象。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一个具备优秀素质和才能的人并不是都可以成为领袖人物。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优秀人物成为领袖的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社会的需要；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这样才能的人施展其能力。以此来看，我们比较毛泽东与其前面几位领袖人物，他的长处在哪里呢？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应该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袖，这是个人的、组织的、社会的、时代的等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列宁曾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②]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其实质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又顺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并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变迁中发挥了积极、重要和导向作用。正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造就了毛泽东。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即历史对领袖所属政治集团的选择，领袖个人禀赋以及领袖为所属政治集团和时代所做出的重大建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8—47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1 页。

一、中国革命逻辑所向：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自近代以降，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外交。中国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被迫割地赔款，逐步陷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本国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外，更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压迫，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19 世纪末，甲午战败，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四分五裂，瓜分豆剖；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更是带着巨大的屈辱进入 20 世纪，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次胁迫清王朝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当时的中国人人均一两。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甚一日。正如孙中山先生在 19 世纪末感叹的那样：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①] 在这样紧迫而复杂的社会形势之下，在这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局面前，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的和现实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集团以及领袖的政治命运最终取决于能否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谁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谁就是历史的选择者和接续人，谁就是现实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者和领路人。

“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

---

① 孙中山：兴中会创立《宣言》。

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①] 近代中国 100 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及其各种政治力量在探求真理、探索国家出路上做出了种种努力。从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到孙中山等领导的辛亥革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以及各个政治人物都曾在历史舞台上演示过自己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然而，农民阶级"平均主义"的政治主张，只不过是一场迷梦，不可能救民于水火；地主阶级洋务派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顽固和保守，他们的"自强运动"，就连他们自己覆灭的命运也无法挽救，更何谈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则由于他们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力量的软弱，而在封建反动势力面前屡屡妥协。总之，尽管这些政治力量努力探索过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尽管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热血洒尽，但都未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状，都未能完成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的任务。特别是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尽管如此，但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依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

---

①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10 日。

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依然如故，中国仍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资产阶级虽有革命的要求，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不可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代潮流注定它只能扮演悲剧的角色。“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 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人民，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旧的道路行不通，就会寻找新的出路。

中国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是适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革命发展、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 200 万人；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了巨大威力，赢得了五四运动的彻底胜利；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条件日趋成熟。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大量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陆续翻译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逐渐形成。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纷呈复杂的各种学说与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从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75 页。

1920 年起，他们开始着手建党活动。在中国最早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 年 8 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上海成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同时，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各方面给予的实际帮助，从外部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一，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其二，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其三，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9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跨越，从国家被侵略、民族被压迫到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强大动力的历史性跨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永远告别了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稳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100 多年来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人民生活富裕和社会和谐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97 页。

二、领袖个人禀赋所向：个人特质契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

纵观古今中外的社会历史进程，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在推进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无一例外地都具有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和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个人超凡的特质、领袖才能、远见卓识正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中孕育，契合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客观需要，历史地、必然地走向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优秀领导集体的领袖地位。

在党史早期，成为领袖人物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还有政策机会的因素。如陈独秀是在时代变换的过程中因为个人的优异表现而成为党的领袖；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则是因为共产国际抉择的因素比较大；向忠发则主要是因为党内组织路线发生问题而上台的。但他们都没有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之路。为什么毛泽东能？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比，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比他们早，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也不比他们多，学历和文化素养不比他们高，革命经历不比他们长，在志向理想、个人情感、求知学习、意志品质等方面大家各有所长。但是，毛泽东却比其他任何人观察更敏锐，认识更深刻，行动更坚决。这当中，我们找到核心因素，即谁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谁就赢得全党拥护，就能成为革命的领头人，这就是所谓历史的选择。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毛泽东有一套科学合理的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我们常说，思路一换，路子变宽，或者说思路决定出路。在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的背景下，“城市中心论”是党内主流思想和政策。然而，这是不

适合中国革命自身的规律的。而探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就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并将其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才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大胆创新，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预言，突破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那么，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从何而来？

毛泽东喜欢读书，这是世人皆知的。博览群书，从书本中吮吸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这是毛泽东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毛泽东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但自小酷爱读书。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没离开过书，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他都坚持读书。直到临死前还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了 7 分钟。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是怎样读的，至今是个谜。2007 年出版的《毛泽东读书集成》，共计 238 卷 3 亿字，收录了毛泽东阅读和欣赏的图书、文章、戏剧、书法、绘画 1024 种，共 238 卷，计 1 万多个印张，16 万余页。这部书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类书，从中可以窥见毛泽东读书经历之一斑。

书人人都读，问题在于怎样读书，读书得到什么。尤其是对政治家、革命家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说，王明也读了很多书，并且是马列的书，对马列书本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延安时期王明到各机关作报告，引经据典，全是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共产国际怎么说，但又能怎么样呢？"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说明，书是无言的，能否起到作用，关键在于读书的人怎样去读，也就是抱着什么样的学风去读书。

毛泽东读书便有一套科学合理的学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在长期的读

书求学与革命斗争的生涯中，毛泽东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思想方法，并身体力行，贯彻在自己的思想理论与行为实践中。毛泽东早年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的影响，培养了务实精神。湖南是一个有着经世致用学风传统的地方，毛泽东深受其影响。早年在长沙求学，毛泽东曾经在岳麓书院住宿过一年，而岳麓书院就是湘风士气的集聚之地，是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代表。这种湘风士气的特点就是以推崇理性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一代一代的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这种湘学士风越发盛行。如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崇尚实学，主张“理依于气”，强调“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在近代以来成为最有朝气、名士辈出的省份之一。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有贺长龄、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倡导变革；在维新运动中，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变法志士；辛亥革命时期，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绝大多数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更有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曾国荃等。他们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一方面执守理学，同时又师承王船山的实学，糅合理学与实学，贯通内圣和外王。

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他一跨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大门，就体会到这种特殊的气氛。每逢集会，学生们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出自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本意是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1916 年在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位校长把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

挂在讲堂正门。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毛泽东读书总是能切合自己的理想。他18岁到省城求学，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于是投身军营，当了半年兵；辛亥革命后，他开始在长沙寻找适合自己志向的学校，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但他又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他断然决然地退学，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1913年，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这段时间的学习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一师所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遵循这一校训，毛泽东不仅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特别说到顾炎武，推崇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

遵循实事求是的读书法则，毛泽东注重对社会现实的了解，把所学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把书读活。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

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打秋风”。“打秋风”是湖南俗话，即“游学”，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形同乞丐。他们不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游遍湘北、湘中大地，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毛泽东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游学”既了解了社会，克服了“闭门求学”的弊端，又培养了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养成的调查研究的作风，为毛泽东后来从事的社会调查活动、把脉实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8 年 6 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 1920 年 6 月 7 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①] 从此，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随即进行了组织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活动，开始了他投身革命洪流的新阶段。

在“实事求是”湘学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建党前就提出“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此后的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渊源，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艰难曲折的探索道路上披荆斩棘，克难奋进，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因此说，实事求是的思想

---

① 王树山、王健夫主编：《毛泽东书信赏析》，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5 页。

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

毛泽东一方面孜孜以求马列真理，另一方面深入了解中国国情。青年毛泽东求知欲强烈，主张出洋学习西方知识。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到 1921 年 9 月时，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但他终究没有迈出国门。毛泽东是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为他们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但他仍然留了下来。为何？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信中，他解释了其中缘由，他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①] 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实际上，毛泽东这时候已经投入到政治运动的实践中去了。他创办《湘江评论》，领导“驱张”运动，开办湖南自修大学，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青年人。这种重于实践的作风一直伴随毛泽东一生。

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有利于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践行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①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3 页。

堪称全党楷模。他的决策都是建立在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以毛泽东对农村、农民的了解为例。毛泽东出身农村，祖辈世代务农，自己从小参加农田劳动，13 岁就几乎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所以他了解农村，熟悉农民。毛泽东的这个身世与经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绝无仅有。这在当时以主要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党内高层，在全党都围绕着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情形而言实在难能可贵。毛泽东也利用回乡养病的时机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到长沙、湘潭、衡山、醴陵五县农村，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都为他后来大胆转兵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更是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1930 年 5 月，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情况，他在江西寻乌进行了 20 天的调查，并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从哲学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1964 年 6 月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反对本本主义》）。当时，这篇文章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播。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路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歌德曾有过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诚哉斯言。正如 1930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后总结经验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①]

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被王明等讥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共领袖，总结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4 页。

相结合的崭新经验，致力于研究中国国情，始终置身革命斗争第一线，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革命领袖，这是发人深省的，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思想方法还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他早思考，早行动。纵观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均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来。如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时，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当其他人在会上争论不休时，毛泽东则在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①] 实际上，他在思考大会结束后回湖南如何迅速动作起来，展开行动。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每当革命转折关头，毛泽东总是比其他领导人思考得早，思考得深，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往往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二是他善于总结。1965 年 7 月 26 日上午，毛泽东在接见李宗仁夫妇及其秘书程思远时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回答道：“不知道。”毛泽东明确地告诉他，“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是做工作的两个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调查研究于前，总结经验于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综合、判断，总结出经验，这就是毛泽东重要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写出来的。1962 年 1 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

①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5 页。

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 “靠总结经验吃饭”，形象而幽默，毛泽东一语中的，揭示了自己率领千军万马打江山、搞建设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三、领袖个人建树所向：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一个政治领袖的命运取决于他的远见卓识及思想理论为组织和时代解决问题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领袖更替的发生也反映了在解决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所做出的探索与努力。历史之所以选择毛泽东，是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所要确定的革命道路问题。党的十八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①] 道路是旗帜的实现途径，旗帜指引方向，道路实现旗帜。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程来看，领袖人物的建树在于“一个结合，两个成果”。“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取得理论和道路“两个成果”。当然，这“两个成果”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理论成果表现为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上回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道路成果则表现为实践形态，即在理论指导下的具体革命实践。总起来说，这两个成果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中国革命，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一方面要在理论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

程，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实现理论飞跃，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寻找符合本土国情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这篇文章做得怎样，就成为中共早期领袖的兴衰成败的关键。

党在幼年时期的革命历程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这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结合”的艰辛。党在幼年时期经历了两次成功两次失败，既有推动和领导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也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葬送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教训；既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经验，也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失败教训。这些都反映了“结合”的经验教训。陈独秀在建党后曾经提出过“自己搞”的想法，并说“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陈独秀只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却并没有达到自觉阶段。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与工农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问题上，他仍然方向不明。而他说出这番话时也是在与马林赌气。正如共产国际当时的负责人拉狄克 1922 年 11 月所指出的那样，陈独秀表现出难以“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在实践与行动方面，缺乏独立自主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纲领和指导方针，一方面对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抵制乏力；一方面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风暴中，在领导权问题上，又过分迁就退让。陈独秀比较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墨守“宣传、组织、暴动”的革命路径，发展成自觉不自觉地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理论上的模糊带来实践中的困惑，无法处理好国共合作中合作与独立、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最终归于失败。

瞿秋白较早发现并严肃批判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仍然有着“与工农群

众接触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等毛病。这种先天的不足，使他又表现为“左”的倾向，陷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之中。党的六大上，党内从两位知识分子领导人的失误走向反知识分子的另一极端，选出了知识和理论都极端欠缺的工人领袖向忠发。作为历史的无情嘲弄，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恰恰导致知识分子李立三的“秘书长专权”，置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于不顾，幻想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中国革命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由于李立三的“反国际”和盲动主义路线造成重大损失，给王明宗派团伙以可乘之机。王明等人以“钦差大臣”自命，以满口马列主义的辞藻来哗众取宠，蒙蔽群众，以残酷打击犯错误或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控制全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加上在这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企图在中国“克隆”俄国革命，致使这批有俄国镀金背景、言必称马列，以“百分之百（共产）国际路线”自夸的青年革命家群，在“结合”问题上，再食苦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①] 在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实践的反复比较，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道路，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2页。

长的时间。”[①] 这就是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选择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真谛所在。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说明，他无愧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晚年，由于在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了曲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这更加说明了，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我们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如一地要坚持下去的。胡锦涛在评价毛泽东时代与后来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时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②]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应该珍视毛泽东思想，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它。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5 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